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8期 2018年12月

一般論文

- 區塊鏈與新聞：新型態的數位新聞購買與推薦平台
- 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
-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知識勞工的困境研究：以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為例
- 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

研究誌要

- 社會運動與新認同：社群媒介與創意社群之分析

現場報告

- 「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參與觀察

書評

- 拆解有實而無形的審查刀鋒：
評介區家麟著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18年12月 第八期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新竹)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編輯委員會

主編	馮建三	政治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
	林麗雲	台灣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羅世宏	中正大學(執行編輯)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目次

編輯室報告：另類傳播的關懷與求索.....i

一般論文

區塊鏈與新聞：新型態的數位新聞購買與推薦平台.....劉榮樺/1

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

 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胡元輝/37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知識勞工的困境研究：

 以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為例.....姚建華/77

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

 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馮建三/103

研究誌要

社會運動與新認同：社群媒介與創意社群之分析.....許傳陽/141

歷史與現場

「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參與觀察.....蔡慶同/165

書評書介

拆解有實而無形的審查刀鋒：評介區家麟著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常》.....杜耀明/191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編輯室報告： 另類傳播的關懷與求索

本期除四篇研究論文外，另有研究誌要、現場報告與深度書評各一篇。

這些研究論文與作品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但彼此之間隱然又有某種微妙的有機聯繫：區塊鏈與新聞業、商營社群媒體問責與另類社群媒體想像、中國大陸知識勞工面對的社會轉型困境、拉美另類傳播、台灣社會運動、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以及香港新聞業日常面對的「二十道陰影」。或探索技術前沿，或批判商營社群媒體，或梳理社會轉型下的知識勞工困境，或引領讀者看見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篇篇具有個性的論文和作品，有著共同的關懷與求索：不因為傳播現狀的各種結構性限制而喪志，努力探索另類傳播的可能性。

首篇論文是劉榮樺教授撰寫的〈區塊鏈與新聞：新型態的數位新聞購買與推薦平臺〉，探討 Civil、Bitpress 與 Matters 這三個新聞產銷（付費）流通平臺如何藉由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期能為高品質新聞資訊內容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提供新的出路，希冀有助於解決因社群媒體普及應用而惡化的「假新聞」現象，並且打破因推薦系統演算法造成的「同溫層」等問題。面對傳統新聞業因數位科技襲奪廣告收入而呈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許多創新實驗尚待展開，新聞生產與消費兩端還需磨合，但劉榮樺教授這篇相當具有原創性的論文，應可為關心優質新聞業前景的傳播學術與新聞實務社群帶來諸多啟發。

第二篇論文是胡元輝教授的〈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胡元輝教授長期關注優質新聞業前途，也關切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下的「假新聞」議題。本篇論文對商營社群媒體應對「假新聞」問題的消極態度提出批判，並從政治經濟學視野分析商營社群媒體的侷限，包括其對用戶隱私的監控與侵害，對用戶數據和數位勞動的商品化與剝削...等。最

後，胡元輝教授對商營社群媒體的問責機制指出若干可能的著力方向，並且提出在商營社群媒體之外擊建公共及另類社群媒體的讜論。

第三篇論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知識勞工的困境研究：以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為例〉，作者姚建華教授也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大陸出版產業知識勞工（以編輯職工為例）面臨的四大困境，涉及技術、政治、經濟與階級關係和權力變化等層面。本文通過對上海兩家出版社的案例研究與深度訪談，勾勒出中國大陸傳播產業與知識勞工置身的制度化權力結構與社會關係的變化。展讀姚建華教授這篇論文的同時，適逢中國大陸國務院近日（2018 年 12 月 18 日）發佈《關於印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進一步支援文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對於本文所分析的知識勞工在社會轉型中面臨的困境，當有更深刻的領會：社會轉型的巨輪從未停止轉動，知識勞工遭受的碾壓情況似乎也在持續加重當中。

第四篇論文是馮建三教授撰寫的〈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針對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特別是委內瑞拉在本世紀以來展現迥異於華人社會及西方主流觀點的現象，亦即國家力量與另類傳播之間的正向或協作關係，提供了相當深入的脈絡化知識與分析，也翻轉了所謂國家力量與另類傳播之間必然互為悖反的流俗之見。本文的另一特色，在於詰問大多數西方及華文主流媒體所再現的委內瑞拉政經社會狀況，因為主流媒體再現的委國狀況不僅與實情未盡相符，而且該國經濟困境亦與其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的關連性不大。馮建三教授亦對當地兩家頗具特色的另類媒體（VA 及 TeleSur）的報導和觀點進行分析，這項在華文傳播學術界難得一見的研究成果，不僅有助於讓更多人理解關於委內瑞拉的真實狀況，亦有助同樣懷抱社會公平正義追求想望的人從中獲得另類知識與行動的培力資源。

除了這四篇相當具有原創性與重要性的研究論文之外，許傳陽教授帶領讀者進入社會運動和創意社群的匯流空間，他的〈社會運動與新認同：社群媒介與創意社群之分析〉一文以台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為例，分析了視覺符號與創意社群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運動結合社群媒體的實踐可能。

蔡慶同教授的〈「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參與觀察〉一文，書寫他對「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的觀察與行動紀錄，希望從中提煉出一種能讓亞洲不同國家紀錄片製作、教育與策展者之間能夠彼此看見對方的新方法與新視野，從而跳脫後殖民知識狀況施加的普遍限制。

最後，對於愈來愈清晰浮現的香港新聞自由隱憂，杜耀明教授分享了他的觀察與思考。通過對區家麟所著《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一書的閱讀與評介，在這篇題為〈拆解有實而無形的審查刀鋒〉的深度評論中，杜耀明一語道破這本書的核心旨趣：「以自我審查為線索，解破香港新聞界『有自由無自主』的謎團。」香港新聞媒體的自我審查，比直接來自政府的「操控式審查」，更加構成了讓香港新聞記者無以發揮更大自主性的「無形的枷鎖」。杜耀明同意區家麟的看法：相對於赤裸裸的「操控式審查」，另一種運作更為幽微也更具箝制作用的是「結構式審查」。通過對 69 名新聞工作者的訪談，該書臚列了 20 種結構式審查的樣態，饒富啟示意義。除了高度肯定並推薦這本書之外，杜耀明在這篇深度書評中也提示了後續值得共同努力的研究與實踐方向。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18 年 12 月 26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區塊鏈與新聞： 新型態的數位新聞購買與推薦平台

劉榮樺*

本文引用格式

劉榮樺（2018）。〈區塊鏈與新聞：新型態的數位新聞購買與推薦平台〉，
《傳播、文化與政治》，8:1-36。

投稿日期：2018 年 8 月 11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 作者劉榮樺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e-mail: emileliu@mail.shu.edu.tw。

《摘要》

區塊鏈的概念是在 2008 年由 Nakamoto Satoshi 提出，並在 2009 年發佈了第一個實作區塊鏈的虛擬貨幣——比特幣。在 2015 年發行的另外一個區塊鏈虛擬貨幣系統——以太坊，引入智慧合約的概念，擴大了區塊鏈的應用於自動交易與資料保護上。區塊鏈所具有的資料不可抹滅以及解決雙重支付的虛擬貨幣機制，也吸引新聞媒體開始投入建置區塊鏈新聞交易平台，用以解決營收過度依賴廣告與遏止假新聞的氾濫。本文將介紹區塊鏈如何應用於新聞交易平台，以目前進行中的三個區塊鏈新聞交易平台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包含以英文讀者為主的 Civil 與 Bitpress，以及以華文世界讀者為對象的 Matters。從對以上三者的研究顯示，當區塊鏈上的貨幣與現實生活中的法幣能有穩定兌換關係後，同時擁有足夠多的貨幣與持有者在區塊鏈上，就能成為從貨幣動力學來看具有穩定性的貨幣，如此將會使得區塊鏈如同重要基礎設施，可以被穩定地且廣泛地運用；而其所具有的不可抹滅性，也使得此種新的數位型態的新聞內容會成為可信賴的訊息來源，增加大眾對於新聞的信賴度，使得新聞產業擺脫假新聞與同溫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再次贏回大眾的信賴。

關鍵字：Bitress、Civil、Matters、比特幣、以太坊、區塊鏈、智慧合約、超級帳本

壹、背景

從網路興起之後，早期因為網路付費尚不普及，所以新聞媒體無法從中獲利。近幾年因為各式非傳統新聞媒體的出現，如 Facebook 成為資訊的分享中心，媒體產出的內容被分享到 Facebook，內容的普及率可能隨之提升，但媒體可以從中獲得的導流率甚低。許多讀者都停留在 Facebook，而不會到新聞媒體的平台上，這導致平台上的廣告瀏覽率與點擊率下降。當媒體產出越多的內容，反而是 Facebook 的使用者駐留率越高，幫助 Facebook 增加獲利。而當媒體利用付費牆的方式，要求讀者付費看文章內容的時候，反而因為文章擴散度降低，觀看文章的人數減少(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已經改變，無法要求讀者回到傳統的閱讀新聞方式，所以傳統媒體，如《紐約時報》，提出「數位優先」(Digital First)與「行動優先」(Mobile First)的策略，希望能在網路以及行動裝置上，找到新的數位獲利方式以維持新聞媒體的營運(Burrell, 2017, March 23)。《紐約時報》在 2014 年提出的創新報告，明確訂定了以數位優先的策略，透過活用既有內容與社群網站的方式，藉以觸及數位時代的使用者，以增加更多訂閱戶(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p. 81)。而在 2018 年的時候，他們的目標定為針對既有用戶提出了例如健康規畫等各種獨家的數位內容服務，因為他們認為與其積極擴展新用戶，不如藉由提供用戶良好服務，透過口耳相傳，增加新的用戶(Lee & Guinee, 2018, April 17)。

相較於《紐約時報》這類型的大媒體公司，能有較多的資源去規劃數位服務的策略，現今流行的各種自媒體或者是地區型的新聞公司，就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所以有不同收費形式的數位內容平台出現，如“Medium”¹藉由讀者對於作者文章的評價數目給予作者分潤；「讀創故事」²由作者自行做線上出版，選擇其文章是否要收費。“Steemit”³則是一套以區塊鏈為基礎的社交媒體平台，當有人在平台上發布文章或者回應，都有機會收到平台上的虛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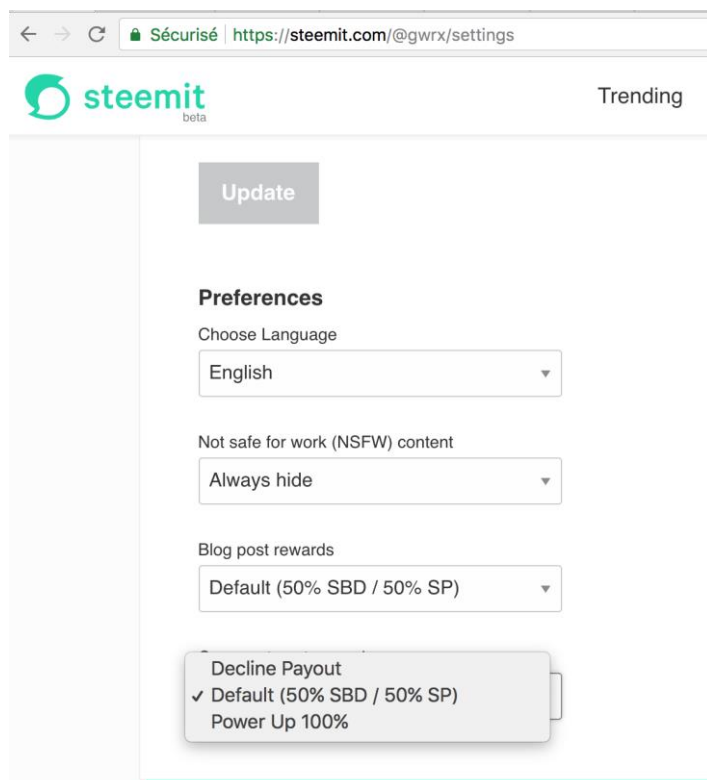
¹ <https://medium.com/>

² <https://story.udn.com/dcstore/Index.do>

³ <https://steemit.com/>

貨幣 “Steem Dollar” (SBD) 與影響力 “Steem Power” (SP)，發文者可以設定要收比例多少的 “Steem Dollar” 跟 “Steem Power” (圖一)，同時他們可以將內部使用的 Steem Dollar 轉為可以在平台以外兌換不同虛擬貨幣的 “STEEM”⁴。越早回應的人，會收到額外的金額，藉以鼓勵讀者回應，而 “STEEM” 可以在如 Bittrex⁵的網站上進行交易 (圖二)。在以上不同的數位內容平台中，新型態的線上收費方式正在逐漸成形。

圖一：Steemit 發文者可以自訂要收多比例的 “Steem Dollar” 跟 “Steem Power”



⁴https://steemit.com/faq.html#What_is_the_difference_between_STEEM__STEEM_Power__and_Steem_Dollars

⁵ <https://bittrex.com/>

圖二：“STEEM”在虛擬貨幣交易所“Bittrex”的交易狀況⁶



不過 Steemit 的定位是具有寫作功能的社交媒體平台，所以他們並沒有擔負新聞媒體所需要的事實查核等責任，也使得他們與本文所要介紹的具有假新聞查核與可信度評等的新聞區塊鏈平台，有截然不同的差異，這差異使得以區塊鏈為基礎的新聞平台成為一個獨特的生態系統。

Civil 是一個由新聞從業人員與程式工程師在 2017 年組成的一家公司，他們嘗試建立以區塊鏈為基礎的新的新聞內容收費平台，而當到了 2018 年五月，除了 Civil，還有 Bitpress 與以華文讀者為對象的 Matters 這二個開發中的計畫，也希望能建立可以持續經營的新型態新聞商業模式。區塊鏈作為一個去中心化的分散式帳本，過去幾年在金融科技業已經陸續被探討與實作，也因為其交易不可修改與去中心化的特性，已經擴大其原本作為虛擬貨幣帳本的特性，而被應用於需要去中心化與安全性高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上；而其去中心化的虛擬貨幣則產生了新的商業模式，網路上個人之間的交易，不需要透過 Paypal 與銀行等第三方組織，以及如蘋果公司的 Apple News 或者是 Facebook 的新聞發布平台，讀者可以如同在現實世界中的購買報紙的直接付款給新聞媒體，而這也使得過

⁶ <https://bittrex.com/Market/Index?MarketName=BTC-STEEM>

去長期仰賴廣告收入與點擊率的網路新聞從業人員，有了另外一種獲利方式。

Civil、Bitpress 與 Matters 這三個專案本身並不限於只作為收費平台，他們同時希望藉由區塊鏈的分散與不可變更特性，解決目前普遍存在於社群網站上的假新聞與推薦系統所造成的讀者同溫層的問題。在假新聞的解決方案上，Civil 是藉由「挑戰」機制維持新聞的品質，因為文章的交易紀錄無法刪除，所以藉由紀錄回溯發文者，能追蹤到假新聞的來源。在推薦系統的問題上，Matters 會審核發文者的背景，由挑選出來的社群的人進行議題設定，先由部分意見領袖開始他們第一階段的封測。

綜上所述，區塊鏈並非只是做為交易媒介，同時也可以是獨立的生態體系，歐盟甚至將其納為數位單一市場的重要基礎設施之一⁷，運用於包含個人資訊管理以期達到結合物聯網、開放民主與共享經濟的“DECODE”計畫⁸，以及與醫療等資訊的管理與傳遞相關的“MHMD”計畫⁹。在“DECODE”的阿姆斯特丹前導計畫中，預計建立短租資訊的區塊鏈平台，未來將擴展到新聞與各式活動的資訊共享平台。本文接下來將會先介紹區塊鏈的發展，以及網路新聞這幾年所面臨到的關於假新聞與新聞推薦造成的同溫層問題。然後，藉由比較 Civil、Bitpress 與 Matters 三個區塊鏈新聞交易平台，討論區塊鏈作為新聞交易生態體系與基礎設施，對於現在網路新聞的商業模式與假新聞議題所可能帶來的幫助，以及他們所可能面臨的問題。

貳、區塊鏈的技術特性

區塊鏈的概念最早是由 Nakamoto Satoshi (2008) 所發表的一篇“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當中所提出。在文章中他提出利用「點

⁷<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uropean-countries-join-blockchain-partnership>

⁸<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blockchain-give-people-more-control-about-their-data>

⁹<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blockchain-enable-medical-data-be-stored-and-transmitted-safely-and-effectively>

對點網路」(Peer-to-Peer Network, P2P)，將每一次的虛擬貨幣的交易 (Transaction)，放入區塊 (Block) 當中，當完成產生區塊所需要的計算過程之後，將區塊串接在唯一一條串連在一起的區塊鏈 (Blockchain)，這過程即稱為挖礦 (Mining)，負責產生區塊的電腦或人，則稱為礦工 (Miner)。副本會放置在網路上的不同的電腦當中，而這也是所謂的去中心化設計 (Decentralized)。如果想要更改交易紀錄，就必須將所有區塊產生的計算過程重新計算一次，而因為這個過程費時過長，當修改完之後，其他網路上的電腦可能已經將新產生的區塊連結到區塊鏈上。而根據他的設計，作為網路中的電腦，只會保留最長的一條區塊鏈，其他電腦運算後所得的較短的區塊鏈上的新區塊則會被捨棄，稱為孤兒區塊 (Orphan Block)。因為區塊鏈網路上的所有電腦都會存有最長的區塊鏈副本，即使一個電腦上的區塊鏈內容被修改，其他電腦上只要有比其更長的區塊鏈副本，其費時修改的新的區塊即會被捨棄。藉由以上的機制，可避免交易紀錄被修改。也因為區塊鏈存放的是交易紀錄，所以也被視為帳本 (Ledger)。Nakamoto Satoshi 並於 2009 年，公開第一版的實作區塊鏈概念的虛擬貨幣——比特幣 (Bitcoin) ¹⁰。

比特幣的區塊最多只能存放 1MB 的資料，同時平均要花費十分鐘才能新增一個區塊¹¹，而比特幣規定需要在埋有該筆交易的區塊之後，需要有五個區塊串接在其後，才算是交易確認 (Confirmation) ¹²。為了鼓勵礦工將交易紀錄埋入區塊之中，當產生一個新的區塊，礦工將會收到報酬 (Reward) ¹³，包含了產生區塊而得到比特幣，以及交易當中的手續費 (Transaction Fee)。目前挖到一個區塊可以獲得 12.5 比特幣，每當產生 21 萬個區塊之後，礦工可以獲得的比特幣會減半，以維持貨幣價值¹⁴。

比特幣利用具有難度的計算方式來建立新的區塊，這個方式稱為工作證明 (Power-of-Work, PoW)，雖然計算過程需要的電腦運算量與時間會隨著區塊鏈越長而成長，但是確認新產生的區塊是否有效的速度則是很快，以便於

¹⁰ <https://bitcoin.org/en/>

¹¹ <https://en.bitcoin.it/wiki/Block>

¹² <https://en.bitcoin.it/wiki/Confirmation>

¹³ <https://en.bitcoin.it/wiki/Mining#Reward>

¹⁴ <https://en.bitcoin.it/wiki/Mining#Reward>

在網路上的所有電腦都能在短時間內進行同步，確認彼此的區塊鏈內容都一致，也就是達到比特幣所定義的共識（Consensus）。產生共識的方法除了比特幣所採用的工作證明外，還有其他類型，如股權證明（Proof-of-Stake, PoS），其是由演算法隨機選擇手中所持有的貨幣量超過一定額度的網路節點，才可以產生新的區塊。

區塊鏈的應用並不只局限於作為虛擬貨幣，在 2015 年被進一步擴展到自動交易的行為上。以太坊（Ethereum）¹⁵在 2015 年出現，並且加入了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的概念，爾後由 Linux 基金會主導開發，IBM 與荷蘭銀行所共同參與的超級帳本（Hyperledger Fabric）¹⁶也加入了智慧合約的實作，其甚至沒有自己的虛擬貨幣，純粹是作為商業應用層級的區塊鏈。智慧合約最早是由 Szabo(1994)所提出。智慧合約有以下四個目標(Szabo, 1996):

- （一）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交易雙方可以看到彼此對合約的實行狀況。
- （二）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確認合約是否被執行或違反。
- （三）利害關係（Privity）：對於合約的相關資訊，只有具有利害關係的人可以看到。
- （四）強制執行（Enforceability）：具有強制執行的能力，但是也要最小化這個需求。

智慧合約在以太坊上也被視為交易的一環，當使用者將合約發佈到區塊鏈上，合約內容就不能被更動。以太坊也提供一個特殊規格的智慧合約——ERC20，用於產生使用者虛擬貨幣¹⁷。同時也允許使用者產生有自己的私有區塊鏈（private blockchain），並且設定可以產生的貨幣上限金額，獨立於公有區塊鏈（public blockchain）之外，可以用於組織內部。不過如果是在私有

¹⁵ <https://www.ethereum.org/>

¹⁶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fabric>

¹⁷ https://theethereum.wiki/w/index.php/ERC20_Token_Standard

鏈產生的貨幣，無法與公有鏈的貨幣一樣在交易所（exchange）與其他貨幣進行交易。

參、區塊鏈當前的主要應用

根據劍橋大學的 Garrick Hileman 與 Michel Rauchs 在 2017 年的調查，目前主要應用區塊鏈的行業，以銀行業為最主要的領域。30%的區塊鏈應用是在銀行業發生，接著是政府與公領域，佔了 13%。接著依序是保險業、健康照護、媒體與娛樂、通用型應用、科技業、專業服務、能源業與製造業（Hileman & Rauchs, 2017, p.37）。

智慧合約擴展了區塊鏈原本只作為貨幣的應用，以 IBM 與三星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上的應用為例，當三星的洗衣機偵測到洗衣粉已經用罄，就會發訊號到 IBM 的物聯網管理電腦上，接著 IBM 就會將洗衣機擁有者的帳號送到區塊鏈已存在的合約上，合約就會自動進行交易，將款項轉給洗衣粉的販賣商；當交易確認後，就會通知商店遞送洗衣粉到洗衣機的擁有家中（Gantait et al., 2017, January 9）。IBM 認為結合了物聯網、區塊鏈與智慧合約，可以將區塊鏈的應用擴展至追蹤食物運送的物流，避免食物的浪費；以及紀錄來自不同供應商的汽車零組件，能符合最後組裝所要的需求數量。同時能應用於共享經濟，將自家產生的如太陽能的能源，藉由智慧合約進行交易（Gantait et al., 2017, January 9）。因為區塊鏈具有不可抹滅性，使得合約具有強制執行力與可以被驗證，同時其去中心化的特色，使得自動化交易無須第三者驗證。

如上所述，智慧合約出現在區塊鏈之後，各種自動化的交易行為就可以發生，如同從實體商店的面對面交易，進展到網路與行動支付，上述的物聯網將日常的買賣行為全盤自動化。而自訂的虛擬貨幣提供了彈性的交易媒介，各種交易可以先以自訂虛擬貨幣交易，接著轉為如以太幣等區塊鏈上原本的主要貨幣，再轉為一般實體世界的法幣，如此一來在區塊鏈開啟一個新的應用，不需要有原本該區塊鏈上的可能已經飆漲的預設虛擬貨幣，而可以用自訂貨幣進行交易。這變化也擴展了區塊鏈的應用，不可修改的資料庫結

合自動轉帳，提供訂閱機制，所以開始有專案開發給予新聞產業應用的區塊鏈與自訂虛擬貨幣，透過區塊鏈上的直接交易，降低過度依賴廣告收入，同時他們也試圖透過區塊鏈解決目前網路新聞上最常出現的二個議題——假新聞與造成同溫層的推薦演算法。以下會透過介紹區塊鏈在新聞傳播上的可能應用，說明如區塊鏈如何處理假新聞；而其所產生的線性新聞並陳方式，則會在區塊鏈在傳播應用上的可能影響與意義中，討論其對目前新聞同溫層所可能產生的作用。

肆、區塊鏈在新聞傳播上的可能應用

區塊鏈所具有的不可抹滅性，被視為或許可以利用於處理近年日益嚴重的假新聞議題。伴隨著各式網路社交媒體出現，假新聞的問題越來越為嚴重。如 Jacob L. Nelson 與 Harsh Taneja (2018) 以美國 2016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指出假新聞的流量大部分從社交網路而來。隨著越來越多人透過社交媒體閱讀新聞，尤其是 Facebook (Newman et al., 2018, pp.10-11)，而非透過直接透過新聞網站或者是行動裝置 app，假新聞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大。Balmas (2012) 已經指出當讀者接觸越來越多的假新聞，越有可能將假新聞當作真實。為了確認新聞的真實性，對於新聞的事實查核 (fact-checking) 也越來越為被重視 (Graves, 2016)。

但是假新聞的形式相當多樣化，例如以娛樂或小道消息的形式出現 (Otto et al., 2016)。對於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感，間接也促成了大家願意相信在社交網路上，朋友所提供的消息 (Marchi, 2012)，或者是符合自己意見傾向的新聞 (Allcott & Gentzkow, 2017)。

因為社交媒體上的假新聞的氾濫，影響了美國 2016 年的總統選舉 (Allcott & Gentzkow, 2017)，在飽受批評之後，Twitter 吊銷了疑似由俄羅斯贊助的散佈假新聞的帳號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17)，而 Facebook 在 2018 年 5 月對於如何處理其上的假新聞發表了三項聲明 (Hegeman, 2018, May 23)：

- (一)「面對假新聞」(Facing Facts)短片：在這部十二分鐘的短片當中，他們描述 Facebook 的動態消息團隊 (News Feed) 如何利用技術與人工移除假新聞。
- (二)新聞識讀宣傳活動：提供讀者如何判別假新聞與錯誤資訊的方法，這個活動會持續一整年，並且出現在每一個國家使用者的動態消息上方。
- (三)委託學界測量錯誤資訊：邀請學界提出計畫書，進行錯誤資訊在 Facebook 上的數量與影響進行研究。Facebook 會提供資金與經過隱私保護處理的資料，協助學者進行研究。

Facebook 對於假新聞的處理方式是進行人工與技術的事實查核，Google 則是會在 Google 新聞頁面的“Fact Check”欄位放上已經經過事實查核的文章¹⁸。不過也隱含著他們可以移除他們覺得是假新聞的文章，反而可能是另外一種箝制言論自由的審查機制。相較於言論審查，或許可以藉由驗證發文者的發文內容與紀錄，提供讀者自己進行判斷文章的可信度。當讀者從社交網路上獲取的新聞資訊的時候，他們並不會知道在層層分享與轉貼的文章背後，其真正的源頭為何。對於假新聞的處理，可以透過區塊鏈的每一筆資料都是串接在一起的一條鏈，而非是如同網路是四散的各個獨立節點，所以可以藉由追蹤假新聞源頭，揭露產出者的身份。或者是利用網路上的網友的驗證，建立如同比特幣的工作證明的共識機制，當有足夠多的讀者認證新聞的正確性後，才會將其加到區塊鏈上，阻止虛假新聞的擴散。後文將會介紹的 Civil，其甚至是藉由沒收區塊鏈上的貨幣，藉以懲罰新聞造假者，用以增進新聞品質。在案例分析時，會介紹現在發展中的新聞區塊鏈計畫如何利用區塊鏈與其他技術來達到遏止假新聞的擴散。

伍、區塊鏈在傳播應用上的可能影響與意義

¹⁸ https://support.google.com/news/answer/1217612?hl=en&ref_topic=2428791

如果說區塊鏈作為一條唯一的鏈可以做為追蹤假新聞的源頭，單一的鏈也同時將新聞內容平等地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可能會改變了當代社會的網路新聞，是由社群網站的演算法決定使用者會看到何則新聞的現象。

隨著閱讀新聞的來源主要來自於網路，許多網路新聞平台公司紛紛提出各自的推薦系統演算法，其因為根據讀者過去的偏好，而提供給讀者特定類型的新聞，或者是過度呈現或降低某些新聞來源（Haim et al., 2017）。

如同路透社的調查顯示隨著越來越多人透過 Facebook 觀看新聞（Newman et al., 2018, pp.10-11），許多新聞的點閱率是掌握在 Facebook 身上，如 Facebook 會刻意操作使用者的閱讀經驗，或者是根據演算法推薦使用者根據他們偏好所產生的推薦文章，這樣會導致使用者看到自己感興趣的文章，而當他們一更改演算法，就有可能造成新聞點閱率的暴升或暴跌（Owen, 2018, April 19），所以有必要對於一般推薦系統的演算法原理有所認識。推薦系統的演算法的種類，通常是分成三類，內容為主（Content-Based Filtering）、協作（Collaborative Filtering）與混合型（Desrosiers & Karypis, 2010）。內容為主是根據文章內容分類，根據讀者目前看的文章類型，推薦讀者看相同類型的文章，比如《聯合新聞網》的產經分類頁面的新聞，下方的推薦文章皆為產經相關¹⁹。協作類型則是推薦使用者其他與該使用者有類似的偏好的人所看過的文章，比如 Google 第一代的個人化新聞推薦（Das et al., 2007; Jiahui Liu et al., 2010）。混合型則是指結合內容為主與協作二種類型，這也是現今 Google 新聞所使用方式²⁰。

Facebook 推薦給讀者的文章，是從他們閱讀的文章內獲取感興趣的內容傾向，依據讀者的興趣給予推薦的文章。他們的文本理解引擎稱為 DeepText，其會根據文章的文本內容對應到相關的主題（Abdulkader et al., 2016, June, 2）。他們會從粉絲頁的文章，分析其內容文本，訓練出內容與主題對應的模型。如在足球隊的粉絲頁，他們檢設在其上的文章都是與該足球隊有關，就依據這個假設，建立興趣分類器。只要使用者閱讀或者是發表跟足球粉絲頁文章內容相類似的文章，就判斷使用者對該足球隊有興趣，這個

¹⁹ <https://udn.com/news/cate/2/6644>

²⁰ <https://support.google.com/news/answer/40213?hl=en>

分類器稱為 PageSpace。他們採取的是內容為主的推薦系統，這也造成了當讀者觀看或發表越多同性質的文章，就只會看到相類似的推薦文章。

Facebook 的推薦系統與其他推薦系統而言，存在著「回饋迴圈」(Feedback Loop)。當 Facebook 根據內容推薦的文章，會按照優先性排序，同時也會根據使用者的點閱狀況進行調整，這也造成了優先性排序低的文章，使用者不容易看到，系統會因為使用者沒有點閱該類型的文章，而將這類型的文章更往後排序，使用者有可能永遠都看不到該則文章 (Rader & Gray, 2015)。

新聞的推薦系統既是根據讀者的偏好而去產出，但這也帶出一個問題，推薦系統對於文章的分類的問題，同一個議題有可能是正反面的論辯，當讀者偏好看正面的文章的時候，系統會持續給他看正面的文章，而 Facebook 的回饋迴圈則更是會強化這樣的現象。這其實必須回到是否能給讀者看到更多文章選擇的可能性。《紐約時報》的創新報告曾經提到針對讀者客製化的問題，這或許是一個好的改變方向。他們提到讀者到《紐約時報》看文章內容，是想看《紐約時報》可以提供甚麼樣的新聞資訊，而非單是《紐約時報》要提供讀者想看的新聞，但是在客製化的層面上，他們主要是以內容為主，如果讀者對於某則新聞感興趣，他們會列出與這新聞相關的其他資訊，提供夠多的資訊，而非僅是根據讀者的偏好，是可能可以改善同溫層的問題 (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pp. 37-42)。如果從點線面的設計來看，社群網站是將個別新聞作為個別獨立的點而呈現，讀者藉由觀看個別節點從而形同質度高的面（同溫層），讀者們所觀看的內容會都是節點彼此連接的性質類似的新聞。區塊鏈的單一鏈的設計則是將相異的新聞都同時放在一個直線上，讀者閱讀的新聞內容會同時伴隨著時間上相近的新聞，而不是觀點相近的內容，這有助於讀者閱讀到更多不同觀點的文章。

在案例分析中所介紹的 Matters，也會提及他們透過區塊鏈建立作者的聲量與權重，推薦在區塊鏈上聲量與權重相對高的作者所寫的文章，將讀者拉出只看自己感興趣的新聞的推薦系統的同溫層。

陸、研究方法

本文將會討論現有將新聞產製銷售與區塊鏈結合的三個計畫 Civil、Bitpress 與 Matters，藉由分析這三個相關計畫對於上述假新聞與推薦系統的解決方式，以及他們在新聞產製、傳播與讀者群設定的相似與差異之處。各個區塊鏈在正式對大眾開放前，會發布白皮書（Whitepaper/White Paper）說明自己系統的特色與規格，目前 Civil 與 Bitpress 都已經發行白皮書，而 Matters 則將類似的內容稱為「項目草案」²¹。截至本文寫作期間，Bitpress 還沒有正式開始運作，只有 Civil 與 Matters 開始開放部分已完成的網站內容，所以在案例分析的時候，主要是參考已開放的新聞網站、白皮書與相關文件。在介紹完三個計畫之後，將會綜合分析其特色，並且討論利用區塊鏈建置新聞推薦與購買系統是否可行。

柒、案例分析

一、Civil²²

Civil 是由一家位於美國紐約的 Civil Media 公司負責開發以區塊鏈為基礎的新聞交易平台，Civil Media 將 Civil 定位為一個協定（protocol）、軟體（software）以及生態系統（ecosystem; Iles, 2018, May 5）。Civil Media 對於 Civil 的成立目的與構成系統說明，主要是寫在《Civil 憲法》（Civil Constitution）（Iles, 2018, May 5）當中。Civil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可以讓新聞業可以獲得維持下去的資金，不過他們更是著重在新聞自由與社群自我管理，如在《Civil 憲法》中所述的 Civil 致力於服務需要自由、公平與正義的條件，用以完成新聞使命的 Civil 公民。同時 Civil 尋求建立可以達成新聞使命的條件，同時也可以維持生計，使得新聞不會因為被政府、商業與特殊利益的團體不正義的法律、經濟壓力、威脅與暴力，而影響、控制與停止收集與傳佈公眾層面的事實、意見與想法。而 Civil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透過以區塊鏈與虛擬貨幣經濟建築的自我管理協定，創造永久且不可被更改的

²¹<https://goo.gl/7oLtkX>

²²<https://civil.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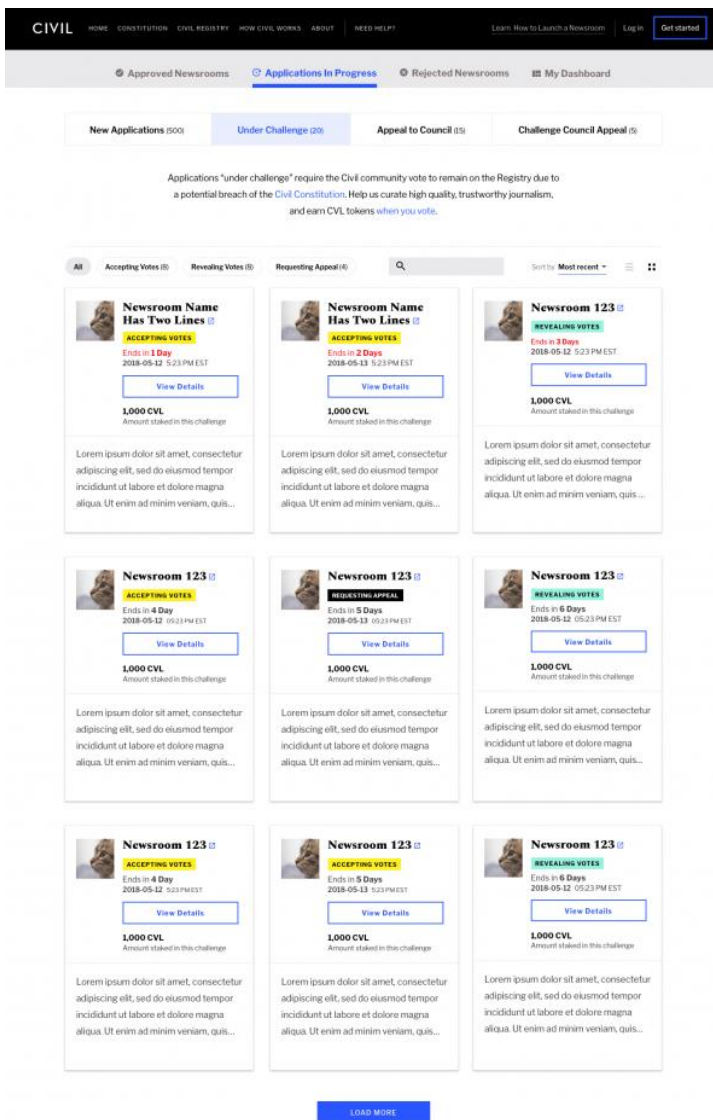
新聞紀錄，而以上的方式是由公眾所擁有與營運，使得公眾可以要求記者對於新聞內容負責，並且給予記者直接的贊助。

《Civil 憲法》當中說明他們將會用以太坊區塊鏈作為他們的開發平台，並且會開放其原始碼。Civil 希望所開發出來的軟體可以確保新聞可以發布與傳輸，且藉由存放新聞資料在區塊鏈上，可以使其永久存在且無法刪除。同時該軟體可以協助新聞記者可以在 Civil 平台上，找到對於他們新聞報導感興趣的讀者大眾，如此一來記者可以從大眾取得經濟收入。對於讀者而言，Civil 軟體可以幫助他們找到、贊助、委託、消費，甚至是貢獻新聞。不只是做為一個單一面向的軟體，Civil 也計劃可以藉由之後對軟體的擴充，以及與其他軟體之間的結合，使得大眾可以找到他們想要贊助與聯繫的的記者。雖然軟體是由 Civil 開發，但是軟體的營運與管理是由參與者負責。在章程也說到，他們希望將所開發出來的軟體盡可能讓 Civil Media 本身無法去干涉當中的管理 (Iles, 2018 , May 5)。

Civil 的生態環境包含了 CVL 貨幣 (CVL)，其是運用以太坊的產生貨幣用的智慧合約²³，產生 Civil 上的虛擬貨幣 CVL，以及貨幣持有者。Civil 的社群則是包含了所有參與 Civil 生態環境的人，無論是否持有 CVL 貨幣。而新聞編輯室 (Newsroom) 是 Civil 最基本的運作單位，可以是由個人或者是群體組成，同樣也可以是貨幣持有者，Civil 目前有十家以上的新聞編輯室，同一個新聞產製者可以出現在多個新聞編輯室 (圖三)。新聞編輯室代表 (Newsrom Officier) 則是代表新聞編輯室的人。如上段所述，Civil 擁有自己的憲章 (Charter)，想要加入 Civil 的新聞編輯室必須同意該憲章。另外，Civil 有一個登記名冊 (Civil Registry)，由 Civil 內的貨幣持有人，決議通過得以加入 Civil 的新聞編輯室的列表(圖四)。Civil 也組織了一個基金會 (Civil Foundation)，其是一個獨立的組織，負責協助 Civil 營運，並且選出 Civil 委員會的創始成員。Civil 委員會可受理貨幣持有者訴願的單位，其可以推翻社群的決議，但是社群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否決委員會的決定。

²³ https://theethereum.wiki/w/index.php/ERC20_Token_Standard

圖三：Civil 新聞編輯室的示意圖












圖四：Civil 登記名冊



All approved Newsrooms should align with the [Civil Constitution](#), and are subject to Civil community review. By participating in our governance, you can help curate high-quality, trustworthy journalism.

All Approved Newsrooms (25)

Sort by: Most recent

 Block Club Chicago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Block Club Chicago is a nonprofit, neighborhood news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delivering reliable, nonpartisan and essential coverage of Chicago's diverse neighborhoods.</p>	 Cannabis Wire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Cannabis Wire is an independent publication covering the multi-billion dollar cannabis industry, focusing 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lexities that come with legalization.</p>	 Documented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Documented covers New York City's immigrants and the policie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We are an independent and nonpartisan publication.</p>
 Hm Daily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A place to say the things nobody else might say and to listen for the things we haven't heard yet. Led by farm Gawker / The Awl editor Tom Scocca.</p>	 Popula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Popula is an all-weekly. But all-daily. And local to the world publication. Brought to you by leading voices from the New Yorker, LA Times, The Village Voice and others.</p>	 Sludge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Sludge investigates the shadowy ways that special interests captured America's political system, revealing hidden network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p>
 Stable Genius Productions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Stable Genius Productions is on a mission to help people navigate personal and global change.</p>	 The River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The River is the Hudson Valley news outlet offering in-depth coverage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on issues of national importance, investigating underreported topics and connecting the region to...</p>	 The Small Bow Approved Date: 2018-05-12 05:23 PM EST View Details 1,000 CVL Amount of tokens deposited <p>The small bow is an independent, editorially-minded voice, revealing the ignoble truths about addiction and recovery.</p>

LOAD MORE

Civil 使用智慧合約將新聞內容寫出區塊鏈之中，合約中包含了作者、內容與更新版本等資訊（圖五）。

圖五：Civil 發布內容的智慧合約²⁴

```
@dev Emits `ContentPublished`, `RevisionUpdated` and optionally `ContentSigned` events
*/
function publishContent(
    string contentUri,
    bytes32 contentHash,
    address author,
    bytes signature
) public requireRole(ROLE_EDITOR) returns (uint)
{
    uint contentId = contentCount;
    contentCount++;

    require((author == 0x0 && signature.length == 0) || (author != 0x0 && signature.length != 0));
    contents[contentId].author = author;
    pushRevision(contentId, contentUri, contentHash, signature);

    emit ContentPublished(msg.sender, contentId, contentUri);
    return contentId;
}
```

理想上，Civil 的讀者可以在不知道任何虛擬貨幣的知識下，利用他們原本的貨幣購買新聞內容。Civil 設定了一條水線（Waterline）區分法幣與 CVL 的應用範圍（圖六）。在水線之上，讀者與其他新聞贊助者，跟新聞編輯室之間的交易，是使用任何法幣；水線之下，在 Civil 中要參與投票與檢舉等機制，則必須持有 CVL 貨幣。在稍後介紹的 CVL 幣發行方式，可以看到想要購買 CVL 貨幣，需要有相同程度的虛擬貨幣知識，這也有可能對於一般想要購買 CVL 貨幣的讀者造成阻礙。

²⁴<https://github.com/joincivil/Civil/blob/master/packages/contracts/contracts/newsroom/Newsroom.s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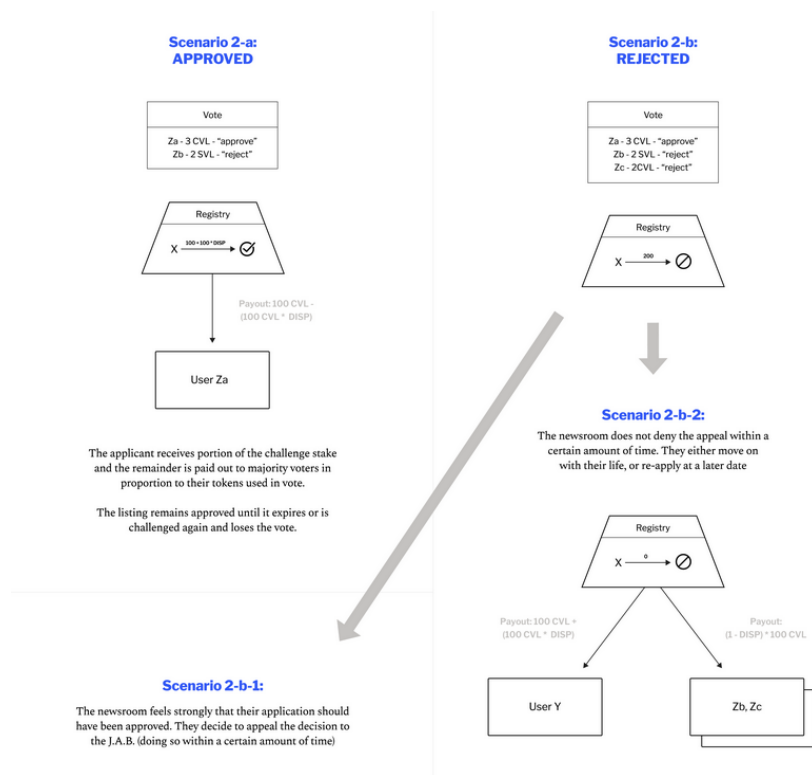
圖六：Civil 平台上的讀者、社群成員與新聞產製者之間的關係示意圖²⁵



Civil 的創立目標與系統構成，都相當著重於系統內部成員的自我管理，Civil 採取的是社群內的投票機制。在 Civil 的白皮書當中 (Iles, 2018, May 11) 說明，當有一個新的新聞編輯室想要加入 Civil，必須說明其目標、讀者社群，以及如何在社群中獲取經費，與運用經費。接著是送出名冊、簽署《Civil 憲法》，最後則是需要購買貨幣。當以上的程序完成，申請者必須支付 CVL 貨幣作為押金，將申請書送到社群內進行審核，社群的參與者如果對該編輯室有意見，可以對新聞編輯室進行挑戰 (challenge，圖七)，由社群內的人進行投票，如果投票結果對於新聞編輯室有利，則挑戰者所擁有押金就會被分給新聞編輯室與投多數票的參與者；反之則新聞編輯室就會被移除於登記名冊外，同時押金要分給挑戰者與投多數票的參與者。如果使用者對於 Civil 委員會的決議不滿，也可以利用 CVL 貨幣的押金進行訴願與挑戰，也可以要求委員會修改系統參數。需要更動到《Civil 憲法》層級的修改，會需要修改智慧合約。

²⁵ <https://joincivil.com/how-it-works/>

圖七：Civil 的挑戰機制²⁶



Civil 的新聞編輯室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陸續上線，一開始仍然是一般由 WordPress 所建置的網站 (Owen, 2018, June 13)。Civil 虛擬貨幣 CVL 的公開販售，要到 2018 年 9 月才開始進行。CVL 的販售是委由 Token Foundry 網站²⁷，根據網站內容，CVL 幣的總數量是一億枚，開放給使用者購買的數量是 3400 萬枚，最低購買數量是 70 枚，一個 CVL 幣兌換 0.71 美元²⁸。其規定如果要加入該網站購買虛擬貨幣，必須通過需要一定程度的區塊鏈知識測驗。不過其內容頗為困難，即使是 Civil 當中的新聞編輯室 ZigZag 的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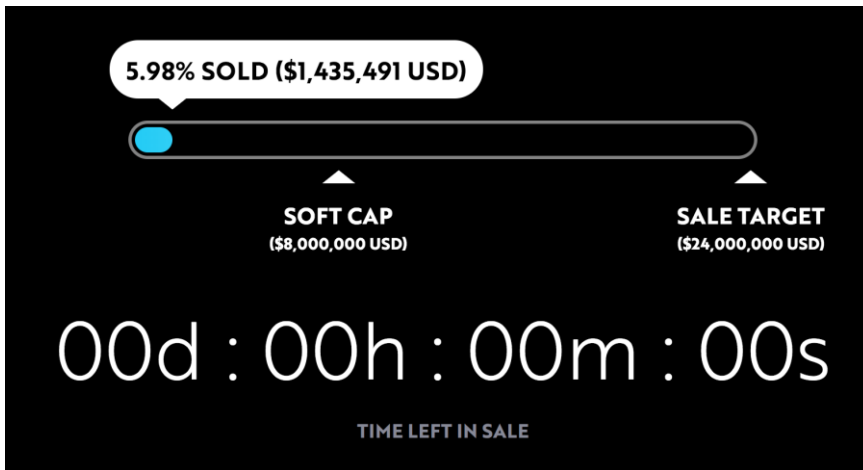
²⁶ <https://joincivil.com/how-it-works/>

²⁷ <https://tokenfoundry.com/>

²⁸ <https://tokenfoundry.com/projects/civil>

創立者也無法通過測驗 (Wang, July 25, 2018)。這也反映即使當初希望能讓一般讀者不需要懂得區塊鏈的知識，也能在 Civil 上進行消費的目標，必須面臨到與第三方貨幣代售商既有規範的衝突。此外，因為 CVL 是建構在以太坊區塊鏈的智慧合約之上，使用者也無法透過一般的貨幣購買 CVL，而必須透過以太坊的以太幣 (ETH) 購買 CVL (Coolidge, 2018, August 3)，這也增加了購買流程的複雜度。Civil 此次的貨幣發行因為沒有達到預設的購買數目，僅銷售出預期的 5.98%，所以在 2018 年 10 月 15 日宣告失敗，也必須將所有募得的款項還給購買者。他們計劃在未來簡化購買貨幣的流程，再進行一次貨幣發行募資 (Owen, 2018, October 16)。

圖八：Civil 僅銷售出預期的 5.98%²⁹



二、Bitpress³⁰

²⁹http://www.niemanlab.org/2018/10/civils-token-sale-has-failed-now-what-refunds-for-on-e-thing/?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1d802c524b-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1d802c524b-396233593

³⁰ <https://bitpress.network/>

Bitpress 是由美國一家專門將傳統的媒體廣告轉為線上內容的公司 OwnLocal 所開發，在他們的白皮書當中，一開始就定位 Bitpress 的作用如同比特幣對於金錢，他們描述自己是「Bitpress 以區塊鏈為基礎的信任帳本，這個帳本可藉由記者的去中心化網路，可以用來決定新聞的可信度 (Bitpress is a blockchain--based ledger of trust that leverages a decentralized network of journalists to det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news.)」(Armbrust et al., 2018, March 10, p.1)，他們提到以下幾點他們系統可以讓個人記者或者是新聞組織依照他們原本的報導樣式出版，同時可以對發表的文章內容進行可信度投票。而認證產生的結果也同時作為辨識共識與偏見之用。他們藉由將資料紀錄在公開與透明的分散式區塊鏈系統上，預防審查與允許資訊的自由交換。這個系統將會對於包含新聞組織、記者與讀者的參與者有所報酬回饋，建立一套新聞業可以維持生計的新模型。

Bitpress 認為網路重新定義了人與人彼此之間的關係，傳統媒體所扮演的資訊守門員的機制已經不存在於讀者與資訊中間，人們從 Google 搜尋、Youtube 影片與社交媒體中獲得他們所需要的資訊。而他們也指出了目前媒體業面臨到廣告與訂閱率的下降，而主要的廣告收入反而是被 Google 與 Facebook 這類聚集媒體新聞內的公司所賺走。財務上的緊縮，使得不少媒體公司都必須縮減人力，而這也導致了能花在事實檢查上的人手不足，造成新聞品質的低落。

他們所提出的 Bitpress 的概念，是將原本存在於新聞產業中的新聞記者、新聞組織、出版商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利用區塊鏈當中的「交易」的概念連結在一起。XBP 是 Bitpress 當中的交易貨幣，其可以用於小額支付、付費牆與訂閱制度中，這三種制度都是透過智慧合約完成。出版商可以設定針對一篇文章付款，也可以設定針對區塊鏈內的所有文章預付款項。出版商也可以設定閱讀期間的訂閱制，所有使用者也可以設定當他們在閱讀區塊鏈上的文章時，自動付款給出版商。

告示板是被送到 Bitpress 網路內的書寫內容，其同時也是作為建構區塊鏈的基本區塊，當出版商要將告示板發送到 Bitpress 的網路上時，需要依照網路擁擠狀況與內容大小支付 XBP。這個機制是用以防止廣告內容，告示板

可以以文章的形式發表，其內容為新聞故事，以及對於其他文章的引用與評價。每一個文章必須包含一個作者與出版商，當文章被發佈到網路上時候，就由某個網路上的威力節點（**Power Node**）將這個類型的告示板寫入到區塊鏈之中。如何將文章呈現給讀者，則是由與區塊鏈串接的應用程式決定。另外一種發表形式是賞金，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告示板，其上面可以標注想要看到來自哪個作者或者主題的文章，然後給予賞金。其他出版商與作者也可以競標賞金。其他使用者也可以藉由小費增加整個賞金告示板的賞金額度，但是賞金越高並不代表由賞金而產生的文章有更高的可信任度。當文章有誤的時候，可以藉由勘誤形式的告示板更新有錯誤的文章。因為區塊鏈的內容無法修改，所以是將勘誤附在文章之後，產生新的告示板加入到區塊鏈之中。而使用者端的應用程式，在發現有勘誤的文章出現，就顯示更新過後的文章，而不是原始文章。勘誤可以增加新聞的透明度，藉以檢視某個出版商是否一直出錯。作者也可以自己發表勘誤，不一定要依靠出版商。

新聞文章可以彼此引用，引用同時也是 **Bitpress** 中的可信度評價 **BPR**（**Bitpress Rank**）基礎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其用來打擊假新聞的方法之一。引用是鑲嵌在告示板之中，當中會標示網址或者 **Bitpress** 網路內的文章標號，可以給予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系統層級的告示板，如勘誤與賞金的引用中的評價皆為中性，因為其並非是用於評估文章內容。

在 **Bitpress** 網路中的參與者，有作者與出版商這二種帳號類型，示意圖如圖九。作者帳號可以發布文章與賞金告示板，但是如果發布其他類型的告示板就必須有出版商帳號，作者的網路地址就是他們收款項的虛擬貨幣的錢包地址。出版商帳號是作為 **Bitpress** 上的一個網路節點，其作用就類似現實世界中的新聞組織。出版商可以發任何形式的告示板，且負責讓 **Bitpress** 網路內的人都能收到。出版商要發布文章與賞金告示板，必須至少包含一個作者在內。除了購買告示板的文章增加出版商的收入外，還可以透過智慧合約，進行捐款給出版商。

Bitpress 採用的共識協定是信任證明，如同共識協定在比特幣中是用於驗證產生的區塊是否是有效，**Bitpress** 的共識協定也是用於產生有效的區塊。其產生的區塊鏈的方式混合了工作證明（**Proof of Work, PoW**）以及股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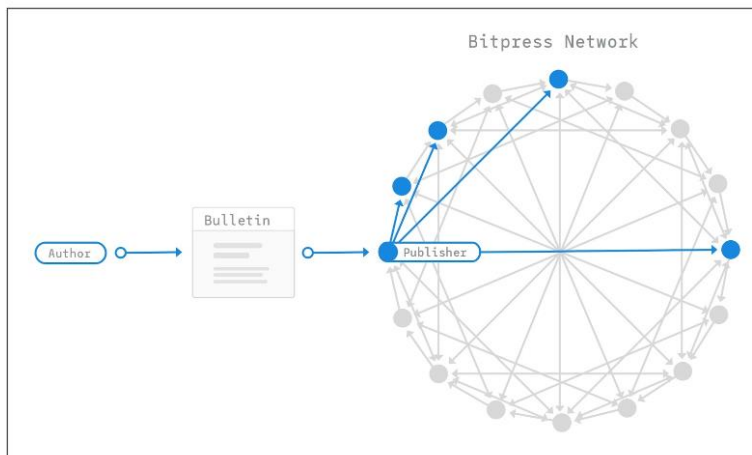
證明 (Proof of Stake, PoS)。產生新的區塊需要計算累積到前一個區塊的 BitpressRank，這部分仍然是採用工作證明的方式，但是越有誠信的新聞組織，越有機會被選為創造出新的區塊的人選，則是採取股權證明的方式。BitpressRank 是 Bitpress 網路內用來評量新聞可信度的方式。計算的方式的步驟如下：

- (一) 第一步先計算出版商的信任值。這是根據出版商各自所有告示板內的正面引用跟負面引用的數目，也就是其對於其他出版商的評價。單個出版商各告示板的評價，最後會匯總為 Bitpress 網路內該出版商的總評價³¹。
- (二) 第二步是計算告示板的信任值。這是根據其他告示板的引用連結到該告示板所給予的信任數值，這個是參考了 Google 在網頁重要度排名所使用的 PageRank 演算法³²，信任度比較高的出版商的告示板內引用的連結所產生的重要性，會高於信任度比較低的出版商所產生的重要性。為了確保這個計算只考慮到可信任的來源，所以出版商可以給予其他告示板的信任數值，會根據給予的出版商本身在系統內的信任數值給予權重計算。
- (三) 出版商本身必須擁有一定數目的被引用，才會被視為是可信任的來源。同時如果出版商持續活躍於網路中，就會給予較高的信任數值，反之則會調降其信任數值。

³¹ 這邊 Bitpress 的白皮書的演算法並沒有很明確寫明總評價是給予給評價的出版商，或者是被給予評價的出版商，有待之後更詳細的資料。

³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geRank>

圖九：Bitpress 網路內的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關係示意圖³³



三、Matters³⁴

相較於 Bitpress 與 Civil 皆是以新聞為主要的內容產生與傳播，以華文世界讀者為對象的 Matters 則是將自身定位為「基於社群的 UGC 優質內容生產平台」(Matters, 2018)，Matters 要解決的問題是「好內容到底要怎麼活下去」。創辦人之一的張潔平認為現在的網路技術只為廣告服務，而嚴肅的深度內容無法吸引到很多流量，造成收入無法養活內容生產者（李柏鋒，2018 年 4 月 9 日）。Matters 參考 Steemit 的商業模式，希望能讓內容生產者獲得收入，持續產生優質內容，其介面也類似 Steemit（圖十）。

³³ <https://bitpress.network/assets/bitpress-whitepaper.pdf>

³⁴ <https://matters.news/>

圖十：Matters 發言列表³⁵



Matters 的虛擬貨幣稱為 MAT，在 Matters 發文的人必須支付 MAT 作為發表費用。社群互動參與者藉由參與文章的討論與點讚，可以獲得 MAT 作為回饋。除了個人外，還有機構參與者，透過 Matters 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建置專屬分布平台與購買文章版權，以及散佈內容。持續產生優質內容的人，會擁有比較高的信用度。這個評價機制是希望能將人拉出同溫層，看到優質文章，而不是大家都在看的文章。他們也允許實體商家，利用 MAT 來進行交易的店家，如購買咖啡(李柏鋒，2018 年 4 月 9 日；Matters Lab, 2018 年 5 月 31 日)。

一般的使用者，無須付費即可以看到內容，但是在 Matters 按讚的人必須付費。資深用戶與資淺用戶同樣花一個 MAT 幣按讚，會根據權重計算作者收到的 MAT 幣的數目，從資深用戶收到的 MAT 幣數目會比較多。Matters 有公共基金的機制，總共有一億枚 MAT 幣，上述讚賞從資深用戶取得較多的 MAT 幣，多出的 MAT 幣是由公共基金給予。另外有貨幣儲備，總共有九億枚 MAT 幣，用於維持貨幣匯率穩定。之後會區分投資貨幣，用於投資，

³⁵ <https://matters.news/>

有可能升值；消費貨幣，用以給予讚賞（李柏鋒，2018年4月9日；Matters Lab, 2018年5月31日）。

相較於前二個區塊鏈計畫，Matters 擁有最複雜的架構，根據其架構圖(圖十一)，他們擁有三個區塊鏈，分別為智能合約（智慧合約）、交易紀錄與內容區塊鏈。前二者目前所知只有一條區塊鏈，這也使得 Matters 必須處理鏈與鏈之間的同步，增加了操作上的複雜度。

圖十一：Matters 架構圖³⁶



Matters 產生區塊的規則也相當複雜，使用者如果想產生區塊，其電腦不只要具有完成解題的能力（Proof of Work, PoW），同時期電腦還必須要有儲存夠多的內容，用以分享給其他人的能力（Proof of Sharing, PoSh），但是要具有一定的權重（Proof of Value, PoV），這也使得區塊的產生可能會偏向由具有儲存空間夠大，以及較早參與 Matters 而權重較高的人所取得，不利於一般使用者參與產生區塊。而其類似計畫經濟的貨幣儲備規劃，也使得 Matters 需要有一個中央單位持續監控貨幣匯率，與區塊鏈所講求的去中心化特性背道而馳。

³⁶ <https://goo.gl/qdcRfg>

四、綜合比較與分析

上述三者皆提出要藉由區塊鏈建立產出優質內容的平台，他們採用了不同的方式，如表一。

表一：三個區塊鏈平台的比較

	Matters	Bitpress	Civil
區塊鏈選擇	超級帳本	以太坊	以太坊
公有鏈或者是私有鏈	私有鏈	私有鏈	暫時無資訊
共識機制	PoW、PoSh、PoV	結合 PoS 與 PoW	PoW
發文是否需要付費	是	是	無
評價機制	讀者針對文章進行評價	對出版商以及出版商的引用來源進行評價	針對新聞編輯室進行評價
是否去中心化	早期由少數成員確認整體議題風格，之後也是會員申請也是要經過社群同意	由 Bitpress 決定擁有多少信任值以上的出版商，才能進行告示板的信任值計算	委員會有權推翻社群決議，社群成員也能透過支付押金進行申訴
虛擬貨幣轉法幣機制	交易所	未來可以與其他虛擬貨幣轉換	交易所
貨幣類型	自創貨幣	以太坊 ERC20 規格的自創貨幣	以太坊 ERC20 規格的自創貨幣
發文者如何獲取收益	獲得 MAT 幣	獲得 XBP 幣	獲得 CVL 幣
呈現型態	獨立平台	鑲嵌於其他網路應用，如網頁	獨立平台
推薦系統	編輯與社群推薦	引用與出版商	暫時無資訊
假新聞處理方法	暫時無	BPR 信任度	挑戰機制

區塊鏈與推薦系統以及假新聞之間的關係其實並不直接，但是 **Bitpress**、**Matters** 與 **Civil** 都提到了維持新聞品質這個功能，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新聞系統並非單只是購買系統，而且也是一套新的新聞管理系統。他們希望在這個系統中建立新的審查機制，或者是說信任評價機制 **Bitpress** 採取較為去中心化的新聞內容管理方式，依靠計算信任值，**Civil** 提到了 **Wikipedia** 的自我管理方式，藉由不同使用者的彼此審查，確認新聞的可信性。**Matters** 則是會有中央或者是他們所謂的社群的審查內容可信的問題。雖然張潔平強調不應該像新聞編輯部由少數人設定議題與避免同溫層，但是她選擇由少數意見領袖設定 **Matters** 用戶的格調（李柏鋒，2018 年 4 月 9 日），這個方式同時建立具有同樣格調與限定議題於意見領袖所感興趣的領域的用戶同溫層。這與區塊鏈本身的去中心化的特性不同，所以他們需要在區塊鏈之上再加上額外的軟體架構，用以實作他們對於內容管理的要求。

而對於新聞內容的評價部分，**Bitpress** 的信任值計算對於原本比較有名與資金比較充裕的新聞媒體公司比較有利，**Civil** 提供的是相較之下較為地方化的新聞收費解決方式，他們協助地方的新聞媒體可以從區塊鏈中獲取營運的資金，如“**Chicago Block Club**”是由原本芝加哥的地方新聞媒體被解散的“**DNAInfo Chicago**”的成員，在 **Civil Media** 的協助下，獲得資金，在 **Civil** 的區塊鏈上建立他們的新聞編輯台（**Stevens, 2018, February 6**）。

區塊鏈本身的貨幣機制，使得新聞產業的產出可以相對獨立，有新的系統方式，而不必依賴既有的生態系統。而且虛擬貨幣在這三個平台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僅僅是單純的交易功能，**Civil** 利用是否持有 **CVL** 貨幣來決定是否有權進行投票與挑戰，這類似唯有持有公司的股票的股東才能在股東會上投票，不過他們也面臨必須能成功吸引夠多的投資人，願意購賣他們所發行貨幣，才能使該機制運行，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的貨幣發行失敗之後，也使得該制度無法成功建立。**Bitpress** 則是發文者也必須要付費，其用意是避免濫發廣告信，但也同時建立起唯有持有貨幣且具有出版商帳號的人，才能在 **Bitpress** 平台上發布新聞以及評價其他出版商。而 **Matters** 的貨幣機制是目前三者當中最複雜的，因為其具有權重機制，導致每一個貨幣的價值不相等，同時又有外部能進行匯兌的貨幣，以及內部的私有貨幣，而這當中的兌換機

制的控制權完全掌握於 Matters 本身，相較於其他二者藉由持有貨幣成為藉由挑戰與引用，具有影響平台上新聞評價的成員，Matters 的貨幣持有者對於新聞只有購買的功能，而同樣的貨幣在權重機制下，會因為給予貨幣者的身份的差異，發文者所實際收取到的金額會有所不同，這有可能導致發佈新聞者都只發佈能給予較多貨幣者所喜歡的文章，造成了 Matters 所一直強調要避免的同溫層。

同時，區塊鏈新聞生態體系對於新聞媒體而言，跟過去以往的現金收入不同，所有的交易的收入都是來自於虛擬貨幣，尤其是根據以太坊的 ERC20 規格的自創貨幣，其貨幣價值是發行者決定，當需要將虛擬貨幣轉為現實世界的貨幣的時候，交易過程又是再中心化，而交易所不如實體銀行的保安措施完善，往往也伴隨著較高被駭客攻擊的風險（Al-Saqafa & Seidler, 2017, 343）。記者或者是新聞媒體公司必須到交易所才能兌現為法幣，同時也伴隨著不穩定的幣值匯率變化，記者的收入如同股票一般時時刻刻都有高低起伏。

這三個專案目前都還沒有真正將內容與區塊鏈結合，如果根據區塊鏈原本的設計，當區塊鏈上的區塊越多，每次要將交易紀錄埋入區塊中的時間就越長，雖然讀取文章內容的速度快速，但發文與購買文章所花費的時間越來越長，而這或許是必須要克服的嚴重技術問題。同時原本區塊鏈是會將區塊鏈存放在包含 Bitpress 等交易平台的擁有者，以及一般使用者的電腦當中，但是隨著區塊鏈越長、紀錄內容越多，檔案會越來越大，會越來越佔據使用者的電腦空間，降低使用者使用新聞區塊鏈的意願。

另外，如果將新聞內容都放在區塊鏈上，因為區塊鏈上的內容，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看得到，就必須在先將新聞做加密後存放在區塊鏈上，而當使用者要讀取新聞內容，再由使用者端的閱讀裝置進行解密。這將會造成如果要根據讀者的閱讀習慣推薦內容的時候，都必須把區塊鏈上的文章都要解密之後，才能辨識內容然後做推薦判斷。當區塊鏈越長，解密的時間也會越長，這時就必須利用其他的機制，如將區塊鏈視為大的資料庫藉由大數據的平行處理，去取得新聞內容，或者是在另外一個資料庫存放未加密的新聞內容資料。不過新增一個儲存所有內容資料庫，這就會打破區塊鏈去中心化檔案控

管，如果該資料庫不再運作，新聞區塊鏈系統或許就無法繼續運行；且因為獨立的資料庫有可能紀錄被竄改，反而沒有原先區塊鏈紀錄不可抹滅的特性。

如果希望能藉由區塊鏈的分散式結構，以達到無法修改出版紀錄的目的，根據原本的工作證明（PoW）的方法，則在網路架構上，需要有一定數目以上的電腦同時加入區塊鏈當中，不然仍然有可能被其他運算能力較強的電腦修改紀錄。存放新聞內容與交易紀錄的區塊鏈本身就如同一個資料庫，雖然 Bitpress 有提出計算信任值的公式，但是並沒有分析當新聞內容不斷累積，其所需要計算的時間是否會過長；而 Matters 與 Civil 的人工檢查與挑戰機制，更無法處理當資料越來越多的狀況。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結合大數據對於資料的處理是必須要採取的方式之一，藉由建立自動判別文章發文者的過往發文紀錄與購買者的紀錄，提供使用者在購買文章時候的參考與推薦。避免過長等待交易確認的時間，加快讀者購買文章的速度，則可以藉由修改區塊挖掘的演算法，如將耗費資源的工作證明演算法，改為速度較快的股權證明演算法，或者股份授權證明機制（Delegated Proof-of-Stake Consensus, DPoS），藉由少數被大眾所選出的節點進行區塊產生與驗證，不過以上的方式都需要在私有鏈才能進行。另外一個路徑則是如同韓國的現代公司將公有鏈與私有鏈混合的方式，藉由私有鏈的快速產生區塊，將私有鏈所在的生態系統串接到公有鏈上（Price, 2018, January 22）。

綜上所述，三個計畫分別採用以太坊與超級帳本作為區塊鏈平台，而這兩個區塊鏈本身具備的智慧合約與虛擬貨幣，有了商業營運的基本環境，但是新聞內容的推薦與購買方式，則仍然存在著貨幣匯率的不穩定，以及存取內容的時間可能過長問題，這都有待進一步結合其他機制，但仍然保留區塊鏈去中心化且紀錄不可抹滅的特性，以完善整體新聞交易的生態體系。

捌、結論

新聞業用區塊鏈來產生新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模式，其主要解決的問題是過於依賴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的演算法對於讀者群與新聞產業的任意

中心化操縱，透過智慧合約與不可修改的特性，使得新聞產業能維持一定時間的訂閱戶數目，使得虛擬資金穩定，能持續發展新的新聞內容與形式。

不過在形式上，其與一般內容發文的網站如 Steemit 的區別是在於可信度的計算。而其仍然有隱憂存在於依靠其他人的評價給予可信度的評判，例如當有一個資金充沛的政治組織加入如 Bitpress 的網路當中，其可以產生大量假的讀者帳號，大量發文給予其他文章與新聞社負評，而給予自己新聞社所發行的文章有大量的好評，形成虛假的可信度，這也是目前需要面對的問題。而 Matters 與 Civil 一開始就會先篩選成員，後者是由社群成員進行挑戰，如果有爭議會再由委員會處理；而 Matters 側重由少數人先確認用戶格調，同時會有人工檢視是否有文章特別推薦，而當文章越多，審核會越來越花時間。在 Matters 與 Civil 當中的人所扮演的角色重於演算法，但這同時也可能帶來效率上的低落與其他偏見。

區塊鏈與新聞媒體的結合，目前在技術與匯率兌換上需要克服障礙，但同時也開啟了新聞生態系不同的商業模式。在將虛擬貨幣作為資源上，因為發文需要支付費用，當有帳戶濫發廣告文，其所擁有的貨幣就會快速消失，最後當沒有貨幣，也就喪失了可以發文的資源，如此一來可以避免廣告文的擴散。在技術上，新聞媒體中心化的產製方式，與區塊鏈的去中心化仍然有待尋求比人工檢視內容更好的解決方案，使得每一個參與者都能平等地發文與評論，例如其在區塊鏈上無法被修改的發言紀錄，則可追蹤謠言與假新聞，以維持新聞媒體所需要的一程度對新聞內容品質的把關。當區塊鏈上的貨幣與現實生活中的法幣能有穩定兌換關係後，同時擁有足夠多的貨幣與持有者在區塊鏈上，並且能根據貨幣動力學建立貨幣使用的穩定性，將會使得區塊鏈如同重要基礎設施，可以被穩定地且廣泛地運用；其所具有的不可抹滅性，也使得此種新的數位型態的新聞內容會成為可信賴的訊息來源，增加大眾對於新聞的信賴度，使得新聞產業擺脫假新聞與同溫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再次贏回大眾的信賴。

參考書目

- 〈Matters | 創作有價〉（無日期）。取自 <https://info.matters.news/>
- 李柏鋒（2018年4月9日）。〈張潔平離開端傳媒，創辦 Matters：以區塊鏈為底層技術的內容平台〉，《INSIDE》。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2018/04/09/matters>
- Abdulkader, A., Lakshmiratan, A., & Zhang, J. (2016, June, 2). Introducing DeepText: Facebook's text understanding engine.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code.facebook.com/posts/181565595577955/introducing-deeptext-facebook-s-text-understanding-engine/>
- Al-Saqafa, W., & Seidler, N. (2017).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social impac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head. *Journal of Cyber Policy*, 2(3), 338–354.
- Allcott, H., & Gentzkow, M. (2017).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2), 211–236.
- Armbrust, L., Oetker, E., Dawe, J., Halasz, A., & Beasley, Z. (2018, March 10). Bitpress: News on the blockchain. *Bit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bitpress.network/assets/bitpress-whitepaper.pdf>
- Balmas, M. (2012). When fake news becomes real: Combined exposure to multiple news source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inefficacy, alienation, and cynic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3), 430–454.
- Burrell, I. (2017, March 23). How the New York Times' mobile-first strategy has turned millennials into its biggest audience. *The Dru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drum.com/opinion/2017/03/23/how-the-new-york-times-mobile-first-strategy-has-turned-millennials-its-biggest>
- Coolidge, M. (2018, August 3). Why you need ETH to purchase CVL. *Civil*.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joincivil.com/why-you-need-eth-to-purchase-cvl-de99bce1cfb7>
- Das, A., Datar, M., Rajaram, S., & Garg, A. (2007). Google news personalization: Scalable online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WWW 200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2007.org/papers/paper570.pdf>.
- Desrosiers, C., & Karypis, G. (2010).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neighborhood-based recommendation methods. In F. Ricci, L. Rokach, & B. Shapira (Eds.), *Recommender systems handbook* (pp.107-145). Boston, MA: Springer.
- Gantait, A., Patra, J., & Mukherjee, A. (2017, January 9). Integrate device data with smart contracts in IBM Blockchain. *IB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bm.com/developerworks/cloud/library/cl-blockchain-for-cognitive-iot-aps-trs/index.html>
- Graves, L. (2016). *Deciding what's true: The rise of political fact-checking in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im, M., Graefe, A., & Brosius, H. (2017) 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 *Digital Journalism*, 6(3), 330-343.
- Hegeman, J. (2018, May 23). Facing facts: Facebook's fight against misinformation.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8/05/facing-facts-facebooks-fight-against-misinformation/>
- Hileman, G., & Rauchs, M. (2017). Global blockchain benchmarking study.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bs.cam.ac.uk/fileadmin/user_upload/research/centres/alternative-finance/downloads/2017-09-27-ccaf-globalbchain.pdf
- Iles, M. (2018, May 5). The civil constitution (Beta). *The Civil Media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joincivil.com/the-civil-constitution-beta-64460a181e08>
- Iles, M. (2018, May 11). The civil white paper. *The Civil Media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joincivil.com/the-civil-white-paper-3e6c6f72dd9e>
- Lee, M., & Guinee, S. (2018, April 17). The New York Times has signed up a lot of subscribers. Here's how it plans to keep them.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4/the-new-york-times-has-signed-up-a-lot-of-subscribers-heres-how-it-plans-to-keep-them/>
- Liu, J., Dolan, P., & Pedersen, E. R. (2010). Personalized news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click behavior. *Google AI*. Retrieved from <https://ai.google/research/pubs/pub35599>
- Marchi, R. (2012). With Facebook, blogs, and fake news, teens reject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6(3), 246–262.
- Matters Lab (2018年5月31日)。〈Matters 項目草案：重塑內容價值鏈〉，《Matters Lab》。取自 <https://medium.com/matters-lab/matters-%E9%A0%85%E7%9B%AE%E8%8D%89%E6%A1%88-%E9%87%8D%E5%A1%91%E5%85%A7%E5%AE%B9%E5%83%B9%E5%80%BC%E9%8F%88-ae9f9aa98249>
- Nakamoto, S. (2008).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Retrieved from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 Nelson, J. L., & Taneja, H. (2018). The small, disloyal fake news audience: The role of audience availability in fake news consump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18.
- 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Innov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esscouncil.org.au/uploads/52321/ufiles/The_New_York_Times_Innovation_Report_-_March_2014.pdf
-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A. L., & Nielsen, R. K. (2018, June 22).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News%20Report%202017%20web_0.pdf
- Otto, L., Glogger, I., & Boukes, M. (2016). The softening of journalist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model of sensationalism, soft news, infotainment, and tabloid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7, 136-155.
- Owen, L. H. (2018, April 19). Facebook's news feed changes appear to be hurting — not helping — local news.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4/facebooks-news-feed-changes-appear-to-be-hurting-not-helping-local-news/>
- Owen, L. H. (2018, June 13). Civil promises that you don't have to care about blockchain

- to care about what it's doing (also, its first newsrooms just launched).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6/civil-promises-that-you-dont-have-to-care-about-blockchain-to-care-about-what-its-doing-also-its-first-newsrooms-just-launched/?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f426a1dca8-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f426a1dca8-396233593
- Owen, L. H. (2018, October 16). Civil's token sale has failed. Now what? Refunds, for one thing — and then another sale.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10/civils-token-sale-has-failed-now-what-refunds-for-one-thing/?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1d802c524b-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1d802c524b-396233593
- Price, C. (2018, January 22). On blockchain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the likely road ahead. *Blockchain at Berkeley*. Retrieved from <https://blockchainatberkeley.blog/on-blockchain-and-the-internet-of-things-f6b0b2deb528>
- Rader, E., & Gray, R. (2015). Understanding user beliefs about algorithmic cura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 *Proceeding CHI'15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173-182.
- Ray, J. (2018, May 10). Proof of stake FAQ. *Ethereum*. Retrieved from <https://github.com/ethereum/wiki/wiki/Proof-of-Stake-FAQ>
- Stevens, H. (2018, February 6). 3 months later, Block Club Chicago picks up where DNAINfo left off. *Chicago Tribu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lifestyles/stevens/ct-life-stevens-block-club-dnainfo-staffers-0206-story.html>
- Szabo, N. (1994). Smart contract. *Nick Szabo*. Retrieved fro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60620185026/http://szabo.best.vwh.net/smart.contracts.html>
- Szabo, N. (1996). Smart contracts: Building blocks for digital markets. *Nick Szabo*.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smart_contracts_2.html
- Twitter Public Policy(2017, September 28). Update: Russian interference in 2016 US election, bots, and misinformation. *Twitter*.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twitter.com/official/en_us/topics/company/2017/Update-Russian-Interference-in-2016--Election-Bots-and-Misinformation.html
- Wang, S. (2018, July 25). Want to support journalism with cryptocurrency on Civil? First you must pass this really hard quiz.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7/want-to-support-journalism-with-cryptocurrency-on-civil-first-you-must-pass-this-really-hard-quiz/?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f936b4a298-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f936b4a298-396233593

Blockchain and Journalism – New Type of Purchase and Recommendation Platform for News

Jung-Hua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y background of blockchain and three journalism-related projects——Civil, Bitpress and Matters. Blockchain was proposed by Satoshi Nakamoto in 2008 and he released Bitcoin, the first cryptocurrency based on blockchain, in 2009. Blockchain is a decentralized ledger and it contains transactions in blocks. The difficulty of modifying data avoids double spending and keeps Bitcoin stable. In 2015, another blockchain-based cryptocurrency system, Ethereum, brought the feature of smart contract into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 can be executed without the third-party agent, so it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Civil, Bitpress and Matters aim to build news/content distribution platforms based on cryptocurrency and develop new news recommender system to break the echo chamber. If the exchange between cryptocurrency and fiat currency is stable, it will create a sustainable ecosystem for journalism industry. Meanwhile, the tamper-proof trait of blockchain can trace origins of new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Blockchain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help journalists bring their readers/audience back and have their trust again.

* Jung-Hua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emileliu@mail.shu.edu.tw

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 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

胡元輝*

本文引用格式

胡元輝 (2018)。〈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
《傳播、文化與政治》，8:37-76。

投稿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

* 作者胡元輝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email:telyhhu@ccu.edu.tw

《摘要》

假新聞議題受到全球高度關注之後，社群媒體在假新聞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亦廣受議論。在言論自由與社會責任的糾葛之下，商營社群媒體企圖以若干消極的自律作為來解消外界壓力。本研究從政治經濟學取徑檢視商營社群媒體的運營機制及其所形塑的公共領域，期能釐清參與型與企業型兩種社群媒體概念的意義與侷限，並透過社群媒體本質與功能的釐清，為社群媒體的問責機制理出可資依循的解決方向，進而探討公共型社群媒體在當前資訊環境中的可能與挑戰。

關鍵詞：公共領域、企業型社群媒體、自律、社群媒體、假新聞

壹、社群媒體與假新聞

假新聞或假訊息（fake news／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近年來引發全球性關注，此一與人類傳播史幾乎同其久遠的課題何以會在近年發燒？頗多研究者認為與社群媒體此一新興傳播工具的出現具有密切關係。因為它不僅大幅降低資訊傳播的成本，而且能夠憑藉社群成員之間的信賴關係與幾近真空的法令規管，讓假新聞的傳布擁有更為便利的環境條件（Carson, 2017, March 16）。

此外，數據顯示，此一議題之所以引發全球性的廣泛議論，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係重要觸媒。依據 google 搜尋熱度的趨勢變化顯示，網路使用者搜尋 fake news 一詞的頻率自 2016 年 11 月起陡升，而且與美國總統選舉相互連動（Carson, 2017, March 16）。美國事實查核組織 PolitiFact 因此將「假新聞」（fake news）選為該年的代表性謊言（Holan, 2016, December 13），而牛津字典將「後真實」（post-truth）選為該年度代表詞彙的原因，同樣與社群媒體成為人們重要的新聞來源，而且人們益發不信任權威階層所提供的事實有關（Oxford Dictionaries, 2016, November 16）。

儘管假新聞的影響力為何，學界與實務界仍有不同論斷，但大眾對假新聞的感知確實日益增強，不少人認為已到氾濫成災的地步。一份由路透社新聞研究中心（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於 2017 年初所進行的全球性大調查發現¹，只有 24% 的受調查者同意社群媒體能夠善盡區別事實與虛構之責，較諸一般新聞媒體的 40% 為低。該項調查的質性研究亦顯示，使用者認為社群媒體缺乏資訊傳播的規則加上病毒式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導致了低品質訊息與假新聞的快速傳播（Newman, Fletcher, Kalogeropoulos, Levy, & Nielsen, 2017）。

假新聞明確悖離新聞報導最為根本的真實原則，若不積極以對，勢必戕害人類溝通所繫的信賴關係，甚至可能摧毀民主社會的運作機制，因此歐美國家公民社會要求社群媒體為假新聞負起責任的呼聲愈來愈大。問題是社群

¹ 此份以新聞消費為主題之調查，其量化研究係於 2017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在全球五大洲 36 個國家與地區以線上問卷方式進行，共計超過 7 萬人填答問卷。

媒體究竟要為假新聞負起何種責任？它又應該採取何種作為來消弭假新聞的傳播？

對於外界要求處理假新聞的呼籲，歐美國家最大的搜尋引擎 Google 與使用者最多的社群媒體 Facebook 原本無意採取積極作為，堅持它們只是大眾自由使用的開放平台，而非自行產製內容的媒體，不應將它們與傳統媒體等量齊觀。Google 與 Facebook 並強調民眾自由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意義，不能隨意禁止某些資訊的流通，以致侵害大眾的言論自由。但在政府與民間的壓力之下，Google 與 Facebook 等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公司仍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後，自 2016 年底陸續宣布採取若干自律作為 (Gunaratna, 2016, November 15)。

截至目前為止，Google、Facebook、Twitter 等使用人數位居前茅的平台都已採取類似的自律措施，包括強化自身對假新聞的人工與自動化事實查核，與非營利的事實查核組織及具公信力的媒體合作，對假新聞進行查核與標示，並透過各自的演算法將標示為假新聞的訊息傳播速度予以放慢，以及拒絕假新聞網站透過它們的廣告聯播網取得牟利的機會等。此外，這些網路平台與社群媒體亦透過若干資訊素養知識的提供，協助教育使用者如何分辨假新聞，並在某些國家與大學新聞系合作，訓練學生辨識及分析假新聞的來龍去脈。

即使如此，依據這段時間以來的實施狀態觀察，外界對於這些自律措施的作用似乎顯得「無感」，甚至懷疑相關作為只是用來解消外界壓力的「假自律」。英國《衛報》廣泛訪談美國的事實查核組織與假新聞製造者之後發現，Facebook 目前的做法似乎效果有限，其原因不僅在於假新聞被揭露之前早已流傳，被揭露之後亦有可能造成加速擴散的反效果。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於臉書並未真正實現其自律的允諾，許多被查核組織認定為假新聞的訊息根本未在臉書上作出標示，甚至有的假新聞經過一段時間警示之後，竟然就回復「清白之身」。至於假新聞的分享速度是否真的遭到抑制，更是難以察覺，而 Facebook 對這些問題都拒絕說明細節 (Levin, 2017, May 16)。顯見，即使網路搜尋或社群平台在外界壓力之下宣稱要進行自律，其實際作為仍有待觀察。

除了網路與社群媒體的自律措施出現執行落差之外，政府機構是否應立法處理網路與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亦出現爭議。相對於美國在法律作為上的消極，歐洲國家則積極許多。歐盟執委會首先於 2016 年 5 月針對社群媒體有關仇恨的不法言論訂定準則，要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與 Microsoft 等需在 24 小時內回應問題貼文的檢舉（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May 31）。其後陸續要求社群媒體必須針對假新聞提出更強勢的作為，否則將考慮採取法律行動。2018 年 4 月，經過公眾諮詢與專家學者討論之後，歐盟執委會宣布了處理網路假新聞的系列做法，包括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制定共同遵循的實踐準則（Code of Practice），設置獨立的歐洲事實查核組織網絡，提升歐洲民眾的媒體素養，以及促進自願性的網路識別系統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April 26）。

德國是歐洲國家中行動最積極者，該國內閣於 2017 年 4 月 5 日將目的在打擊網路仇恨言論與假新聞的法案送交聯邦議院審議，此一簡稱為《網絡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 NetzDG）的立法隨即於 6 月 30 日獲國會通過，並於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要求社群媒體必須在民眾申訴 24 小時內刪除明顯違法的內容，較不清楚而有爭議的部分也要在 7 天內處理完畢，並向投訴者回覆處理結果。未能做到的公司將面臨最高 5000 萬歐元的罰款，而該公司在德國的負責人也將面臨最高可達 500 萬歐元的罰款。但德國的作法亦招徠侵犯言論自由的批評，指責該項立法會鼓勵平台業者審查具爭議性內容，亦可能對網路上的言論形成寒蟬效應（Thomasson, 2017, April 5; Lomas, 2017, October 2）。

美國雖然一直未就立法管制假新聞的議題形成共識，但在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後持續延燒的「通俄門」事件影響下，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於 2017 年 10 月推出名為《誠實廣告法》（Honest Ads Act）的立法案，要求對網路平台的政治性廣告採取類似傳統媒體的透明度規範，如揭露刊登者的聯絡資訊、廣告內容與對象、刊登時間、瀏覽狀態等。此項立法案雖尚未獲得國會通過，但包括 Twitter、Facebook 等幾個主要的商營社群媒體平台業者都已宣布支持並執行草案中所擬的規範（Lumb, 2018, April 10）。

面對假新聞的氾濫，究竟社群媒體的公共責任在哪？商營社群媒體公司只是科技公司，其平台服務只是開放平台，不該如傳統媒體般接受管制，亦無需建立一般媒體的自律機制？抑或有其管制的必要，更須建置符合平台特質與需求的自律機制？而如果社群媒體平台業者應該進行自律，那麼自律機制又該如何設計方屬妥當？顯然仍是令人困惑而且存在爭議的課題。本文將從政治經濟學取徑檢視社群媒體平台業者的運營機制及其所形塑的公共領域，以期透過社群媒體本質與功能的釐清，建立社群媒體（必要的）管制與（嚴謹的）自律的正當性，並為社群媒體的問責機制理出可資依循的解決方向。

貳、社群媒體運營機制的政治經濟分析

網際網路出現之後，有關它對民主社會的影響便出現樂觀與悲觀兩種論調，前者認為網際網路的近用、開放與互動等特質，將極有助於多元資訊的交流與公民參與的實踐，一旦大眾能夠變成資訊通達的主動閱聽人，民主品質即可隨之提升。但後者則強調，網際網路只是溝通的工具或媒介，人們如何使用網際網路仍受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何況，實證經驗顯示，人類的民主實踐並未因網際網路而變得特別高明，各種數位亂象的存在具體否認網際網路的民主功能（胡元輝，2014；Gade & Lowrey, 2011）。

社群媒體興起之後，此種樂觀與悲觀主義的爭論雖然繼續延伸，但無可諱言，由於社群媒體在諸多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在大眾日常生活中扮演愈來愈吃重的角色，社群媒體的樂觀主義論調毋寧更為昂揚。「參與型社群媒體」（participatory social media）的概念得到相當多的支持與接受，以致有關社群媒體的公共責任或管制問題，很難凝聚足夠的社會注目，更別說是排上公共政策的政治議程（Fuchs, 2014a, 2014b; Napoli, 2015）。

問題顯然在於吾人應如何理解與看待社群媒體的運作本質？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們是否能對社群媒體作出真正具批判性的檢視與反思？社群媒體，甚至是商營社群媒體確實是一個擁有巨大傳播能力的平台，但誰擁有此一平台？平台所處的政治經濟體制為何？經營此一平台的基本邏輯為何？

誰因此一平台獲利？誰又因此一平台而受害？其中的權力關係與勞動型態為何？如果這些問題不予思考，不做檢視，勢將難以論斷社群媒體的實際影響與價值。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所關注者正是上述課題。廣義而言，政治經濟學要探問社會生活中的控制（control）與生存（survival）狀態，狹義來說，它要檢視的是構成資源生產、分配與消費背後的社會關係，尤其是權力關係。就傳播領域而言，就是關注傳播場域中的權力運作，批判其中不合理的支配與剝削關係，以促成社會變革（Mosco, 2009; Fuchs, 2014a）。Mosco（2009）因此強調，權力是種資源，誰在社會階層體系中擁有優勢地位，誰就可以在市場取得相應位置。但「權力不僅是資源，亦為一種控制形式，被用來反擊挑戰者，維護自身優勢地位。」（Mosco, 2009, p.220）

傳播生態從上個世紀末以來出現劇烈變遷，網際網路及其所衍生的各類新媒體如今已蔚為傳播地景的嶄新風貌，並成為人類資訊生活的重要構成。面對此一傳播生態的巨大轉變，傳播政治經濟學亦發展出多種研究路徑，以期釐清數位時代的傳播特質。Mosco（2009, pp.119-123）曾歸納此一向新媒體移轉的研究視角至少包括：強調新舊媒介的連續性，關注資本主義的非連續性，質疑新媒體的烏托邦願景，以及探究新媒體所形成的明顯社會議題，如知識產權的控制、電子監視與網絡經濟的真實意涵等。此一歸納雖未將其後蓬勃發展的社群媒體予以明顯標示，但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社群媒體進行批判性的分析，顯然是必要而難以迴避的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儘管已有一些社群媒體研究採取政治經濟學取徑，但相對而言，關於社群媒體的討論仍多聚焦於其正面價值與社會效益，而忽略商營社群媒體的運作邏輯與權力關係；仍多探討誰能獲利，而不關切誰的權利受害。相對於一些理論稱頌部落格與社群網站對傳播權力關係的衝擊，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認為吾人應對此種樂觀主義採取保留態度，並進而檢視商營社群媒體所存在的企業控制，因為「權力不對稱意味的是：某些人在社會上受惠乃是以其他人的受損為其代價。」（Fuchs, 2014a, p.7）以下即從政治經濟學取徑對商營社群媒體的本質與運作進行分析與批判。

一、企業型社群媒體的特徵

「參與型社群媒體」的支持者主張，社群媒體除了擁有一般網際網路的特質外，更因其使用上的方便性與社群連結的功能，深化了網際網路所帶來的民主潛能。社群媒體的使用者一方面更容易成為資訊的生產性使用者（prosumer），另一方面也能夠更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這些被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提出卻殊途同歸的社群媒體功能至少包括：降低參與障礙、取消中間人（middlemen）、消費者／公民培力（empowered consumers）、邁向商業民主化、型塑參與式文化、展現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促進文化多樣性等等（Jenkins, 2006; Shirky, 2008; Tapscott, 2008; Bruns, 2009; Howe, 2009）。

但，「參與型社群媒體」真的是社群媒體的最佳定位與寫照？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企業型社群媒體」（corporate social media）才是社群媒體的真面貌。諸多研究指出，從影響社群媒體運作方式的政治經濟脈絡來看，社群媒體的世界與傳統媒體殊無二致，儘管有非營利型態的社群媒體平台，但主流使用的平台均屬企業公司所有，而一旦進入商業競爭與資本市場的領域，利潤追求與商品經濟的法則就必然成為公司經營的主導邏輯。傳統商營媒體如此，新型態的商營網路與社群媒體依然如此。更令人擔憂的是，Google 與 Facebook 等公司均已成為全球性大企業，且在市場上具高度壟斷地位，其所具有的影響力甚至非傳統的媒體巨擘可比。

若然，企業型社群媒體的特徵為何？社群媒體的發展實則經歷過根本性的變遷，許多社群媒體初建時確實展現為一種業餘者驅動的社群平台，但隨著社群媒體的躍進式發展及其營運規模的爆發式成長，社群媒體的企業屬性、商業化內容走向與運用資料獲取高額利益的經營模式也益發鮮明起來。「企業型社群媒體」的特徵至少顯現於以下三端（Fuchs, 2014a; Dijck, 2013; 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p.50-53）：

（一）大企業與政治人物具支配力與能見度

Fuchs (2014a, pp.98-102) 分析 YouTube 上觀賞次數排前 10 名的影片發現，環球音樂集團提供的音樂影片就佔了 7 個，另外 3 個分屬 YG 娛樂公司、索尼音樂娛樂及私人的產品，顯示跨國媒體集團相當程度控制了 YouTube 的注意力經濟 (the attention economy)。在他對 Twitter 帳號关注者人數多寡的分析中亦發現，該社群媒體的政治面向亦存在注意力經濟的階層化問題，2013 年 3 月关注者人數排在第五名的是時任美國總統的歐巴馬，約 2780 萬，但另類政治的代表如 Michael Moore 與 Noam Chomsky，或是佔領運動 (occupy movement) 的相關帳號，关注者人數就很少，最多的 Michael Moore 也只有 146 萬，「佔領華爾街」的帳號則不到 18 萬。

YouTube 在台灣的觀賞情形與全球狀態類似，依據 socialbakers 在 2017 年 12 月的統計²，觀賞次數前 10 名的影片頻道中，娛樂企業奪取多數的注意力，計有相信音樂、滾石唱片、杰威爾音樂、福茂唱片、華研國際、華納音樂與環球音樂等 7 個音樂頻道。位居第 6、8、9 名的中時電子報、東森新聞與壹傳媒集團下的 TomoNews，雖然都是媒體，但都屬於媒體集團，且其內容主要強調軟性資訊與社會八卦等吸睛議題。

社群媒體與網路確實有助於一般人的資訊產製與傳布，但顯然不是所有使用者都具有相同的支配力，亦非所有資訊都具有相同的能見度。能見度與注意力經濟已經變成企業型社群媒體的核心過濾器，讓有較大權力的行動者可以取得優勢地位 (Fuchs, 2014a, pp.81-82)。就此而言，企業型社群媒體乃是階層化、非參與式空間 (stratified, non-participatory spaces)。

(二) 娛樂內容當道、政治內容邊緣化

Fuchs (2014a, pp.98-102) 檢視 Facebook 最受歡迎的粉絲社團後發現，前 10 名社團中音樂與娛樂型就佔了 6 個，其次是 Facebook 與 YouTube 所組的 3 個資訊科技型社團，另一個則是可口可樂的品牌型粉絲社團，此一結果與前述調查共同顯示，Facebook 與 YouTube 都是娛樂當道。相對的，政治內容則是相對弱勢，臉書社團中只有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排在第 51 名，至

² Socialbakers 有關台灣 YouTube 頻道觀賞次數的排名統計見 <https://www.socialbakers.com/statistics/youtube/channels/taiwan/>

於另類政治人物如 Michael Moore、Noam Chomsky 的粉絲數則都在百萬以下，與前 10 名動輒 6 千萬，甚至高達 2 億以上的數量相較，可謂小巫見大巫。

Twitter 的情形亦然，前 10 個关注者人數最多的帳號中，有 9 個屬於娛樂導向，唯一的例外是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此外，Fuchs (2014a, pp.190-192) 的研究亦顯示，2009 年的 Twitter 熱門話題中，屬於政治者僅 7%，而娛樂取向者則達 38%；2010 年情形亦同，僅 3% 與政治相關，卻有 28% 為娛樂性話題。至於包含主題標籤 (#) 的 40% 熱門話題中，政治同樣處於邊緣位置，音樂與約會是最常被使用的主題。此一統計再次證實，Twitter 上的能見度存在不對稱的權力。

社群媒體在台灣的情形又是如何？依據 socialbakers 在 2017 年 12 月的統計³，Facebook 最受歡迎的前 10 名台灣粉絲專頁中，音樂與娛樂類型同樣高達 5 個（包括五月天阿信、周杰倫、王力宏、范范 范瑋琪與 Hallyu World 韓流世界），另有一個交友社團 (Pairs 派愛族) 高居第 3 名。比較特別的是，有四個媒體的粉絲專頁擠進前十大之列，分別是東森新聞、Yahoo 奇摩新聞、蘋果日報及 ETtoday 新聞雲。但這些媒體除 Yahoo 奇摩新聞屬入口網站外，多強調即時新聞與軟性八卦題材，甚至被視為「內容農場」，並不具備濃厚的公共服務或政治論壇色彩。

(三) 使用者資料被轉化為高獲利商品

企業型社群媒體蒐集其使用者的線上行為之後，透過儲存與分析，便可以細緻掌握使用者的個人偏好與行為模式，藉此發展出定向廣告 (targeted advertising)，誘使使用者購買廣告的產品或服務。廣告收入乃 Google 與 Facebook 此類網路與社群媒體之主要營收來源，因此，如何持續拓展廣告收入，亦即更有效的提升使用者資料的經濟價值，必然是這些公司的首要經營目標。

³ Socialbakers 有關台灣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統計見
<https://www.socialbakers.com/statistics/facebook/pages/total/taiwan/>。

根據資料與市場分析機構 Zenith 的研究指出，2017 年，網路將超越電視，成為全球最大的廣告媒介。2016 年，Google 與 Facebook 的廣告營收已佔全球五分之一，幾乎是 5 年前的 2 倍；Twitter 的廣告營收亦較 2012 年成長 734%，是全球成長最快的網路媒體。事實上，Google 與 Facebook 的廣告收入在全球廣告支出的占比，2012 年時尚只有 10.6%，四年之後的占比就翻倍，其利潤之大可想而知（Kollewe, 2017, May 2）。

徵諸兩家公司的財報亦確實如此（表一），不僅以使用者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為基礎的廣告收入直線上升，整個公司的淨收入亦是逐年攀升，到了 2017 年，Facebook 總營收已超過 406 億美元，其中廣告收入就有 399 億餘元，占總營收的 98.3%，而淨收入則高達約 159 億（Facebook, 2018）。至於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Inc. 在 2017 年的總營收約 1109 億美元，其中 Google 廣告收入約 954 億，占總營收 86.0%，其年度淨收入則約 127 億（Alphabet Inc., 2018）。

表一：Google 與 Facebook 近五年（2013-2017）營收比較表

公司 年度	Facebook			Google (Alphabet Inc.)		
	廣告收入	總營收	淨收入	廣告收入	總營收	淨收入
2013	6,986	7,872	1,500	51,072	55,519	12,733
2014	11,492	12,466	2,940	59,624	66,001	14,136
2015	17,079	17,928	3,688	67,390	74,989	16,348
2016	26,885	27,638	10,217	79,383	90,272	19,478
2017	39,942	40,653	15,934	95,375	110,855	12,66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Google 與 Facebook 財報（Facebook, 2016; 2017; 2018; Alphabet Inc., 2016; 2017; 2018）

為了維持市場壟斷地位與巨額商業利益，這些公司的公關費用亦水漲船高，以 Google 為例，2015 至 2017 年間，該公司在歐洲的軟性遊說費用就提升至 4.5 億美元，企圖修補其在歐洲人民與決策官員心目中的形象（Scott,

2016, July 19)。2017 年第二季在美國華府的遊說經費亦打破該公司單季歷史紀錄，到達 593 萬美金，較 2016 年同期增加了 40% (Shaban, 2017, July 21)。

二、資料商品的形成與數位勞動的剝削

從以上分析清楚可見，服膺商業邏輯，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商營社群媒體並非如有些人士所描繪的公民參與利器，亦非人類社會邁向民主理想國的登龍捷徑。相反的，從批判政治經濟學所在意的「誰擁有、誰控制、誰獲利」的角度來檢視，商營社群媒體乃不折不扣的「企業型社群媒體」，它以使用者「自願參與」的糖衣包裝了企業的「營利本質」，而且以不支薪或低薪取得的使用者勞動，為企業帶來商業利益，甚至是巨額利潤。

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線上活動到底是何種性質的活動？是參與型社群媒體支持者口中的自主性、創造性活動？或是被商品化、被剝削的數位勞動？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社群媒體的線上活動乃是一種「無形勞動」(immaterial labor)，它為商品生產了文化或情感要素，亦即線上的社群關係，因而增加了商品的價值；它也是一種「免費勞動」(free labor)，使用者以生產性消費者 (producer-consumers) 角色在社群媒體上進行各種「額外活動」(excessive activity)，例如填寫自己的背景資料，上傳文字、照片、影音等內容，發表評論，並將之分享給自己的朋友。而社群媒體則將使用者的所有使用軌跡予以集結、儲存與分析，再將之賣給廣告商 (Cohen, 2008)。用 van Dijck (2013) 的話來說，巨型跨國企業的社群媒體並不只是以促進使用者的連結為念，而是同時藉由擷取及剝削使用者的連結性 (user connectivity) 變成全球性的資訊與資料探勘公司。

確實，社群媒體使用者的活動結果並不只是表面上的資訊接收與分享而已，Fuchs (2014a, pp.97-122) 強調，社群媒體與網路使用者的線上活動乃是數位時代的新型態勞動，線上時間既是勞動時間，也是能夠實現利潤的潛在時間，因為線上活動都受到監視 (surveillance) 並轉化為資料商品 (data commodity)。社群媒體為了積累資本，必然想方設法讓使用者人數增加，停留時間增加，觸及與點擊廣告機率增加，以期取得更多使用者的資料，並增

加利潤實現的時間。而在社群媒體將使用者生產內容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過程中，無論是被視為無形、免費或是玩樂勞動（play labour/playbour），由於使用者皆不支薪，剩餘價值率（剝削率）趨近於無限大，使用者的數位勞動（digital labour）可謂被嚴重剝削，既創造了數位血汗工廠（digital sweatshop），亦使使用者淪為無領階級（non-collar）、網路奴隸（netslave）。Fuchs（2017）曾以 2012 年 Facebook 的公開財務資料推算其工資率（wage share）為 11.0%，利潤率（profit share）為 45.1%，但美國整體的工資率達 24.8%，利潤率則只有 24.8%⁴，具體顯示 Facebook 的工資給付相當的低，其原因就在於使用者的無償勞動為社群媒體創造了巨大價值。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企業型社群媒體的典型資本積累策略就是對使用者數位勞動進行剝削，它販賣使用者資料的所得遠大於投入的資本，其與傳統媒體資本積累過程的差異只是獲取閱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的方法有所不同。以電視、收音機與網路公司來做比較，Fuchs（2010）和 Bolano 與 Vieira（2014）都指出，採取被動閱聽人模式的電視、收音機廣告業者購買的是潛在閱聽人關注度的統計資料，而網路公司則是代之以主動閱聽人或生產性消費者（網路使用者）使用網路時所留下的資料，包括他們的個人品味、偏好、慾望與通道等。因此，網路廣告業者可以更精準地觸及它們所想要的廣告對象。閱聽人商品理念的重要闡釋者 Smythe（1981/2006, pp. 249-250）曾感慨指出：「人需要有休息、反思、藝術薰陶、細緻教養孩子、社區活動的時間，但是被意識產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施加的閱聽取向的勞動壓力卻冷酷無情。」這句話在數位時代的今天仍是歷久彌新。

三、隱私侵害與監控

從隱私的角度來看，社群媒體將使用者資料商品化乃是對使用者隱私的不合理對待。以 Facebook 為例，它雖然在政策宣言中強調，當它們傳送廣告時並不會分享使用者的資訊，但 Facebook 也許不會分享屬於個人身分的

⁴ 工資率是經濟體工資總額佔 GDP 的比率，利潤率則是經濟體利潤總和佔 GDP 的比率。

資訊，但它卻會把蒐集到的大量個人資訊賣給廣告商。個別網路使用者的數位足跡或許不具商業價值，但大量使用者的紀錄，而且是可以被分析的紀錄，則是廣告業者的最愛 (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p. 52-53)。此外，Facebook 的隱私策略掩飾了它對使用者的剝削，它所強調的分享只是資料販賣及商品化的婉語而已。隱私對社群媒體平台提供者與使用者而言其實存在不對稱關係，社群媒體平台提供者係以犧牲使用者的隱私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Fuchs, 2011)。

一些學者針對企業型社群媒體有關隱私政策的文件進行了精細研究，為上述論斷提供了有力證據。Butosi (2012) 對 Facebook 與 Twitter 創設以來的隱私政策 (privacy policy) 及使用條款 (terms of use) 進行批判論述分析的結果顯示，兩個文件的主要功能比較像是工作契約，而非有關隱私保護的論述，亦隱匿了足以顯示其資訊商品化的相關流程。Fuchs (2014a, pp.165-168) 對 Facebook 隱私政策文件的分析抱持相同看法，他指出，由於該文件相當複雜與冗長，使用者根本不太可能閱讀，而且文件中以與第三方分享資訊 (sharing information) 的用語來取代販賣資料之類的資料商品化宣告⁵，更是降低了使用者的警戒心。此外，Facebook 既未詢問，也沒有徵得使用者同意是否要看定向廣告，等於預設使用者是自願犧牲隱私來換取使用 Facebook 的機會，亦美化了廣告對提升網站服務品質的價值⁶。

在自由經濟的社會裡，隱私雖然被視為保護私有財產的一種普遍價值，但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分析指出，此種資本主義式的隱私概念同時讓企業、政府得以「監控」一般人的媒體使用資料，遂行其牟利或政治控制的目的，因此其結果往往是富人與企業隱私受到十足的保護，並合法化對消費者與公民的隱私權侵害，企業型社群媒體的狀況便是鮮明的例子 (Fuchs, 2011)。藉由傅柯監控概念的運用與轉化，企業型社群媒體的批判研究者主張，該類型社

⁵ Fuchs (2014a, p.166) 發現，2012 年 12 月版的 Facebook 隱私政策文件，分享 (sharing / share) 一詞出現 85 次，而販賣 (sell / selling / sale) 的相關詞彙則完全沒有使用。

⁶ Fuchs (2014a, p. 167) 指出，Facebook 雖然在它蒐集使用者資料的小甜餅 (cookies) 設定中提供自願退用 (opt-out) 的選項，但此一選項既不能在正常隱私設定裡看到，亦隱匿在文件字海中所附的一個網頁連結，充分顯露其以商業利益為先，隱私保護其次的心態與作為。

群媒體對使用者資料的蒐集、儲存與利用，涉及不對稱權力關係、控制與規訓權力，並可能導致使用者付出代價（Fuchs, 2014a, pp.153-174）。易言之，企業型社群媒體使用者的數位足跡在轉化為資料商品的過程中受到公司的高度「監控」，並被利用以滿足其經濟目的，使用者的隱私在企業面前並未受到真正的保障。

Cohen（2008）以「監控的價值化」（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來稱呼社群媒體此種以使用者資料來為資本創造價值的過程，但社群媒體的監控不只是現有使用者資料的商品化而已，還包括透過這些資料來留住使用者，並讓離開的使用者回籠。Fuchs（2010, 2012; 2014a, pp.163-164）則以「大眾自我監控」（mass self-surveillance）一詞來質疑參與型社群媒體支持者 Castells（2009）所提出的「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概念⁷，他認為前者是後者在資本主義下的陰暗面，乃使用者不斷產製內容及交流資訊才讓此種監控成為可能。事實上，企業型社群媒體不只存在企業監控，亦存在政治監控的侵害。此一狀態由美國中情局前僱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所透露的政府機關監控內幕，以及社群媒體不當交出資料配合政府調查等事例中，即可窺知梗概。

社群媒體得以監控使用者資料並將之商品化的重要工具就是演算法（algorithm），而且是不透明的演算法。Van Dijck（2013）的研究顯示，社群媒體的演算法不僅將使用者的社群關係摸的一清二楚，而且掌握其消費模式與偏好。透過既有行為模式的掌控，社群媒體得以預測使用者可能的未來取向，而演算法則穩穩地套住使用者，社群媒體透過它顯示了使用者所處社群的普遍價值與信念，亦促使使用者趨向此一共通態度或立場，以期獲取更多的社群關注或肯定。就此而言，演算法本身就是某種社會關係或某種論述的實現者，其與傳統媒體公司將使用者行為轉向消費行動的作法並無根本差異，其中的分別只在於社群媒體能夠在微觀層次掌握個人品味，進而透過「你

⁷ Castells（2009）的「大眾自我溝通」概念，係指有別於傳統大眾媒體溝通模式的新形式的社會化溝通（socialized communication）。此一新興的溝通模式乃內容上自我產製、傳佈上自我導向，以及接收上自我選擇的多對多溝通型態。

可能也喜歡」的方式將其他的內容及各種廣告、行銷灌注給使用者 (Bouvier, 2016, pp. 4-5)。

參、社群媒體公共領域的政治經濟分析

公共領域的探討雖由來已久，但隨著傳播生態的不斷變遷，其意涵與價值亦面臨重新評估與詮釋。特別是網際網路出現以及社群媒體廣受使用之後，有關公共領域的討論不僅備受重視，抑且眾議紛紜。惟無論是支持 Harbermas (1989) 趨向單一、全面的公共領域概念，或是主張多元、另類的公共領域觀點，多認為公共領域在民主政治中具有關鍵地位，乃實現人民自治之重要憑據。既是如此，社群媒體與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自應準確理解與定位，方足以讓它發揮應有的功能。遺憾的是，從政治經濟學取徑來看企業型社群媒體所形塑的公共領域乃是「被企業殖民 (corporate colonization) 的公共領域」，無法成為公眾理性討論與批判的場域。

一、網絡化公共領域的理想與現實

從參與型社群媒體的角度來看，社群媒體的出現讓一般大眾可以藉之分享意見、交流看法，而且是以更為便利、更為主動的方式進行溝通，既賦予大眾更多的個人自由，也解放了他們的創造力，相當有助於公共領域的型塑。倡議網絡化公共領域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概念的 Benkler (2006, p. 272) 即指出，「網絡允許所有公民改變他們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公民不再需要是消費者與被動的旁觀者，他們可以變成創作者與基本的主體。也就是在這層意義上網路得以民主化。」

Benkler (2006) 認為，網絡化資訊經濟的形成已使原有以大眾媒體為核心的大眾中介的公共領域 (mass-mediated public sphere)，向網絡化公共領域移轉。後者透過網際網路讓每個人有說話、詢問與調查的機會，有成為政治對話主體的可能，因而改善了以往由商業化、集中化商業媒體為核心平台的公共領域結構。儘管網絡化公共領域仍面臨一些問題與挑戰，但較諸大眾中

介的公共領域僅能容納相對有限的議題、觀點，並受到媒體所有人的過度掌控與商業化操作，仍然是可欲的進展。

類似 Benkler 主張網絡化資訊環境已為人類社會帶來結構性變化，並正面肯定網路與社群媒體在公共領域建構上的作用者甚多，他們相信處於新資訊環境下更為自主的個體以及個體間的協作將有助於更好的民主參與，以及更反思性的公民文化。例如 Tapscott (2008) 即認為以互動與協作為特徵的數位工具與網路世代，將使美國乃至其他民主國家的政治生活邁入「民主 2.0」時代，因為「對於知識創造與社群建構這兩個數位時代政策制訂的核心面向，Web 2.0 科技提供了支持工具，讓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公民參與比以前更為容易、更為省錢。」(Tapscott, 2008, p.264)

但網路與社群媒體真的只會是公共領域的推手？實證研究的結果迄今尚無鮮明共識，不少研究對此有所保留，至多只能肯定網路與社群媒體有助於溝通管道與互動頻率的擴增，但量的擴增是否足以推進公共領域則是未知數。一份針對奧地利 Twitter 使用者及其所形塑之網絡化公共領域的實證研究即顯示⁸，作為政治溝通的媒介，儘管 Twitter 明顯促進了政治中心與公民間的連結，讓一般公民得到更多參與政治論述的管道，但奧地利的政治推特領域 (Twittersphere) 主要仍是既有權勢者揮灑的舞台。至於公民是否因此而有更多的參與感？公民在 Twitter 上的參與是否足以影響政治過程？又是否能夠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領域？仍然無法論斷 (Ausserhofer & Maireder, 2013)。

不可否認，社群媒體確實加大也加快了人類社會的資訊流動，特別是日新月異的行動裝置更讓網絡化的資訊環境得以便利而快速的發展。以往，人們之間的溝通可能要耗費不少時間與金錢，卻未必能夠有效傳達，現在卻可以在彈指之間進行多對多的溝通，而且費用相當低廉。但相對的，許多人亦感覺新傳播科技所帶來的溝通新局並未消弭以往「有溝未通」的問題，甚至因為資訊的氾濫與混亂，使用者操作新媒體的能力落差，以及同溫層

⁸ 本研究係以研究者自行發展出的使用者中心法 (user-centred method)，針對 374 名奧地利 Twitter 政治核心使用者及其網絡在 2011 至 2012 年特定時段的推文資料進行分析，並與同時段日報的文章進行比較。

(stratosphere) 與回音室 (echo chamber) 現象的形成等等因素，使人們的溝通品質更為低落與劣質。例如關注網路回音室現象的 Sunstein (2017) 雖然認同網絡化公共領域的存在，但也強調資訊碎片化 (fragmentation) 問題的嚴重；雖不認為大型社群媒體平台已經危及民主，亦同意它們已對民主構成挑戰，並從審議民主的角度，建議臉書等社群媒體平台建置對立觀點與機運按鍵 (opposing viewpoint and serendipity buttons)⁹，讓不同於使用者既有立場的資訊有機會被看到。

顯然，社群媒體的理想主義並非社群媒體現實樣態的最佳詮釋，以全然正面的評價來看待社群媒體上所產製的內容根本不切實際。Iosifidis 與 Wheeler (2016, pp. 53-54) 衡平地指出了社群媒體內容的雙重本質：其一是被社群媒體運用來累積利潤的私有財，其二則是足以成為公共領域組成份子的公共財。唯有正視社群媒體內容的雙重本質，一方面同意社群媒體在參與式民主上的潛能，另一方面接受社群媒體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下的侷限與扭曲，方能以開放態度審視社群媒體與公共領域的關係。

對此一課題抱持開放態度的 Iosifidis 與 Wheeler (2016, pp. 28-34) 就具體指出社群媒體必須面對的五項課題：非結構性的參與、不可信賴的資訊、審查制度、企業的線上活動與隱私顧慮，以及批判性討論的闕如。其中非結構性的參與係指社群媒體上的對話缺乏行為規範，以致難以對焦，既不易達成共識，亦難以設定策略目標。至於作為公共領域核心本質的批判性討論則是指具實質內涵的對話或有意義的辯論，但社群媒體卻充斥著瑣細淺薄、不具價值的交流，而且缺乏原生性的新聞內容。

誠然，人們的線上關係或網路參與往往是隨機性、間歇性的弱連結，未必是持續性、專注式的強連結，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對於公共領域的影響也因此不能一廂情願的認定。對新媒體的民主潛能有所保留的斯洛法尼亞社會學者 Žižek (1998)，以相對於互動性 (interactivity) 的「互卸性」(interpassivity) 概念說明媒介使用者自以為是主動，實則是被動的狀態，用馬克思商品拜物

⁹ 所謂對立觀點按鍵是指使用者按鍵後將可接收到與使用者立場相對的動態消息，而機運按鍵則是指使用者若按此鍵將可因此暴露於非預期與非選擇性的動態消息。

教 (commodity fetishism) 的概念來說，就是社會關係愈來愈體現為一種客體的關係。懶人行動主義 (slacktivism) 是另一個常被用來指述網民熱衷網路表態卻無實際線下行動的情形。許多人以為寫個部落格、按個讚或在社群媒體上組織社團，就可以產生影響力或改變現存狀態，此種想法被 Morozov (2009, May 19) 譏諷是懶人世代理想類型的行動主義。

儘管許多人仍樂觀看待網際網路的資訊超載現象，或是因之而出現的眾聲喧嘩與金錢依歸的「巴別塔缺陷」(Babel objection)，相信自主與協作的個人在某種程度上有能力克服這些問題 (Benkler, 2006)。但若從政治經濟學取徑來探究企業型社群媒體所能形塑的公共空間，顯然無法如此樂觀以對，亦必須對此種公共領域的理想主義提出質疑，因為此類看法並未真正探問下列問題：「誰擁有網際網路平台？誰擁有社群媒體？」(Fuchs, 2014b, p. 58)

二、被企業殖民的公共領域

企業型社群媒體的所有者強調，由於社群媒體的近用、便利與快捷，它相當有助於開放社會及參與民主的發展，對人類社會具有革命性的貢獻。Facebook 的使命宣言及其變遷可說是此種認知的代表性註腳。

Facebook 原本的使命宣言是：「賦予人們分享的力量，讓世界更加開放連通」(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share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此一使命定位充分顯示出該公司對於社群媒體資訊分享能力的自信，亦對資訊分享的結果抱持高度期待。問題是一個遵循市場邏輯的公司要如何實現股東利益，同時達成美好的企業願景？2017 年 6 月，Facebook 修改了它的使命宣言，強調 Facebook 要「賦予人們建立社群的力量，並且讓世界更加緊密連結 (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build community and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Zuckerberg, 2017, June 23)，無論此一新使命的出現是否與假新聞等社群媒體的發展及相關的社會批評有關，外界要問的是，如果 Facebook 上充斥著破壞人們相互信賴關係的假新聞，又如何能夠讓世界更加緊密連結？同樣的問題是：一個遵循市場邏輯的公司要如何激勵人們組織具有意義的社群，從而建立成熟的公共領域？

依據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分析，Fuchs (2014a, p. 102) 明白指出，「社群媒體並沒有建構出公共領域或參與式的民主空間，而是遭到企業的殖民，特別是那些支配注意力與能見度的多媒體公司。」即使是在一些社群媒體被認為發生極大催化作用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中，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抗議與革命，Fuchs (2014a, pp.102-103) 亦不認同臉書革命、推特革命等說法，因為讓革命發生的是特定社會條件下集體組織的人民，而非科技本身。特別是在商營社群媒體的世界，大企業及政治人物居於掌控地位，所謂公眾參與乃是一種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而已。

Fuchs (2014b) 從當前社群媒體所存在的三種對抗來分析社群媒體所形塑的公共領域 (表二)。其一是經濟層面的對抗，存在於使用者資料與社群媒體公司利益之間；其二為政治層面的對抗，存在於使用者隱私及產業監視複合體 (complex) 與公民追求權勢者問責之間；其三為公民社會層面的對抗，存在於闢建公共領域及企業、國家殖民之間。Fuchs (2014b, p.89) 認為社群媒體雖有成為公共領域的潛能，但此一領域卻被政治與金錢力量所操控，以致當前的社群媒體整體而言並無法形成為一個公共領域，而是被企業與國家以一種特殊主義的形式所掌控與殖民。或者藉另位政治經濟學者 McChesney (2008, p. 377) 的話來說：「網際網路只能再製部分的公共領域」，而且就算要發揮對公共領域有所助益的「部分」功能，猶必須有其他制度架構的支持，例如獲得適當補助與獨立的新聞業。

表二：社群媒體的對抗

領域 (Sphere)	對抗存在於..... (Antagonism between...)	
經濟	使用者利益：資料保護與企業稅的問責	企業利益：使用者資料的透明/商品化與企業秘密
政治	公民利益：讓權勢者問責與免於權力機構干預的溝通	權力持有人利益：維護權力機構的秘密與洩密者的定罪
公民社會	抗議行動藉由網絡化溝通能夠開創線上與線下的政治公共領域	社群媒體透過企業與政治控制來限制、封建化與殖民這些公共領域

資料來源：“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by C. Fuchs, 2014b,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2 (1), 78.

誠然，自由主義下的傳播理論也會探討個人的資訊自主，也會檢討企業或政府的干預，但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則更進一步省思傳播生態中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構成的權力不對等。因此，探討社群媒體與公共領域的關係時，勢難以迴避企業型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社會不平等，亦無法跳過其所有權本質所可能造成的後果。若不能正視企業殖民公共領域的事實，並思考所有權民主 (ownership democracy) 的重要性，期待社群媒體對公共領域的建構發揮正面作用將是緣木求魚。

肆、社群媒體的管制與問責

社群媒體已經是當今人類社會重度使用的媒介，並為一般民眾重要的資訊來源。根據美國皮優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16 年初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儘管部分社群媒體使用者擁有多重消息來源，但 62% 的美國人會從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而且 18% 的受調查者表示常常如此 (Gottfried & Shearer, 2016, May 26)。路透社新聞研究中心 2017 年初的全球性調查亦發

現，年輕世代頗仰賴社群媒體與數位媒體作為其主要消息來源，18 到 24 歲的年齡層中，約三分之一（33%）的受調查者表示，社群媒體是他們主要的新聞來源，超過電視與報紙總合的 29%，也高於線上新聞網站的 31%。不過，年齡層愈高的受訪者對社群媒體的依賴度就愈低（Newman, Fletcher, Kalogeropoulos, Levy, & Nielsen, 2017）。

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社群媒體的使用平台已形成鮮明的集中化現象，若干商營社群媒體巨頭幾乎囊括絕大多數的使用者。據 2018 年 4 月的統計，Facebook 的積極使用者帳戶已達 22 億 3 千 4 百萬，居全球之冠。其後為 YouTube 與 WhatsApp 的 15 億，Facebook Messenger 的 13 億，WeChat 的 9 億 8 千萬及 Instagram 的 8 億 1 千 3 百萬¹⁰。

依據前文分析，對公共意見與論述具影響力的商營社群媒體已因商業邏輯的驅動，出現企業型社群媒體的特質與弊病，如何提升其公共服務功能已是民主國家無可迴避的課題。尤其是商營社群媒體的市場佔有率被少數企業寡頭壟斷，必須防制其在追逐私人與公司利益時傷害公共利益，甚至要求其採取保障公共利益的積極行動。有鑑於社群媒體在當前傳播生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在建構公共領域上所具有的潛能，究竟政府是否應介入管制？商營社群媒體又應如何問責以履行應負的公共責任？允值重視並深入辯證。

一、社群媒體的管制

商營社群媒體該不該管制已是近年來政府部門與實務界討論的課題，假新聞、隱私權等議題發酵之後，討論熱度更為提高。面對政府管制的主張，

¹⁰ 相關資料請見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014/global-social-networks-ranked-by-number-of-users/>

商營社群媒體最大的擋箭牌就是言論自由，他們強調對社群媒體上的資訊進行篩檢或過濾，是對使用者言論自由的巨大傷害¹¹。此一說法自非虛言，畢竟言論自由乃個人得以自我實現，文明得以向前發展之重要基礎，對社群媒體平台上的內容任意進行處理確有可能侵害言論自由。

支持商營社群媒體應擁有高度自由的學者 Levinson(2017, November 28) 即強調，若對社群媒體進行管制，「主要的受害者將不會是假新聞的傳播者，而是我們的表達自由。」他反對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的「容忍的弔詭」說（paradox of tolerance）¹²，認為政府若禁止仇恨言論，反而可能使各種言論都有機會被視為仇恨言論，以致壓制了言論自由的表達空間。既然社群媒體已經可以透過演算法來指認並移除假新聞，那麼就由社群媒體自律即可，如此不僅符合這些媒體公司的利益，亦可強化使用者線上活動的自信。

相似的看法亦出現在若干研究機構，紐約大學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的研究報告即指出，立法管制社群媒體可能扼殺網際網路原本具有價值的面向，類似德國以立法方式重罰不能移除仇恨言論的社群媒體公司，反而可能使業者錯誤地移除平台上的大量內容。因此，政府的介入無助於網路自由資訊流動的促進，而且會對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造成立即的威脅。倫敦政經學院的媒體政策計畫項目（Media Policy Project）亦在其政策建議中強調，政府可以在對付假新聞的行動上扮演會議召集人或觸發器的角色，但行動要特別謹慎小心，以免傷害言論自由與媒體自主（Tambini, 2017）。

¹¹ Facebook 創辦人兼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便強調，他信奉新聞自由，Facebook 處理假新聞的做法不會顧慮是否影響它們賺錢，而是有更多的價值必須考量（safian, 2017, April 11）。

¹² 巴柏在 1945 年發表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中指出，無所限制的寬容必然導致寬容的消失，因為「不容異議」的哲學主張往往不願進行理性論辯，亦不同意其追隨者聆聽理性的論證，進而教導支持者以武力回應外界的質疑。為了保障寬容社會的存在與運作，就必須抵制「不容異議」對社會所帶來的猛烈襲擊。

但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從來不是絕對自由，對社群媒體進行適當而必要的管制是否絕不可行？強調應對商營社群媒體採取更大程度管制的學者 Tusikov (2017, November 7) 即指出，「言論權並非絕對權力」，社群媒體應否管制的辯論實質上是一場資訊控制權的戰役，涉及甚麼樣的資料可被蒐集與販賣？甚麼樣的內容可被允許在網路傳播？以及誰來決定？她不認為光靠社群媒體平台的現有自律作為足以解決惡意傳播的假新聞問題，基本原因就在於社群媒體平台若限縮足以產生廣告營收的資訊流動，根本違背它賴以獲利的商業模式。何況，被宣稱可以用來抑制假新聞的演算法乃是公眾無法檢視的禁區，政府與公民至少有權瞭解這些形塑我們言論權的社群媒體公司是否真正立基於公共利益？

以往有關社群媒體治理的研究與論述偏重使用者層面，而較少論及社群媒體平台維護良善資訊環境的責任，但傳播政策與管制領域的學者專家確已開始注意商營社群媒體治理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演算法在其中所產生的影響。Napoli (2015) 的研究即指出，既然社群媒體乃演算法驅動的平台 (algorithmically-driven platform)，平台的營運者可藉由演算法在新聞與資訊的流動上扮演具影響力的角色，那麼就如同過去對傳統新聞媒體可以控制政治流程的擔憂一樣，我們似乎也應對社群媒體平台提出相同的問責課題。同樣的，就社群媒體的內容而言，我們也可以提問：是否要像傳統新聞一般，要求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必須納入公共利益的概念？

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共通性，尚可以在兩者同具的制度本質中得到印證。從制度理論 (institutional theory) 的角度入手，Napoli (2014) 以媒體科技可以被視為一種制度出發，論證演算法在當代媒體系統動態中的某些角色與功能確有其制度化的本質。演算法就如同其他媒體制度一般，能夠直接形塑使用者行為，影響其偏好的形成與內容產製的決定，而它之所以能產生如此的作用，亦與其他媒體制度相似，都是經由複雜的社會過程所不斷發

展而成。演算法既然與傳統媒體制度類似，都會促進與框限媒體組織與媒體使用者的行為與認知，顯示網路搜尋與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與傳統媒體的運作相通，都具有相當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ity），因此，對演算法驅動平台進行管制或賦予公共服務義務，有其具說服力的論據基礎。

商營社群媒體業者以往一直主張，它們只是提供平台供使用者自由交流，並非傳統產製內容的媒體，不應以管制媒體的方式來限制社群媒體的運作。誠然，社群媒體乃至其他網路平台的運作未必與傳統意義的媒體相同，政府相關管制政策仍應考慮不同傳播科技的特質，但許多傳統媒體早已具有策展性質，並不純然都是自行產製內容，而依據本文前面的分析顯示，商營社群媒體的平台服務表面上是使用者獨立自主的傳播行為，實質上是在不透明演算法操控之下的資訊流動，平台所有者其實是以各種方式介入了內容傳播，包括平台上的定向廣告等商業活動。在媒體定義已然轉變的今天，與傳統媒體制度存在相通制度性的大型網路搜尋或社群平台，顯然無法以自己不是媒體來推託自律責任。何況，社群媒體早已存在依據他人檢舉將用戶停權之機制，足見社群媒體並非完全放任的平台，具有類似傳統媒體的編輯權能。

社群媒體所遭致的批評不只來自外部，猶包括曾在其內工作的高層主管及投資人，一些 Facebook 的前高層及股東即抨擊該平台正在破壞社會應有的運作形式，平台上充斥假新聞，缺乏公民論述，亦無助於使用者之間的合作。他們亦指責該公司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無能與無心處理假新聞議題（ABC/AP, 2017, December 13）。面對連串內外的批評與壓力，Zuckerberg 於公開回應中承認政府對網際網路的管制已是「無可避免」（Kelly, 2018, April 11）。既然，社群媒體已經是不少民眾的重要訊息來源，而商營社群媒體又已形成壟斷結構，而且是全球性的寡頭壟斷，對公共事務影響力巨大，豈容完全豁免於管制？真正的問題顯然在於如何管制以實現其應有的問責。

二、社群媒體的問責

問責乃自由經濟體制下所有企業的重要課題，重視企業倫理之公司會透過法定及自我作為主動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公共義務，傳播產業亦不例外。傳統媒體的問責機制至少包括嚴謹的自律規範、切實的員工教育訓練、透明的營運資訊，以及負責任的公眾申訴管道與公眾意見調查等。前文已論及商營社群媒體在假新聞議題上的自律作為未見貫徹，事實的演進亦證明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無法符合社會期待，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的「通俄門」事件，乃至 2018 年英國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等公司接連爆發的 Facebook 數據洩露事件，在在顯示社群媒體的自律作為只是不斷尋求亡羊補牢，而且是「壓力驅動」式的改革，社會每多一分壓力，這些巨頭的自律作為才向前邁進一步。

不少研究顯示了商營社群媒體業者在自律作為上的遲鈍，以社群媒體公司的隱私政策為例，Fuchs（2010）指出，「經驗研究顯示，在自律的情況下，只有少數公司執行的隱私政策能夠守住公正的資訊作業。」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清楚揭露，商營社群媒體服膺使用者資料的隱私問題交由企業自律的意識形態，因為自律乃維護其商業利益之關鍵要素，弔詭的是，商營社群媒體對自律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以自律合理化其使用者資料商品化的操作，另一方面卻又排斥履行公共責任所必需施行的嚴謹自律，充分顯現商營社群媒體以商業利益為上，公共利益居次的營運原則。

截至目前為止，商營社群媒體在外部壓力下所採取的自律作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一）透過內部人工審查與自動化偵測（automated fact-checking, AFC）¹³，以及外部第三方事實查核來抑制假新聞的氾濫；（二）強化申訴機

¹³ 自動化事實查核技術已對事實查核工作產生若干助力，惟離高度自動化的目標仍然遙遠，其推進有賴包括平台公司在內的多方面支持（Graves, 2018）。

制來處理平台上所傳播的仇恨言論與假新聞；(三) 提升政治廣告的透明度以降低有心人士或外國力量惡意操控選舉的可能性；(四) 嚴密控制合作單位所取得的使用者資料，以免資料外流與不當利用。為此，社群媒體確實增加了經費支出，亦達致若干成果，例如在人工審查假新聞的人力部署上，Facebook、Twitter、YouTube 均宣稱 2018 年底前全球將到達或超越萬人 (Facebook newsroom, 2018, March 29; Mosseri, 2017, April 6; Rosen, 2018, May 15;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18, April 5; Wojcicki, 2017, December 4)。問題是這些自律作為是否已足以構成社群媒體的完整問責機制，以及這些作為是否得到落實而非口惠實不至？

反對政府管制社群媒體的紐約大學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亦不認為這些平台巨頭的自律措施已經足夠，從推進高品質商業行為的角度出發，該中心主張有關社群媒體恐怖主義內容與政治假新聞的治理應採取管制與現況之外的第三條路，亦即社群媒體若不願接受政府管制，就必須在對付線上有害內容，增進新聞報導與公民討論品質等核心社會利益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自治角色。而它們所建議的做法包括：強化公司治理、改善演算法、導入更多「阻力」(friction)、增加人工監管、改革廣告模式、促進產業合作與確認政府角色等 (參表三)。不過，該中心接受立法規範線上政治廣告須揭露付費刊登者資料。

表三：社群媒體應該實現的自律作為

強化公司治理	針對恐怖主義內容與政治假新聞進行全面的內部弱點評估，並就結果採取解決行動。
改善演算法	就內容可信度找出更新與更多的精確指標
導入更多「阻力」	調整使用者介面以納入警示、通知，以及其他在使用者與可疑內容之間可以形成「阻力」的可能形式，以減少使用者分享或點閱有問題的內容。
增加人工監管	投入足夠人力來審視與評估內容，同時提供使用者更多提報有害資訊的工具
改革廣告模式	將所有關於治理、技術與人工監管的建議皆運用於廣告業務
促進產業合作	數位平台之間應分享知識以極大化對抗有問題內容的效益，並與公民團體、廣告商、內容產製者及使用者增加互動，以強化問責並建立使用者信賴。
確認政府角色	政府應致力於不會威脅言論自由的工作，如提昇媒體素養。

資料來源：*Harmful content: The role of internet platform companies in fighting terrorist incitement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isinformation*, by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New York, NY: NYU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的社群媒體自律主張基本上並未超越這些巨頭業者的現行作為，只是要求將自律做得更為徹底與到位而已。但學界與公民社會在這些自律作為之外，尚提出不少建議，其中尤以營運透明化為其焦點，強調社群媒體除了廣告主資料的透明化，尚有諸多可行與應行之透明化作為。它們指出，社群媒體平台愈透明化，就愈能受到利害關係人的審視與節制，不僅有助於利害關係人對社群媒體本質與運作的理解，並能促進彼此之間的良善關係與連結，實現最大程度的公共利益。

學者 Napoli (2015) 即認為，以往有關社群媒體治理的論述鮮少對其演算法如何彰顯公共利益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因此社會應該對演算法治理

(algorithm governance) 如何實現公共利益進行更為寬廣的討論，其中，演算法的透明度是必須面對的問題。Napoli (2015) 強調，演算法公開雖然存在影響商業模式、營收來源或阻礙創新的疑慮，但社群媒體業者可以仿效傳統媒體將閱聽人調查委託專業組織保密進行的方式，將演算法的透明問題交由產業贊助的組織來處理，如此即可不必擔心產業秘密洩漏給競爭者的問題。

歐盟委員會針對假新聞議題邀請專家學者於 2018 年 3 月所完成的對策報告中，相當完整的羅列了社群媒體應該透明化的面向，包括（一）財務資料的透明，如提供某些特別資訊的所有者、贊助內容的提供者、影響者（influencer）與機器人（robots）的費用提供者等；（二）線上新聞來源的透明，如建構新聞來源透明度指標、增加優質資訊的能見度、有關資訊選擇的演算法；（三）事實查核的透明，如結合第三方的查核方法與作業狀態、符合隱私權下的資料近用、查核作業與經驗的交流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8）。這些建議最後導引歐盟對社群媒體平台作業準則的要求，可視為實現透明化政策的第一步。

就財務資料的透明化而言，持政治經濟學觀點的 Fuchs (2014a, pp. 159-160) 則更進一步主張發展新的、另類的隱私權概念，視隱私為勞工與消費者的集體權利，要求企業型社群媒體的所有人及其企業收入應公開接受檢視，讓財富透明化。儘管這些透明化的訴求未必能立即與全面獲得採行，但毫無疑問，基於商營社群媒體在資訊傳播與民主運作上愈來愈大的影響力，社群媒體巨頭們顯然將在問責機制上，特別是自律措施方面面臨社會更大的壓力。誠如 Napoli (2015) 所強調，社群媒體的治理架構「在其擁有的力量與應該抱持的責任之間要有更大的一致性」。亦如 Scholz (2013, p. 6) 的質問，我們要思考的是：「社會到底要賦予多大的權力給網路上的主要網站？難道至為重要的數位平台不該被規管，甚至是國有化？」

確實，在基進的國有化主張之外¹⁴ (Srnicek, 2017, August 30)，商營社群媒體如何被適度管制以向社會問責，已是不可逃避的課題。現階段的管制課

¹⁴ Srnicek (2017, August 30) 認為，面對網路平台巨頭將來運用人工智慧等科技更進一步獲取資料，擴增其平台帝國霸業的威脅下，小幅度的規管措施已不足以因應這些業者擁有並控制 21 世紀人類社會基礎建設的風險。

題不是要對內容進行直接監理，更不是要作為真理的裁決者，而是要以促成商營社群媒體的完整與有效問責作為起點。從公共利益的角度言之，商營社群媒體可行之問責機制至少包括公司營運資料的透明開放（如使用者資料的運用、廣告作業、事實查核作業、演算法等）、公眾申訴機制的完整建立，以及使用者資訊素養的培育等。就假新聞的處理而言，目前帶有敷衍色彩的事實查核不僅無濟於事，申訴機制的貧弱更是讓使用者的權益與救濟無所依托。未來除了平台自身的人工與自動化事實查核應該更為積極、準確之外，目前與第三方合作的事實查核亦應擴大與貫徹，並讓使用者申訴機制標準化、透明化。

伍、結語：社群媒體作為傳播公地的鬥爭

對美國矽谷文化頗具影響力的哲學家 Ayn Rand 倡導自利型客觀主義（self-interested objectivism），相信不需要階層化政治控制的電腦網絡，足可測量、控制與自我穩定社會，處於此種社會中的人類可以只為自己的幸福而工作（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 41）。但網路與科技世界是否真如 Ayn Rand 此種科技未來主義者的樂觀描繪？Fuchs（2011）在他對 Facebook 所做的研究中即以質問的口吻表示：「如果 Zuckerberg 真的不在意利潤，那麼為何 Facebook 不是一個非商業的平台？而且為何要採用定向廣告？」反言之，既然企業型社群媒體對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存在各種可能的負面影響，那麼尊重市場自由競爭的民主體制又該如何面對壟斷性商營社群媒體平台所帶來的反民主威脅與挑戰？吾人顯然有必要對此進行更深層、更多元的思考。

一、社群媒體政治的再建構

在社群媒體的介入與發展之下，人類的資訊溝通系統雖然出現諸多新的變化與可能，但一如所有重大的科技革命，一旦經過資本主義式發展的「洗禮」，便無可避免於國家權力與企業權力的「操控」，此兩種權力在社群媒體發展上的關係被 Fuchs（2017）解析為相互抓背式（scratch one another's back）

的彼此回饋與協助。Trottier 與 Fuchs (2014) 亦在探討社群媒體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係時指出，當代的社群媒體具有顯著的「企業－國家－權力」(corporate-state-power) 的現象，乃有權力的企業與國家利益現身與會合的力場(force field)。處於此一力場中的公民社會就如同各種線下的鬥爭一般，儘管資源不對稱，仍試圖藉由各種溝通資源挑戰企業與國家權力，以致社群媒體政治與線下政治殊無二致，都是不平等的權力場域。

本文所分析的企業型社群媒體特質明確顯示，當前商營社群媒體的運營機制已嚴重侵蝕社群媒體的民主潛能與公共意涵，公民社會在商營社群媒體的角色是脆弱的、邊緣的，也因此，商營社群媒體所形塑的公共領域乃是被企業殖民的公共領域，離 Harbermas (1984) 所期待的理想的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甚遠。就此而言，Mosco (2009, pp.151-155) 將公共領域視為公民實現民主的社會過程的論點，特別具有意義。理想的公共領域必須讓公民能夠平等且充份的參與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事務的決策，但要實現平等及參與的公共領域，其中必然存在商品化與民主的鬥爭，社群媒體政治亦因而會是一場公民爭取傳播公地的持續鬥爭。

社群媒體作為思想與實踐的鬥爭場域，其結果並非命定，社群媒體的未來仍視複雜的社會鬥爭動態而定。社群媒體可以是培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宰制的途徑，它是否能成為公民願意投入時間與他人相互交流、產製內容的場域，「全決之於人們要如何使用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 33)。Cohen (2008) 即指出，社群媒體可以被創造來謀取利潤、追求好玩，也可以用來解決問題、動員民眾與分享資訊，顯然在商業驅動的模式之外，具有集體社會性知識(collective social knowledge) 的社群媒體尚有大量的潛能未被實現。

毫無疑問，看待社群媒體不能再以科技為核心，而須清楚認識商營社群媒體的企業本質，看清其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社群媒體的使用雖然可促進人類活動的社會化，因而具有提升民主化溝通的潛能；卻也可能陷入資本主義商品化邏輯的牢籠而使社群媒體的功能淪為有限的社會性(limited sociality)，嚴重斲傷人類溝通應有的民主意涵(Fuchs, 2014a)，此一弔詭在商營社群媒體處理假新聞的作法中再次得到印證。由於商營社群媒體係以商

業利益為其營運之優位原則，一旦認真處理假新聞便可能損及既得利益，若非社會壓力巨大，商營社群媒體連目前的虛弱自律都可能不會出爐。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強調社會實踐（social praxis），尋求思想與實踐的統一，以期為所有人創造更大的福利（Mosco, 2009），主張透過批判的洞見，形成意識，展開行動，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奮鬥（Fuchs, 2014a）因此，商營社群媒體平台能否發揮一定的、必要的公共服務功能，能否在公民社會的要求與壓力下，成為民主的公眾溝通系統的正向夥伴，真正的人類解放工程的有力工具，實有賴此時此刻吾人的作為而定。沒有具體的鬥爭行動，就不會有可欲的未來。用 McChesney（2008, p. 379）的話來說，新傳播科技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只有自覺行動的人類方能處理與解決問題」。從傳播政策的角度言之，吾人的自覺行動除了建立商營社群媒體的問責機制之外，尚存在值得思考的另類解決方案：建構公共型社群媒體。

二、公共型社群媒體的建構

據統計，在前 100 大的全球網路平台中，營利型者占 98%，只有 2%屬於非營利性質（Wikipedia 與 BBC Online）。這些網站中有 88%採用定向廣告作為資本積累的模式，另有 10%係以計次付費、訂閱、產品或服務販賣、行銷所得，以及分類廣告模式營運（Jin, 2013）。此種資本主義在網際網路的運作型態被 Jin（2013）稱為平台帝國主義（platform imperialism），乃是數位科技與數位經濟時代新型態的帝國主義。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平台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全拜使用者的免費或玩樂勞動所賜，但並非所有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活動都如同商營社群媒體一般的商品化，例如使用者在非營利媒體或平台上的活動雖然是沒有交換價值，沒法創造利潤的非商品化勞動，卻是有助於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許多學者與關心人士因此提出各種公共型社群媒體的倡議，希望開發社群媒體的正面價值與民主潛能。

公共型社群媒體的主要構思有兩種，其一為將傳統公共廣電積極轉型為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藉以制衡商業化與集中化的傳統

媒體與新媒體巨頭 (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p. 54-55)。歐洲與全球許多具有公共廣電傳統的國家頗多藉由該國公共廣電媒體帶動全社會的數位轉型，經由不斷的理念辯證與實證經驗顯示，傳統的公共廣電組織若能在數位平台提供積極服務，不僅有助於自身的永續經營，更重要的是，能夠抑制數位資訊環境的商業化導向，並將公共利益的實踐延伸至新興的傳播生態。

Iosifidis (2011) 即強調，雖然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有能力創造更健康的公共領域的認知未必是個迷思，但它的民主與培力功能不應被誇大，其理由包括：(一) 網際網路的開放參與可能淪為混亂而無結構性的對話；(二) 經濟與技術能力等因素影響網際網路使用的普遍性；(三) 政治高度管制及民主國家存在不同形式的網路審查；(四) 網際網路已經變成企業活動的主要舞台；(五) 廣泛對話與批判討論在網路上經常缺席；(六) 網際網路內容高度黨派化，以及(七) 網路公司不產製原創新聞內容等。因此，相較於網路平台提供者，在資訊、民主化、去中心化、公民互動與普及性等五個領域，公共服務媒體都比商營網路業者更能發展出具包容性與涵蓋性的社會架構，進而有助於公共領域的建構與公民參與的推展。

其二為另類社群媒體 (alternative social media) 的建構。此類型社群媒體多以開放原始碼方式 (open source) 開發，免費提供使用，但不做廣告，而是依賴捐款維運。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許多非營利的另類社群媒體出現，例如現在仍維持運作的 diaspora* (<https://diasporafoundation.org/>) 與 Riseup (<https://riseup.net/>)，或是一些被社會運動所使用或開發，但現已停止運作的社群平台，如 2011 年西班牙「憤怒的人群」運動 (Indignados) 所使用的 Lorea，以及 2012 年 1 月由「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 所開發的 Occupii 等。

另類社群媒體都是由公民社會的積極行動者所製作、擁有與維運，相對不受到政府及企業的控制，而且無論是組織結構、內容或參與者，都與企業型社群媒體迥異，換言之，此類社群平台主要是以批判的、另類的資訊傳播為主 (Fuchs & Sandoval, 2015)。以目前最廣為人知的 diaspora* 為例，它以去中心化的節點 (pods) 來儲存使用者資料，用戶可登錄任何節點，自由與

網絡上的其他使用者聯繫，並擁有自己的資料，而不會像商營社群媒體般遭到大企業中心化儲存與利用使用者資料¹⁵。

但另類社群媒體尚難與企業型社群媒體競爭，其原因一方面是遭到後者以各種方式進行的壓制或孤立¹⁶，另一方面則與此類社群媒體的功能有關。不少社會運動者或公民社會的積極行動者對於使用這些另類社群媒體感到為難，因為這類平台雖然提供較多的隱私，較少的監控，而且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它們的觸達率低，難以與圈外的大眾進行溝通，加上使用者必須投入更多的經費與勞力，形成資源分配上的困難。此種兩難局面的結果就是使另類媒體的發展史變成一種自願性進行自我剝削勞力的過程，同時，所有權的自由弔詭地變成公民自由權的限制（Fuchs & Sandoval, 2015）。

Fuchs（2014a, p. 264）認為，另類網際網路的實現必須要有另類社會環境的搭配作為根本性的支持，此一環境要素就是一個參與式的民主社會，一個團結與協作的資訊社會。顯然，欲達到此一境地仍有長路要走，更要付諸行動。眾多可行或已行的行動方案中，讓商營社群媒體履行其社會責任厥為重點之一。為了解決此一寡頭式媒體結構下的傳播民主困境，一些歐美的學者與運動人士建議，應該對諸如 Google、Facebook、Amazon 與 Apple 等這些在許多國家逃避稅負的巨型跨國公司進行徵稅行動，並將稅收所得挹注於非營利媒體。甚至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的作法，由公民決定如何分配這些經費（Fuchs & Sandoval, 2015; Fuchs, 2017）。

歐美國家以往即曾基於競爭及多樣化等原則，要求寡頭壟斷或具優勢市場地位之傳統媒體提供具體資源，協助弱勢或另類媒體。在傳播生態出現劇變的今天，從大眾的無酬勞動中獲取巨額利潤的商營社群媒體巨頭，既已成為資訊生態之主角，且已形成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對其課以稅捐或要求提供必要資源，用以挹注公共型社群媒體，實乃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與可行措施。

¹⁵ diaspora*的去中心化結構可參考官網說明，見 <https://diasporafoundation.org/about>。

¹⁶ 各商營社群媒體之間也是相互封鎖，以期使用者只在自家集團的平台之間流動，藉而取得有利的競爭優勢（Van Dijck, 2013）。

參考書目

- 胡元輝 (2014)。〈建構中的新新聞生態系統—共識、爭議與展望〉, 羅世宏、童靜蓉 (編), 《社交媒體與新聞業》, 頁 251-274。台北: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 ABC/AP. (2017, December 13). Facebook hits back at former executive's claims the company is 'destroying how society works'. *ABC*. Retrieved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7-12-13/facebook-hits-back-at-chamath-palihapitiya-criticism/9254918>
- Alphabet Inc. (2016). Alphabet Inc.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abc.xyz/investor/pdf/20151231_alphabet_10K.pdf
- Alphabet Inc. (2017). Alphabet Inc.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abc.xyz/investor/pdf/20161231_alphabet_10K.pdf
- Alphabet Inc. (2018) . Alphabet Inc.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abc.xyz/investor/pdf/20171231_alphabet_10K.pdf
- Ausserhofer, J., & Maireder, A. (2013). National politics on Twitter: Structures and topics of a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3), 291-314.
-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laño, C. R. S., & Vieira, E. S.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a reply to Fuch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15(3), 1-10.
- Bouvier, G. (2016). What is a discourse approach to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and other social media: Connecting with other academic fields. In G. Bouvier (Ed.), *Discourse and social media* (pp. 1-14). Oxon, UK: Routledge.
- Bruns, A. (2009). *Gatewatch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p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utosi, C. (2012). Social net-working: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online social network industry.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in Master of Arts, Wester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92&context=etd>
- Carson, J. (2017, March 16). What is fake news? Its origins and how it grew in 2016. *The Telegraph*.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0/fake-news-origins-grew-2016/>
-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N.S. (2008). The 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22(1), 5-22.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May 31).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IT companies announce code of conduct on illegal online hate speech [Press release]. Brussels, BE: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1937_en.htm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April 26) . Tackl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Commission proposes an EU-wide Code of Practice[Press release]. Brussels, BE: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3370_en.htm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disinformation: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High level Group on fake news and online disinformation.

-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file:///C:/Users/ASUS/Downloads/Amulti-dimensionalapproachtodisinformation-ReportoftheindependentHighlevelGrouponfakenewsandonlinedisinformation%20(1).pdf
- Facebook. (2016). *Facebook annual report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2015-Annual-Report.pdf
- Facebook. (2017). *Facebook annual report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FB_AR_2016_FINAL.pdf
- Facebook. (2018). *Facebook annual report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FB_AR_2017_FINAL.pdf
- Facebook newsroom. (2018, March 29). Hard questions: What is Facebook doing to protect election security?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8/03/hard-questions-election-security/?utm_source=dlvr.it&utm_medium=twitter
- Fuchs, C. (2010).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b 2.0 surveillance. Vienna, AT: 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 Retrieved from <http://www.sns3.uti.at/wp-content/uploads/2010/10/The-Internet-Surveillance-Research-Paper-Series-3-Christian-Fuch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Web-2.0-Surveillance.pdf>
- Fuchs, C. (2011). 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2(1), 140-165.
- Fuchs, C. (2012).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b 2.0 surveillance. In C. Fuchs, K. Boersma, A. Albrecht, & M. Sandoval (Eds.),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pp. 31-70). New York, US: Routledge.
- Fuchs, C. (2014a).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 Fuchs, C. (2014b).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2(1), 57-101.
- Fuchs, C., & Sandoval, M.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t and alternative social media. In C. Atton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pp. 165-175). London, UK: Routledge.
- Fuchs, C. (2017). Facebook. In B. J. Birkinbine, R. Gomez & J. Wasko (Eds.), *Global media giants* (pp. 428-44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ade, P. J., & Lowrey, W. (2011). Reshaping the journalistic culture. In W. Lowrey & P. J. Gade (Eds.), *Changing the news: The forces shaping journalism in uncertain times* (pp. 22-4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ottfried, J., & Shearer, E. (2016, May 26).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file:///C:/Users/asus/Downloads/PJ_2016.05.26_social-media-and-news_FINAL-1.pdf
- Graves, L. (2018). *Understanding the promise and limits of automated fact-checking. Digital News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publications/2018/factsheet-understanding-promise-limits-automated-fact-checking/>

- Gunaratna, S. (2016, November 15). Facebook, Google announce new policies to fight fake news. CBS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bsnews.com/news/facebook-google-try-to-fight-fake-news/>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 Holan, A. D. (2016, December 13). 2016 Lie of the Year: Fake news. PolitiFa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article/2016/dec/13/2016-lie-year-fake-news/>
- Howe, J. (2009). *Crowdsourcing :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NY: Three Rivers press.
- Iosifidis, P. (2011). The public sphere, social networks and public servic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5), 619-637.
- Iosifidis, P., & Wheeler, M. (2016). *Public spheres and mediated social network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and beyond*.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in, D. Y. (2013). The construction of platform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1(1), 145-172.
- Kelly, E. (2018, April 11). Zuckerberg: Federal regulation of Facebook 'inevitable'. USA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4/11/zuckerberg-federal-regulation-facebook-inevitable-faces-second-day-capitol-hill-hearings-facebook-pr/506235002/>
- Kollewe, J. (2017, May 2). Google and Facebook bring in one-fifth of global ad revenu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7/may/02/google-and-facebook-bring-in-one-fifth-of-global-ad-revenue>
- Levin, S. (2017, May 16). Facebook promised to tackle fake news. But the evidence shows it's not working.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may/16/facebook-fake-news-tools-not-working>
- Levinson, P. (2017, November 28).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ocial media would be a 'cure' far worse than the disease. *The Convers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theconversation.com/government-regulation-of-social-media-would-be-a-cure-far-worse-than-the-disease-86911>
- Lomas, N. (2017, October 2). Germany's social media hate speech law is now in effect. *TechCrunch*. Retrieved from <https://techcrunch.com/2017/10/02/germanys-social-media-hate-speech-law-is-now-in-effect/>
- Lumb, D. (2018, April 10). Twitter joins Facebook in supporting the Honest Ads Act. *Engadge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ngadget.com/2018/04/10/twitter-joins-facebook-in-supporting-the-honest>

- ads-act/
- McChesney, R. W.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Enduring issues, emerging dilemmas*.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Morozov, E. (2009, May 19).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lacktivism.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5/19/the-brave-new-world-of-slacktivism/>
-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London, UK:Sage.
- Mosseri, A. (2017, April 06). Working to stop misinformation and false news.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7/04/working-to-stop-misinformation-and-false-news/>
- Napoli, P. M. (2014). Automated medi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perspective on algorithmic media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4, 340-360.
- Napoli, P. M. (2015).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Governance of news platforms in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and algorithmic gatekeeper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39(9), 751-760.
-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A. L., & Nielsen, R. K. (2017).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News%20Report%202017%20web_0.pdf?utm_source=digitalnewsreport.org&utm_medium=referral
- Oxford Dictionaries (2016, November 16). Oxford Dictionaries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POST-TRUTH. [Announcement]. Oxford, UK: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xforddictionaries.com/press/news/2016/11/17/WOTY-16>
- Rosen, G. (2018, May 15). Facebook Publishes Enforcement Numbers for the First Time.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8/05/enforcement-numbers/>
- safian, R. (2017, April 11). Mark Zuckerberg on fake news, free speech, and what drives Facebook. Fast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stcompany.com/40397297/mark-zuckerberg-on-fake-news-free-speech-and-what-drives-facebook>
- Scholz, T. (2013). Introduction: Why does digital labor matter now? In T. Scholz (Ed.),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pp.1-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ott, M. (2016, July 19). Google, trying to endear itself to Europe, spreads \$450 million around.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0/technology/google-europe-lobbying-eu.html>
- Shaban, H. (2017, July 21). Google spent the most it ever has trying to influence Washington: \$6 million.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switch/wp/2017/07/21/google-spent-the-most-it-ever-has-trying-to-influence-washington-6-million/?utm_term=.d5ef6d881fd8
- Shirky, C.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London, UK: Penguin.

- Smythe, D. W. (1981/2006).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 G. Durham & D.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e studies: KeyWorks* (pp. 230-256). Malden, MA: Blackwell.
- Srnicek, N. (2017, August 30).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Harmful content: The role of internet platform companies in fighting terrorist incitement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isinformation*. New York, NY: NYU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vailable at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7df270e4b0ba184dfc490e/t/59fb31bc0d929735d3d01d95/1509634510957/Final.Harmful+Content.+The+Role+of+Internet+Platform+Companies+in+Fighting+Terrorist+Incitement+and+Politically+Motivated+Propaganda.pdf>
-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mbini, D. (2017). *Fake news: Public policy responses. Media Policy Brief 20*. London: Media Policy Projec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Tapscott, D. (2008). *Grown up digital: How the net generation is changing your worl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Thomasson, E. (2017, April 5). German cabinet agrees to fine social media over hate speech.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hatecrime-idUSKBN1771FC>
- Trottier, D. & Fuchs, C. (2014). Theorising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An introduction. In D. Trottier & C. Fuchs (Eds.),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Protests, revolutions, riots, 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pp. 3-3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usikov, N. (2017, November 7). Regulat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efore it's too late. *The Convers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egulate-social-media-platforms-before-its-too-late-86984>
-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18, April 5). Expanding and building #TwitterTransparency. Twitter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twitter.com/official/en_us/topics/company/2018/twitter-transparency-report-12.html
-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jcicki, S. (2017, December 4). Expanding our work against abuse of our platform. YouTube Official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googleblog.com/2017/12/expanding-our-work-against-abuse-of-our.html>
- Žižek, S. (1998). *The interpassive subject*. Paris, FR: Traversess.
- Zuckerberg, M. (2017, June 23). Bring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10154944663901634>

Self-Regul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A Critiqu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Yuan-Hui Hu*

ABSTRACT

After the issue of fake news started receiv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disseminating fake news has also been widely discussed and debated. Under pressure to maintain an equilibrium between freedom of spee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have attempted to put in place several perfunctory self-discipline measures as a response to outside scrutiny. The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t shap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hopes to clarify the meanings and limitations of two types of social media concepts: participatory and corporate. By illuminatin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media,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ithin social media can be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the public social media under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re discussed.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media, fake news, misinformation, public sphere, self-discipline, social media

* Yuan-Hui 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telyhhu@ccu.edu.tw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知識勞工的困境研究： 以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為例

姚建華*

本文引用格式

姚建華（2018）。〈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知識勞工的困境研究：以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8:77-102。

投稿日期：2017 年 7 月 5 日；通過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姚建華為加拿大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副研究員、復旦大學國際出版研究中心副研究員，email: yaojianhua@fudan.edu.cn

《摘要》

作為對當代知識勞工研究有益的補充，本文旨在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出版產業中編輯人員所面臨的四個主要的困境。這些困境集中在技術、政治、經濟以及最重要的階級關係和權力變化的層面，並與當前的社會轉型緊密聯繫。導致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來自新媒體技術發展、如何在媒體市場化的進程中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原則、「單位制」的瓦解與出版社的轉制，以及知識勞工內部的不斷分化。除此之外，通過以上海兩家出版社為案例研究，本文勾勒了傳播產業和包括編輯人員在內的知識勞工所處的制度化的權力結構之間廣泛的社會關係。

關鍵詞：出版產業、知識勞工、社會轉型、媒體市場化、編輯人員

壹、導言

知識勞工研究對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們提出了許多嚴肅而又重要的問題。Bell（1999）指出，隨著知識技術型社會的崛起，尤其是當社會開始依賴於理論資訊（theoretical information）的形成與傳播的時候，一個新的領導階層，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識階層正日益凸顯其重要性。正是由於對以教育和技能中資訊生產與傳播為基礎的精英制度的重視，知識勞工已經成功轉變為當前全球新政治與經濟體系中的核心角色。

許多學者認同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不斷地補充和完善，例如 Herbert Schiller（赫伯特·席勒）、Harry Braverman（哈裡·佈雷弗曼）、Manuel Castells（曼紐爾·卡斯特爾斯）以及 Vincent Mosco（文森特·莫斯科）。與產業工人相比，具備專業技能、大多數以中產階級自居的知識勞工在全球市場中發揮了愈來愈重要的作用。Mosco 和 McKercher（2008）敏銳地洞察到，知識勞工在總工作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僅在發達國家中穩步上升，在相對貧困的國家更是迅猛增長，同時他們在全球勞工運動中也變得更加活躍。

然而，由於技術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和企業兼併（制度性兼併；corporate or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的共同作用已導致勞工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內不斷萎縮，包括知識勞工在內的勞動者處境堪憂。正如 Ross（2009）所描述的那樣：即使在傳統的專業領域內，終身制的雇傭模式也已不復存在，而彈性雇傭關係（contingent employment）變得更為普遍。因此，無論是低端行業中的產業工人還是高薪崗位的知識勞工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並且他們都不得不為始終變化的市場競爭做準備。知識勞工面臨的壓力來自長時間的工作、不斷提前的截稿時間、由勞動分工而導致的自主性降低等等。更糟糕的是，他們還面臨著對自身未來強烈的不確定性、臨時的勞動合同，甚至無法從任何保障性的社會保險中得到援助等情況。

作為對當代知識勞工研究有益的補充，本文旨在揭示知識勞工所處的權力關係網絡和制度背景；在此基礎上，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论視角出發，分析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在中國的出版產業中，數字時代傳媒改革和社會轉型給以編輯人員為代表的知識勞工帶來了四個主要的困境。這些困境集中在技術、政治、經濟以及最重要的階級關係和權力變化的層面。

貳、文獻綜述

在《傳播的勞動》一文中，Mosco（2006）提出，除了極個別的文獻以外，傳播勞動和階級形成是傳播研究中的盲區。然而，在傳播產業中雇傭勞動數量的不斷上升，由企業兼併和數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技術和制度變化使傳播學者愈加關注「工作和勞工組織變化的本質」，進而強調對宏觀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的瞭解（Mosco, 2008, p. 121）。因此，勞工研究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傳媒和傳播更為廣泛的歷史轉型過程，尤其是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研究勞工問題，有助於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個全面而具有很強詮釋力的理論結構。

首先，知識勞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他們在當前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朱西西、代長珍，2009）。具體來說，在馬克思看來，從生產的角度對階級進行劃分，工人階級是一個特定的社會存在，他們擁有共同的身份，而這種身份根植於他們雇傭勞動力的身份——他們不掌握生產資料、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獲得工資（Braverman, 1974）。因此，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在中國，工人階級由下列人員組成，「他們通過自己的體力勞動或者技術，間接或者直接運用生產工具生產商品，提供勞動服務或者為生產及服務提供說明，並由管理人員進行監管」（陸學藝，2002，頁127）。具體來說，工人階級從事**物質商品**（material commodities）的生產，比如衣服、玩具、化學藥品以及電子產品等，同時進行**非物質商品**（non-material commodities）的生產，比如：知識、資訊、管理和服務等。

在向市場經濟疾速轉型的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同樣也經歷著轉型和重塑。在經濟改革之前，對於工人階級的普通理解就是，他們包括城市的勞動力，並不具有任何獨立的生產和再生產工具，因此為了生計他們不得不成為雇傭勞動力，主要靠勞動所得維持生計。因此，工人階級的主體就是產業工人。然而，中國經濟改革將工人階級的概念不斷地擴大化，形成了新的「工人階級」概念，這個新的概念，包括四種社會劃分：提供體力勞動的工人（藍領工人）、提供智力勞動的工人（白領工人）、從事教育或者科學工作的知識份子、公務員和公共領域的管理人員（劉玉方，2001年12月36日）。也就是說，在中國，工人階級的概念已經擴展為包括：國有企業、集體經濟以及

私營部門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農村的幹部和知識份子、私營企業主、個體戶、士兵、大學生以及下層社會的人(如外來務工人員和乞丐等)。

在官方話語中，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一樣，他們同樣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因此，從事教育、科學技術、醫療衛生部門的知識勞工，當然包括媒介知識勞工都被認為是工人階級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在中國，一個統一的、聯合的工人階級概念正在形成。

其二，張望軍和彭劍峰在《資訊時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趨勢》(2001)中闡述到，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章程，知識勞工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的階級利益與工人階級其他組成部分的利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聯繫往往是通過他們的工作連接起來的。因此，我們需要研究知識勞工與產業工人之間的關係，並且研究他們的身份、意識和行為。這不僅僅是因為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知識勞工的勞動需要與產業工人的勞動聯繫起來進行考慮；同時，他們面臨著相同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而共同面臨的挑戰。

除此之外，對於知識勞工的社會分析需要考慮到知識勞工和產業工人與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在中國，與國家經濟或國有企業相關的重要經濟決定需要得到共產黨和政府的同意，所以不管是知識勞工還是產業工人，都不可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物質利益，並將這些利益轉化到政治決策之中或者導致分配過程中的政治變化。因此，不管知識勞工還是產業工人都處在相同的境遇之中——他們需要服從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而從實質上來說，後者對社會資源擁有所有權和分配權。

另一方面，Lee (2007) 指出，勞動政策改革已經重新塑造了工作和雇傭勞動的法律關係；因此，國家對工人和工作場所的政治控制越來越弱化。隨著單位制的瓦解，以及伴隨著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以來的勞動合同概念的引入，1995 年頒佈了第一部《勞動法》。這些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勞動法》的頒佈從本質上規定了對雇傭勞動關係進行規範的不再是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而是《勞動法》。此外，用以解決勞動糾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於 1993 年起實施，涉及調解、仲裁、訴訟三個環節 (Ho, 2003)。這些法律和條例的頒佈與實施說明在勞動力的分配過程中，勞動力的市場機制取代了勞動力的行政管理機制。隨著法律和市場重要性的

不斷提升，不管是產業工人還是知識勞工對共產黨和國家過去的那種政治和經濟的依賴性不斷減弱，而對於市場的依賴性不斷增強。

參、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批判性地分析中國知識勞工，特別是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在當代社會轉型中面臨的困境，及其探究這些困境的成因。這些研究方法包括：文獻研究法和半開放式的深度訪談。

一、文獻研究法

報紙、雜誌、宣傳手冊、政府公報和商業財報，以及新聞報導是本研究文獻資料的主要來源。

首先，本研究收集並分析了政府提供的各類相關資料，以此來追溯傳媒產業的發展歷程。其中最重要的資料來源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等部門的工作報告、白皮書和政策文件。有關勞工與雇傭關係的官方資訊，本研究則參考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國務院的官方資料。

其次，年鑒是本文的重要文獻來源。由於在品質、可獲得性和成本方面的優勢，年鑒被認為是最廣泛、最專業的官方資料（Vallas, Finlay, & Wharton, 2009）。本文參考了各年的《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新聞年鑒》、《中國出版年鑒》以及《中國資訊產業年鑒》。它們全面描述了中國傳媒行業的年度發展（特別是出版產業的發展）和產業關係中的技術進步。

第三，本文運用大量非政府組織的報告來對官方資料進行補充。Denzin 和 Lincoln（2003）指出，因為政治宣傳的用途，官方資料可能被操控，因此存在偏差或謬誤。有鑑於此，本文在文獻的選擇過程中格外關注了傳媒產業和勞動關係領域內許多重要的非政府性質報告，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中國傳媒發展索引年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發佈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北京勞動和社會保障論壇的《中國勞工問題報告》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和人口和發展研究中心的《上海人力資源

發展報告》等。

二、半開放式的深度訪談

本文以上海的兩家出版社為研究案例。在 Yin (2009) 看來，案例研究不僅可以檢視個案的複雜性，更可以幫助研究者深刻理解與之相關的更為宏觀性的系統性問題——案例研究的方法對一個想要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審視同一問題的研究者來說是再恰當不過的方法了。

(一) 深度訪談的基本問題

在本研究中，與編輯人員的訪談首先得到了出版社領導的同意。深度訪談的對象主要是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層級的編輯工作者（共八名，每家出版社四名）。訪談物件都閱讀了《訪談資訊表》中的相關資訊和條款，並簽署了《訪談同意表》。

深度訪談包括結構性的和開放式的問題，每個訪談的時長大約在 2-3 個小時，並基本在編輯所工作的出版社內完成。深度訪談主要聚焦於下列問題：

1. 作為一名編輯人員，您的工作過程在過去的一些年間是否發生了變化，您是如何應對這些變化的？

(1) 您能具體描述工作過程的變化嗎？

(2) 在這個過程中，技術起到了哪些作用？你是否意識到資訊和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的困境，尤其是新媒體的運用對您工作帶來的挑戰？

(3) 媒體市場化的過程是否對媒體扮演的「政治宣傳」角色帶來衝擊？如果有衝擊的話，這種衝擊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2. 您是否意識到編輯人員社會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的總體變化？您覺得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3. 您覺得在出版社內部資深編輯人員和年輕編輯人員之間是否存在區別？這些區別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二) 補充性訪談

對於上海其他大型出版社三位主編的深度訪談是對以上兩個案例有益

的補充。此外，深度訪談的對象還包括上海市出版局的政府官員和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的工作人員。這些訪談，結合從案例研究中所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可以說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媒介知識勞工，尤其是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對於上海市出版局政府官員的訪談問題主要聚焦於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區政府）在改善媒介知識勞工現實困境中發揮了哪些積極的作用，比如政府如何解決媒介知識勞工社會福利水準下降等問題；政府在擴大勞工組織影響方面，出臺了哪些相關政策和完善方案。對於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工作人員的訪談，主要聚焦於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組織了哪些活動，使得不同出版社中不同年齡、性別、職稱以及教育背景的編輯人員聯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深度訪談旨在探討將編輯人員組織和聯合起來的制度性安排和設計。表一總結了每位受訪者的基本資訊。

表一：受訪者的基本資訊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教育背景	類別
受訪者 1	男	46	本科	編輯
受訪者 2	女	37	碩士	編輯
受訪者 3	女	55	本科	編輯
受訪者 4	女	33	碩士	編輯
受訪者 5	男	25	本科	編輯
受訪者 6	女	31	碩士	編輯
受訪者 7	男	32	碩士	編輯
受訪者 8	男	55	本科	編輯
受訪者 9	女	34	博士	主編
受訪者 10	男	58	本科	主編
受訪者 11	男	59	博士	主編
受訪者 12	男	48	碩士	政府官員
受訪者 13	女	43	本科	政府官員

（三）半開放式深度訪談中的倫理問題

在半開放式深度訪談中，需要強調以下兩個倫理問題。第一，Berg (2007) 強調案例研究的每一個步驟都離不開主觀決策——從研究案例的確定，到撰寫最終結果和報告。他提出：主觀決策與資料收集分析中的**樣本誤差** (sample bias) 和**計量誤差** (measurement bias) 緊密相關。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樣本誤差可能發生在以下兩個方面：受訪者的選擇是否保證隨機性，以及研究的出版社是否具有代表性。同時，鑒於每個人對民主、集權制以及市場化的定義不盡相同，計量誤差也是存在的。然而，論證的正確性不僅在於研究者應儘量嘗試所有可能的方法以規避主觀決斷，更在於做出定論、選擇標準前的不斷三思 (Stake, 2000)。

在半開放式深度訪談中，本文採用了一種綜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三角法 (triangulation)，力求明晰所有的選擇和方法。在 Denzin 和 Lincoln (2003) 看來，資料來源廣泛的研究會更為精確。三角法——運用不同資源 (在本文中，包括文獻研究、觀察和深度訪談) 分析同一問題——以便更精準地展現所研究問題的各個方面。

第二個倫理問題與受訪者的匿名保密相關。任何涉及個人觀點和個人環境的質性研究法都會對受訪者造成潛在的威脅，例如失業、聲譽和社會地位的降低 (Stake, 2000)。本文的研究對匿名保密的要求更為突出，因為受訪者可能因為所提供的特定資訊而被輕易辨認。為了保護受訪者，在與受訪者首次接觸時，他們就被告知可以隨時選擇退出研究的權利——在訪談開始、進行和結束的各個階段。同時，如果他們選擇撤回他們提供的資訊，這些資訊將被立即，同時永久性地刪除。《訪談資訊表》和《訪談同意表》都對退出訪談的細節進行了詳細地描述，並在訪談之前提供給受訪者。此外，訪談物件的真實姓名在本文中均被隱去。

肆、出版產業處境堪憂的編輯人員

Mosco (2009) 指出，社會生活由結構和能動力量相互構建，結構 (structure) 在這個過程中由人類能動行為 (human agency) 來組建，而它又提供了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Giddens (1984) 進一步論證到：結構是在社會生產中隱喻的、不斷迴圈的規則和資源。結構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並具有「主體性缺失」的特性。然而，社會系統中不僅存在著結構，同時也包含了人類的能動性，而人類的能動性是跨越時間和空間進行再生產的。因此，對於社會系統結構的分析意味著將能動性的觀點、社會關係和社會實踐融入到對社會結構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去。

從這一點上來說，結構和能動性並不是兩個獨立的現象，而是在現行的社會生活模式中相互構連的。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中國傳媒產業中的結構化過程（尤其是出版產業），強調結構（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和能動性（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之間的聯繫，並嘗試著彌合關注結構的理論視角和強調行動和能動性視角之間的鴻溝。

除此之外，Mosco 和 Giddens 都認識到，結構化理論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其對於社會變化的關注。社會變化的過程被描述為：結構由人類的能動性進行生產和再生產，而人類能動性通過結構這個「媒介」而存在。也就是說，結構化理論需要我們認識到維持系統平衡性的要素以及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變化的破壞性要素（Hobsbawn, 1973）。正因為這樣，本文旨在將中國媒介知識勞工所面臨的困境與當前更為宏觀的社會轉型聯繫起來，並具體分析出版社編輯人員面臨的四個主要困境。

一、中國出版產業的技術變革

自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為目的和宗旨的中國經濟改革，始終關注資訊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網路的快速應用和發展。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職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以及媒介知識勞工大量使用資訊技術。技術發展對於出版產業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隨著技術的迅猛發展，編輯人員能夠通過電腦網路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用一個較為低廉的成本更新知識和提升職業技巧，以及快速獲得外部的資料庫和通信網路——這些資料庫和通信網路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和內部的資料庫一起使用（張子輝，2004）。對於編輯人員而言，通過使用數位技術和網路技術（如運用文本和量化資訊，生成表格和圖形顯示，以及更好地利用分析軟體），大大縮短了出版週期——由原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出版週期縮短到幾個月甚至是幾周，從而加快了圖書生產的速度。同時，在傳統的出版流程中，

編輯人員既要審讀浩繁的文字稿件，又要與作者、印刷以及發行等各環節保持直接的聯繫；而在數位化時代，他們不但可以使用先進的校對軟體，有效降低文字差錯率，還可以通過網路實現與各出版環節的即時聯繫，極大地降低了單本圖書的平均工作量和時間。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圖書印裝品質明顯提高，開本、裝幀形式日趨豐富多樣，版式、插圖一改原有的呆板單調的白紙黑字，變得圖文並茂，兼具參考性、閱讀性和欣賞性。除此之外，現代物流技術則保證圖書能夠以最快速度與讀者見面，提高了出版產業的經濟效益（王晨，2009）。

但另一方面，隨著近年來技術的發展，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和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都來自於他們勞動過程和勞動環境的改變。

首先，新技術所帶來了普遍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效應，使得編輯人員的工作被不斷地簡化。毋庸置疑，資訊技術的應用使得「去技能化」的趨勢不斷朝著職業階梯上部發展；「去技能化」不僅成為產業工人的一個特徵，也開始成為知識勞工的特徵。對於大多數的編輯人員而言，媒介數位化技術很大程度上使他們脫離了 Braverman（1974）強調的生產的「概念」（conception）層面。在中國大多數的出版社中，編輯人員主要負責審閱草稿、校對排版錯誤，以及確保出版內容的政治正確性等具體實務。編輯人員越來越感到隨著技術的發展，他們的職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不斷貶值，而這些往往是他們之前所引以為傲的（Liu, 2006）。對於編輯人員而言，這些職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包括：對於語言邏輯的精確把握（對語法、文體、標點、措詞、慣用法、文字精簡的精通）、選題策劃知識、排版、印刷技術的基本知識、編輯學理論知識和出版美學知識、傳播學理論知識以及社會心理學知識等。

第二，與新技術的「去技能化」效應緊密相聯的是，對於大多數編輯人員而言，其就業機會不斷減少。電腦在工作中的引入對於一小部分人來說，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比如技術人員。中國 2011 年新媒體和媒體融合技術人才的缺口為 60 至 80 萬人（黃孝章、張志林、陳丹，2011）。但是，對大多數出版產業的求職者來說，就業機會不斷縮減。我們並不很難理解：當技術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時候，大多數出版社的領導更傾向於僱傭資歷較淺，但專業技術嫺熟的編輯人員，而非資歷較深但缺乏專業技術的編輯人員

(Zhao, 2001)。通過對編輯人員技術能力而非職業經歷和知識的強調，編輯人員的獨特性逐步消失殆盡。

第三，編輯人員面臨著不斷強化的工作壓力。中國大多數出版社的領導都給編輯人員設置了非常繁重的工作量；在他們看來，編輯可以在數位時代通過網路更為快速而有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通過與出版社編輯人員的深度訪談發現，因為較大的工作量，編輯人員在規定的工作時間以外加班成為了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不斷加班的壓力使得工作和休閒以及辦公室和家庭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除此之外，對於那些大多數工作時間都在電腦前的編輯人員而言，他們普遍都有腰肌勞損、視力疲勞、頸椎病以及其他健康問題。

從專業技術層面上的工作壓力而言，編輯人員需要不斷掌握和更新數位化出版技術應用知識，包括電子出版物製作知識、數位版權保護知識、跨媒體出版知識以及電腦網路知識等。因此，將自我描述為「創造性勞動者」的編輯人員與所謂的「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界限變得愈發難辨。從內容知識層面上的工作壓力而言，編輯人員需要關注千變萬化的圖書市場、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出版形勢、共產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文化思潮的走向、專業領域的動態、相關出版和印刷技術的更新以及出版材料的變化等。

第四，雖然來自於網路的資訊為編輯人員提供了許多知識的新來源，但也帶來了資訊超載的問題 (Garrison, 2000; Donald & Keane, 2002)。考慮到技術革新的速度，編輯人員需要不斷地拓展和提升他們的職業知識，以及提高對海量數位化內容匯聚、分析和有效利用的能力。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資訊對於編輯人員選題的判斷和市場行銷的策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出版產業的商業環境和技術環境的變化，使出版業務變得非常複雜——製作、版式、行銷等方面選擇變得更多，也就意味著即使是最基層的編輯人員，也必須瞭解更多的知識和資訊。正如一位資深的高級編輯人員（受訪者 1）在訪談中提及的：

隨著出版產業鏈的不斷擴展，我們不但需要面對同行之間的競爭，更需要面對來自其他資訊媒體和娛樂業的競爭；因此，對於產品推向市場的速度以及對技術和商機的反應速度，成為制勝的關鍵。這

就要求我們格外關注所有流動的資訊，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熱點人物、新聞事件、國際糾紛、娛樂舞臺，凡被民眾所關注的話題，都可以成為選題和行銷的助力。所以說，我們學習知識的能力和獲取最新資訊的技巧變得格外的重要。

第五，新技術的引入加強了管理層對編輯人員勞動過程的控制。一旦科技使某項工作可以操作、可以推向市場、可以控制，就會產生強大的測量和監督的欲望；從一個側面來說，這是權力的一種新的形態。在傳媒產業中，通過技術對知識勞工施加工作壓力和進行更嚴密控制異常普遍；編輯人員在出版社中不斷屈從於「電子全景監控」(electronic panopticon; Adams & Welsh, 2008, p. 221)。在訪談中，一位編輯人員（受訪者 5）這樣說道：

在出版社中，領導經常通過手機對圖書編輯的過程進行全程操控。我經常從他那裡收到與工作相關的手機短信，有時甚至是在週末。我感到壓力非常大，因為我不再享受到這份工作先前所給我帶來的那份獨立性和自主性。領導可以隨時聯繫到我。我需要 24 小時保持手機開機，甚至是休息或者休假期間，以便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接受領導委派的新任務。

誠然，辦公室工作電子化的轉變為出版社的領導採取額外的控制機制提供了可能性，而電腦系統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技術支援。在上海的一些出版社中，監控設備在工作中開始慢慢使用，用來監控編輯的正常工作。勿庸置疑，這種不斷強化的監控加劇了編輯的壓力和不適。

二、媒體市場化進程中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原則

長期以來，在中國，探討國家、市場與媒介知識勞工之間的互動關係一直是媒體與社會研究中的熱點話題。一方面，「國家」、「政府」、「政黨」等

分析單元常常被看作是外在於社會公眾，甚至與社會公眾利益相對立的「權威力量」。媒介知識勞工「獨立」、「自由」的資訊傳播活動所面臨的若干限制成為不斷印證這種二元關係的論據。另一方面，「市場」的力量或被當作消解權威的有力手段，或被認為是建構威權的共謀者。對傳媒活動二元論的分析視角既構成了媒介知識勞工自身職業的一種基本取向，也構成了多數關於媒介知識勞工研究的一個基本前提（王維佳，2011）。

（一）市場競爭的興起

Minxin Pei（裴敏欣）認為：「在中國，市場的力量已經成為了社會角色不斷巧妙地影響政治過程和改變國家和社會之間平衡的一個主要途徑」（Pei, 1994, p. 150）。對於中國的傳媒產業而言，市場化的深遠影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媒體在體制上對國家的依賴性——這主要通過利益、行為以及導致大眾傳媒結構變化的商品化過程而得以實現（Lee, 2000; Gang & Bandurski, 2011）。市場化已經使中國的大眾傳媒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市場競爭以獲得生存和發展，而不是像先前那樣，通過其在整個傳媒系統中的層級位置以及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獲得生存和發展。¹ 為了回應媒體的市場化進程，中國的媒介知識勞工已經更為清晰地認識到市場的需要，通過各種合法的手段來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因此創造利潤成為了他們活動中非常重要的目標（陳麗菲，2007）。

編輯人員重新認識到具有較強市場開拓力的重要性，同時他們需要更多地對讀者負責。市場開拓力包括市場開拓的廣度和深度。就廣度而言，它包括市場覆蓋面、市場管道的開拓、飽和市場的切入、空白市場的佔領、潛在市場的發掘等，其中格外重要的是隨著媒體市場化的深入，編輯人員需要為讀者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資訊，包括：經濟新聞、體育新聞、社會新聞以及實用的日常資訊。此外，編輯需要不斷通過回饋和受眾參與來和讀者進行不斷的互動。在與一名編輯人員（受訪者 4）的深度訪談中，她這樣說道：

¹ 展開來說，中國的媒體已經進入了「內容為王」的時代。在市場經濟時代，決定媒體生存和發展的因素不再是行政力量，而是靠媒體的品質和內容說話。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版社不存在生存的壓力問題，也不存在相互競爭讀者市場的問題。計劃經濟時代的出版物可以不考慮讀者的需求，而只考慮宣傳任務和宣傳效果。但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時代那種靠行政命令搞出版發行的做法已行之無效。

現代編輯人員需要牢固樹立讀者導向的理念。以前對於書稿有無市場和讀者，我們不是很關心。但現在，通過市場調研來瞭解讀者的需求就變得異常重要。比如之前在確立選題、內容安排、版式設計等方面，我們很多情況下會從自己操作方便的角度來考慮，而現在一切需要從滿足讀者需求出發的角度來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具備快速、準確判斷書稿內容是否具有市場的能力，並通過對讀者反應的預判，不斷對書稿內容進行修改。

就深度而言，市場開拓力包括市場細分、對讀者的宣傳和開發，以及售前與售後服務等。為了更好地對圖書進行銷售，編輯人員需要不斷利用大眾傳媒（主要是互聯網）加強對圖書的宣傳活動，如新書發佈儀式、簽名售書、讀書活動。一方面，編輯人員對圖書進行宣傳是圖書宣傳的一種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往往自行編印一些宣傳品，如俱樂部會刊等，利用各種途徑贈送讀者，讓他們加深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的瞭解，引發和增強讀者的購買動機，從而將社會效益和讀者需求兩者更好地有機結合起來。這位編輯人員在訪談中補充道：

在出版社中，我們往往通過新書簡介、書評以及搜集市場回饋資訊更好地與讀者互動，增加圖書的銷量。具體來說，新書簡介主要介紹圖書的主要內容、特點、讀者物件和適用範圍；書評旨在通過更廣泛和深入的分析 and 評論，為讀者提供更多的資訊和閱讀指導；市場回饋資訊主要包括：圖書內容、文字、編校、裝幀品質、定價以及社會效益。在當前以市場為導向的媒體結構中，城市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是我們首要關注的——因為他們具有更強的購買能力。

總之，媒體市場化過程導致了資訊的多樣化，強調商業性和專業主義的利益訴求。因此，儘管共產黨對於大眾傳媒的控制不減，但這種控制正漸漸受到來自媒體市場化過程的挑戰——經濟的原則和市場的邏輯已經開始對決策產生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 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原則

儘管與市場化過程相伴隨的各種社會變遷，使大眾傳媒的作用和功能已經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但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內，大眾傳媒的地位仍十分特殊且敏感，因為它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工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於共產黨和國家增強合法性以及大眾的思想引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Chan, 2003）。因此，大眾傳媒根本的指導原則並沒有發生轉變——從原則上來說，大眾傳媒仍然是共產黨和政府重要的政治宣傳工具，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趙月枝看來，「宣傳模式」是分析中國傳媒產業的一個根本的結構框架（Zhao, 1998）。

在宣傳模式的分析框架內，內容審查成為了對中國出版產業管理的重要組成，分為**事先審查**和**事後審查**。**事先審查**，主要是指在言論出版、傳播之前實施控制，具體包括出版計畫備案制度、重大選題備案制度、責任編輯制度。**事後審查**是指在具體言論被出版並公開傳播之後，根據法律規定和出版物產生的不良影響，對作者或出版者實行處罰。在中國，後者是對出版物採用的主要審查制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出版物審讀制度，即：對含有違法內容的出版物依法追究其作者、出版者和傳播者的責任。

中國出版產業中的編輯人員需要無條件地遵循「共產黨領導」的原則。他們在工作中需要仔細地選擇「正確」的措辭——因為他們所處的體制因素直接影響著他們對於媒介內容的選擇，他們通常不會選擇出版與出版社指導原則相背離的題材，因為這將意味著被調離崗位或者解除合同（劉曉紅，2007）。比如，他們使用官方能夠接受的話語體系嘗試著對商業活動進行框架性的描述，然後將宣傳的分析植入到市場的邏輯中去。這個觀點在與出版社編輯人員（受訪者 7）的深度訪談中得到了進一步的佐證。

在出版社中，嚴格的規範要求編輯人員瞭解（共產）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密切關注國際國內的壞境變化及其發展趨勢，準確把握具有全域性、整體性和前瞻性的問題，從而培育自身的「專業意識」，這種意識既包括政治鑒別力，又包括政治敏銳性，這是編輯人員思想修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清楚地幫助我們辨析編輯工

作意識形態的邊界。這種「專業意識」同時也可以幫助編輯決定哪些問題和表達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良好的「專業意識」可以有效地將（共產）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體現在選題當中，並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結合，因此它是「職業成熟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媒介知識勞工選擇與政治經濟精英合謀，成為他們的支持者。而且，中國的媒介知識勞工成為了相對自律的群體，以應對審查及其與之相伴隨的共產黨的權力和制度化的控制（Pan, 2000；Pan & Lu, 2003）。雖然中國的傳媒系統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的速度與市場化進程呈正相關性——然而，在中國的傳媒產業中，堅持「共產黨領導」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需要重新關注「共產黨領導」的原則，因為共產黨依然領導並對大眾傳媒進行管理，同時規範著傳媒產業中的知識勞工及其行動。

（三）宣傳—商業模式中的持續張力

在媒體市場化的進程中，共產黨和國家通過行政手段指導大眾傳媒的發展過程。與此同時，市場需要創新，而這種創新的要求使共產黨和國家面臨著諸多的壓力，需要他們不斷對傳媒產業中的政策進行動態的調整。因此，中國的每次媒體改革都是共產黨和國家與市場之間互動的產物。

然而，在由共產黨領導的傳媒系統和中國現行的媒體市場化過程之間存在著一種結構性的矛盾。對媒介知識勞工而言，這種結構性的張力表現為對共產黨的忠誠和專業主義之間的博弈。Dong 與 Shi 認為，這種矛盾性帶來了許多變化，包括他們身份的變化、工作性質的變化、社會作用的變化以及對於工作評價和獎勵原則和標準的變化（Dong & Shi, 2007）。在這些變化中，最根本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媒介知識勞工面臨著創造利潤、推進媒體民主化以及促進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壓力。而不管是媒體民主化的推進還是政治和社會改革都需服從於整個國家的政治利益。這就構成了趙月枝所定義的「宣傳—商業模式」的內核，同時它也是中國媒介知識勞工工作和生存環境的根本特徵（Zhao, 1998, p. 151）。

在中國的出版產業中，大多數編輯人員已經充分意識到這種張力的存

在，這實實在在地表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而並非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層面。在與一位出版社編輯人員（受訪者 8）的深度訪談中，他提到：

出版產業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具有雙重功能的產業。一方面，與大多數的企業一樣，出版社必須創造利潤；另一方面，出版社是國家宣傳工具的一部分。因此，出版社作為企業，並不在工商部門的直接監督之下，而是在宣傳部門的直接控制之下。宣傳部門頒佈了許多「可以做的事情」和「不可以做的事情」用來規範我國的出版產業。

正因為出版社的這種雙重屬性，我們必須在既定的政治結構框架內不斷追求經濟利益。因此，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出版社開始越來越少地出版政治性讀物，如重要領導的講話，而越來越多地出版不具有政治性的讀物，如關於娛樂和公共服務的圖書。這種變化雖然是漸進的，但卻異常清晰。關於時尚、園藝、旅遊以及廚藝方面的圖書已經十分流行。然而，不管出版什麼樣的讀物，我們必須創造性地確保「政治正確性」。更為重要的是，出版社中大多數的編輯人員和領導以及政府官員為了打破「政治禁區」而需要創造性地發揮他們的「政治智慧」，而不是簡單地批判和顛覆官方的「意識形態」框架。

一言以蔽之，從中國的媒體市場化伊始，媒介知識勞工需要同時對共產黨和公眾的利益進行表達，兼顧黨內的精英、商業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的共同利益——這種協商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中國媒介知識勞工的角色，他們不斷陷入權威／社會責任、宣傳／服務大眾的兩難困境。

三、「單位制」的瓦解與出版社的轉制

在改革開放之前，出版社為每位編輯人員提供相對穩定的工資和較為良好的工作環境，以確保他們的基本生活。出版社為個人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

保障，包括：養老金、住房、醫療和學校等。與此同時，出版社也是宣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組織，以加強黨的領導（Naughton, 2007）。一旦進入某家出版社，編輯人員往往會在該出版社工作直至退休。因此，在「單位制」體系內，中國的出版社不僅僅是經濟組織，同時具有三個非常重要的非經濟功能，即：行政功能、政治功能以及社會福利功能。

然而，在「單位制」體系內，大多數的編輯人員並沒有對出版社表現出一種非常強烈的使命感，他們中的部分工作並不十分努力，而且生產效率相對低下。除此之外，他們既不受管理規範的約束，也不受管理程序的控制。舉例來說，在出版社中，缺勤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工作時間，編輯人員往往外出處理自己的個人事務。正因為如此，一種新的管理體系的應運而生就變得非常必要——在新的體系中，改變這種生產怠慢的態度和行為就成為了推動中國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單位制體系伴隨著一系列對社會雇傭關聯式結構的重塑而徹底瓦解。1986年，國務院通過引入勞動合同制度，重新規定了勞動關係。新的勞動合同鼓勵每個企業根據自己的經濟和利潤情況，雇傭或者解雇在職員工。換句話來說，企業被賦予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他們對人事和薪資具有決定權，而不像在先前的單位制體系中，單位只能被動接受由當地勞動局分配到單位中的每個員工（Whyte, 2010）。²

但在新的企業制度體系中，工人階級面臨著新的被邊緣化的威脅，因為工人的收入不斷減少，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企業辭退或者解雇，且不受國家的保護。在一些具體的案件中，當企業面臨破產的時候，企業全體員工的工作和生計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同樣，單位制體系的社會福利系統被國家福利系統替代，而在國家福利系統中，工人的獎金、補助和福利分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福利的大幅度縮減日趨明顯。舉例來說，在單位制體系中，工人的醫療花費全部由單位進行實報實銷，有些單位甚至負責家屬的醫療費用。然而，在新的體系中，即使是工人本人享受到的醫療福利也變得非常有限。

² 中國出版社的改革包括兩個具體的步驟，即「改企」和「轉制」：前者是指出版社由原來的事業單位身份轉變為「自負盈虧」的企業身份；後者是指出版社從「單一國有制」改為「股份制」。參與本論文深度和補充性訪談的編輯人員所在的出版社現均為股份制（有限）公司。

在中國的出版產業中，廢除單位制體系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出版社的社會和政治壓力，同時改善他們在市場中的經濟狀況。為員工和退休人員提供獎金、補助以及福利成為了許多出版社入不敷出的一個根本性原因。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時，出版社編輯人員所領取的獎金、補助和福利差不多和他們在出版社拿到的工資幾乎相當。為了更好地應對沉重的經濟負擔，許多出版社紛紛嘗試著減少員工的福利；要求編輯人員個人部分地支付自己的福利，比如繼續教育和培訓費用、醫療費用以及住房費用，而且支付比例越來越高；獎金、補助和福利分配的標準更以績效為標準，而不再以公平為第一要義。

對於編輯人員而言，這些變化是實質性的。在出版社從事業單位向企業轉制的過程中，他們的職業安全感變得越來越弱，社會福利保障大大減少。從這方面來說，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人」的優勢地位在許多方面發生了改變（Rocca, 2003）。因此，我們並不難理解為什麼大多數大學和專業院校的畢業生不會選擇編輯工作作為他們最為理想的職業，儘管編輯人員的社會地位依舊很高。此外，為了更好地應對職業安全感的消逝和社會福利保障的縮減，大量的編輯人員更傾向於去民營或者是跨國出版公司工作。因為與由國有出版社轉制而來的出版集團相比，大多數民營和跨國出版公司可以為編輯人員開出更高的工資，提供更為靈活的工作方式，即使這可能意味著更大的工作壓力。因此，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不管是民營出版公司還是跨國出版集團在中國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們在圖書出版市場的份額幾乎接近於整個圖書出版產業每年出版總量的 50%（崔保國，2010）。

四、知識勞工內部的分化

在單位制體系中，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分配資源的過程中出現的不平衡現象——這可能導致相同職業工人的利益出現分歧或矛盾。然而，因為所有的工人都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這些分歧或矛盾不具有本質的對抗性。但是，通過對在上海許多出版社進行的深度訪談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工人之間非對抗性的關係已經越來越受到來自於傳媒改革的挑戰，尤其是對出版社而言，當出版社從事業單位轉型為企業的時候，這種非對抗性的關

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在出版社中被區分對待，這導致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斷緊張。首先，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簽訂合同的年限不同。在上海的許多出版社中，通過與編輯人員的深度訪談發現，初級編輯一般都在工作的前三年每年簽訂勞動合同。直到第四年開始，才可能每三年一次簽訂合同。與此同時，高級編輯一開始就可以三年簽訂一次合同。在這以後，他們簽訂終身制合同。對高級編輯來說，合同更多的具有象徵性的意義，而並不對他們產生實際的作用——他們之所以需要簽訂勞動合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動法》的規定。

其二，在出版社中，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的工作難度和強度不一。從出版產業的市場化伊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高級編輯往往負責利潤比較豐厚或者市場比較成熟的圖書，如：編輯教科書。另一方面，在上海的許多出版社中，初級編輯往往主要負責專業性較強的圖書。對這些圖書而言，要預測有多少讀者會購買這類圖書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市場的不可預見性，利潤變得不可預期。在與一位出版社編輯人員的深度訪談中，他談論到：

在我們的出版社中，高級編輯主要負責編輯和出版會議手冊或者政府指南。他們不需要為這些出版物的銷售問題擔憂，因為這些出版物往往會事先被購買。初級編輯通常需要編輯與科學技術相關且非常專業的圖書。舉例來說，領導給我安排編輯一本關於糖尿病研究的當代科學發展圖書的任務。這些圖書的讀者群非常有限，因此出版這些圖書不可能帶來豐厚的利潤。我的同事中有專門負責「季節性」刊物的，比如說關於針織的圖書。他們往往面臨著固定的截止日期，因為在這個期限之前，這些圖書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從事「季節性」圖書出版的編輯往往需要在最後期限到來之前加班加點，有時一天需要工作 12 個小時，甚至通宵達旦。

其三，對於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的獎懲機制大相逕庭。就獎勵機制而言，高級編輯一般來說比較容易得到晉升。在中國的出版產業中，高級編輯

因為他們的年齡而並非他們的職業技能或者能力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因為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長者往往會得到更為廣泛的尊敬。就懲罰措施而言，高級編輯即使未能完成相應的利潤指標，只要他們工作態度端正，不影響領導對其他編輯人員的管理，基本上不會因為完成不了工作指標而影響自身的實際收入。相反，初級編輯為出版社所創造的利潤相對來說就會進行較為精確的計算，而他們收入的很大部分來自於其為出版社帶來的利潤。也就是說，如果初級編輯不能夠完成利潤指標，他們的總收入會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正因為這樣，初級編輯承受著更大的經濟和工作壓力，他們需要確保出版的圖書叫賣，因此他們對讀者的需求極其敏感。

事實上，在中國的出版產業中，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面臨著因媒體市場化而帶來的共同問題和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導致了編輯人員不斷被邊緣化。然而，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即使與初級編輯相比，高級編輯可能缺乏競爭力，但初級編輯的境遇更令人擔心——他們被迫簽訂時效性更短的合同、承擔更具挑戰性和壓力更大的工作，以及出版社內不公允的獎勵和懲罰措施。因此，雇傭關係廣義上的分化現象（fragmentation of employment）日益明顯，尤其是當這種不同和不公平出現在「曾經在相同工作環境中被雇傭的工作者」之間（Flecker et al., 2009, p. 32）。現在，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都持續地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壓力和不確定性（Krings, Nierling, Pedaci, & Mariangela, 2009）。然而，最為根本的是，在初級編輯中瀰漫著不滿意感，初級編輯和高級編輯之間不斷湧現的矛盾和摩擦導致了編輯人員之間緊張的關係，從而加劇了出版社知識勞工內部的分化，削弱了勞工聯合和勞工抗爭的階級基礎和可能性。

伍、結論

社會轉型是結構和能動性相互建構的過程。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的經濟改革伊始，中國出版產業的改革對每位編輯人員工作和生活的每個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對他們雇傭關係、工作環境、生活狀態、社會關係的影響。包括技術、政治、經濟以及最重要的階級關係和權力變化層面的根本社會變革使他們陷入困境。導致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來自新媒體技術發展、

如何在媒體市場化的進程中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原則、「單位制」的瓦解與出版社的轉制，以及知識勞工內部的不斷分化。在這樣的背景下，編輯人員被迫採取不同的方式來保障他們自身的權利，並竭力擺脫他們現在所處的種種困境。其中較為有效的一個方式就是內部協商。大多數大型出版社的編輯人員尤其是初級編輯在出版社中勞工組織的說明下，已經通過各種管道和領導之間建立了各種交流的途徑，為的是能夠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並且通過各種規定來對他們的工作時間和每個月的工作量進行限定。更為重要的是，在對中國的出版產業編輯人員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將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視為整個工人階級遇到的挑戰的一部分，並在分析的過程中，理解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勞工在當代中國轉型過程中所面對的共同的問題、風險、挑戰與前途，以及與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分析對於我們理解傳播產業和包括編輯人員在內的知識勞工所處的制度化權力結構之間廣泛的社會關係裨益良多。

參考書目

- 王晨（2009）。《中國出版業的產業競爭與政府規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 王維佳（2011）。《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新聞記者勞動狀況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朱西西、代長珍（2009）。〈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知識勞工〉，《中國經貿導刊》，24: 103-104。
- 陸學藝（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陳麗菲（主編）（2007）。《現代圖書編輯實務教程》。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 崔保國（主編）（2010）。《2010年中國媒體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子輝（2004）。〈在體制和技術上同步推行出版改革〉，《中國出版》，12: 37-39。
- 張望軍、彭劍峰（2001）。〈資訊時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趨勢〉，《中國人才》，8: 21-23。
- 黃孝章、張志林、陳丹（2011）。《數位化出版產業發展研究》。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 劉玉方（2001年12月36日）。〈淺談工人階級隊伍內部結構的變化〉，《工人日報》。（<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89831.htm>）
- 劉曉紅（2007）。《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Adams, Tracey and Sandy Welsh. (2008).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erience of work.*

- Toronto, Canada: Thomson and Nelson.
- Bell, D. (1999).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Berg, Bruce. (2007).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6th ed).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han, J. (2003).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media marke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ewspaper, TV and internet markets in China. In C.C. Lee (Eds.),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159-17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enzin, N., & Lincoln, Y. (2003).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pp. 1-4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onald, S., & Keane, M. (2002). Media in China: New convergences, new approaches. In S. Donald., M. Keane & Y. Hong (Eds.), *Media in China: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crisis* (pp. 3-1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ong, S.G.P., & Shi, A.B. (2007). Chinese news in transitio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 D. K. Thussu (Eds.),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pp. 182-197). London, UK: Routledge.
- Flecker, J., Holtgrewe, U., Schönauer, A., & Stavros, G.(2009).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company strategies to reach flexibility*. Leuven, Belgium: HIVA.
- Gang, Q., & Bandurski, D. (2011). China's emerging public sphere: The impact of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in an era of transition. In S. Shirk (Eds.),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pp. 38-7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rrison, B. (2000).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online information-gathering problem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3), 500-514.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 V.H. (2003).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labor rights and legal reform*.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 Hobsbawn, E. (1973).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ography. In R. Blackburn (Eds.),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pp. 265-283). New York, NY: Vintage.
- Kring, B-J., Nierling, L., Pedaci, M., & Mariangela, P. (2009). Working time, gender and work-life balance. Leuven, Belgium: HIVA.
- Lee, C. C. (2000).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K. (2007). *Working in China: 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Liu, C.D. (2006).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695-714.
- Mosco, V. (2006).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494-497.
- Mosco, V. (2008).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121-125.

-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2nd ed). London, UK: Sage.
- Mosco, V., & McKercher, C.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Naughton, B.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 Pan, Z.D. (2000).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C. C. Lee (Eds.),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68-111).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an, Z.D., & Lu, Y. (2003).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C. Lee (Eds.),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215-236). London, UK: Routledge.
- Pei, M.X. (1994).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cca, J.-L. (2003). Old working class, new working class: Reforms, labour crisis and the two faces of conflicts in Chinese urban areas. In T. Fisac & L. Fernandez-Stembridge (Eds.), *China today: Economic reforms, social cohes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pp. 77-104). London, UK: Routledge.
- Ross, A.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take, R. (2000). Case studies.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2nd ed) (pp. 435-45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llas, S., Finlay, W., & Wharton, A. (2009). *The sociology of work: Structures and inequaliti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M.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n, R.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4th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Zhao, Y.Z.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Zhao, Y.Z. (2001). 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 *The Public/Javnost*, 8(2), 21-44.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Jianhua Yao*

ABSTRACT

Contributing to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knowledge worker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four critical problems for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ese problem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es, and, most importantly, changes in class relations and power dynamics ar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related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problems of how to follow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in the media marketization process,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mashing of the work-unit system, and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knowledge workers. Moreover, by incorporating findings discovered in the case studies of two publishing house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wider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structure in which editors, and knowledge workers in general, are situated.

Keywords: knowledge workers, editors, publishing industry, media market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 Jianhua Yao receives his PhD.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He is current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He also serves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State Innovative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ociety at Fudan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Research Center at Fudan University. email: yaojianhua@fudan.edu.cn

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 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

馮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馮建三（2018）。〈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傳播、文化與政治》，8:103-139。

投稿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 初稿發表於「綠色小組與另類媒體運動—紀錄的政治與其當代意義」研討會，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主辦，台北市華山文化園區，2016 年 11 月 20 日。承蒙審查人的批評與建議，現稿已大幅度增刪與潤飾。

** 作者馮建三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

《摘要》

委內瑞拉在本世紀開啟新頁，宣稱「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是其奮鬥目標。十多年來，雖然距離該宣稱的達成仍有很遠距離，該國已經取得的若干成績仍應肯定，惟該國傳統、也是主流傳媒及海外菁英媒介輕則不予報導，更多則是就其必有的缺陷，放大乃至扭曲與醜化，遑論揭示委國奮進的國際意義。見此，委國政府結合烏拉圭…等拉美國家，先後成立「南方電視台」西班牙語及英語頻道，美、澳、英、德等多國的知識份子與社運人士也創設「分析委內瑞拉」英文網站，以報導、彙整並流通有別於主流新聞的委內瑞拉歷史與當代情境的知識與詮釋，提供了關注委國及世界進步志業前景的人，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及理解框架。

關鍵詞：「委內瑞拉分析」網站、「南方電視台」網站、另類傳播、委內瑞拉、新聞扭曲

壹、拉丁美洲政府與另類傳播

反移民、反對女性主義及其價值觀，懷疑「氣候變遷」說法而不熱衷再生能源政策的「另類德國黨」(AfD)在2013年崛起、並在2017年入秋於聯邦政府取得國會席次。¹不過，AfD的「另類」(alternative)概念，其內涵與本文無關，這裡所說的「另類」仍然承襲似已約定俗成的指涉，它是有別於主流，並且與基層及參與民主、環境保育、LGBT權益、勞動民主、經濟平等、社會民主有較多的親近連結。

從事另類新聞編採與評論的華人，從2009至2015年聯合出版三本文集，紀錄與檢視兩岸四地及馬來西亞華人多年來的另類、草根、社區，或者，遊擊式的傳播活動(林藹雲、葉蔭聰編，2009；葉蔭聰編，2011；管中祥編，2015)。其中，公權力(國家／政府)與這類傳媒的關係是些什麼並不是這些文字的主軸，因此僅有三位來自香港、澳門與台灣的作者，以略多於蜻蜓點水的篇幅，稍見提及。

比如，港府一度宣佈要讓「香港電台」，使其轉型為公共廣播機構，港人曾經就此發起「撐港台運動」，但除此之外，從事另類傳播活動的香港人，鮮少有人處理「傳播政策」議題。在台灣，情況有些不同，論者曾經意識到台灣的公共電視無法不由政府編列預算，但其新聞對公權力的批評並不少見，包括對另類觀點的呈現；另有創辦獨立媒體的人則說，渠所從事的傳播活動，約略可以算是得到「公部門的支持」、「拿國家經費進行『另類試驗』」(葉蔭聰，2009，頁49, 52, 54, 66；葉蔭聰，2011，頁65；葉蔭聰，2015，頁21；梁家權，2015，頁179；管中祥，2009，頁105-6；管中祥，2015，頁116, 125)。

前述三本文集之外，另有學者提醒，中國大陸政府固然嚴格限制其傳媒的政治表意尺度，惟大陸傳媒在報導某些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時候，不但不保守，並且往往「積極介入」而「正面報導」(趙鼎新，2017，頁281-309)；「另類媒介」在中土自然也是存在的，它們是「對主流媒介議題缺失與商業

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ernative_for_Germany

壟斷的有效補充」(曹晉, 2015, 頁 123); 邱林川(2013)特別重視新工人階級對新媒體網絡的建構與使用, 而民間社團與倡議人士同樣屢屢運用網路等媒體, 為弱勢人口發聲(Yin, 2018)。但大陸傳媒的這些表現, 與公權力的政策並無任何關係。

綜合前述扼要說明, 是要用來對比拉美情境。在華人社會, 從事另類傳播活動的人至今鮮少從正面的角度, 探討公權力媒體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還沒有將「傳播權」當作是如同教育、醫療健康...等等權利, 視為是政府必須要有所作為而給予滿足的權利項目。華人傾向於認定, 政府若是袖手旁觀、不去侵犯傳媒的編採自由與運作空間, 已屬可貴, 消極表意自由的取得與維繫, 似乎已經窮盡了華人社會對公權力與傳媒關係的想像。對於當前的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之華人, 固然如此。對於台灣的華人來說, 同樣走過這個歷史情境: 解嚴以前的台灣, 在公權力的指揮下, 主流影音傳媒漠視或扭曲異端活動, 因此有「綠色小組」在 1986 年誕生, 紀錄與流通遭致政府壓制的內容, 其成員並未想像公權力可以對其所從事傳播活動, 能有正面貢獻。(陳世宏, 2016)

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與華人的經驗, 呈現強烈對比。

一方面, 對公權力敬謝不敏的姿態, 一如華人社會, 同樣也是存在。在這方面, 最知名的是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的例子, 他們善用新傳播科技(Burbach, 2001), 從事「改變世界不奪權」(Holloway, 2002; Guillén, 2017)的抵抗運動, 這些原住民、農民及其社會運動舉世知名; 雖然, 墨西哥另有從事選舉並挑戰體制的左翼民族主義力量, 研究拉美政治的人指出, 他們原本有機會執政, 卻先後在 1998 與 2006 年, 兩度出於執政者選舉舞弊, 致使未能取得權位(Hayden 2015, p.124, 196)。

他方面, 拉美的另一種經驗可以說是迥異於 EZLN 的模式, 二者南轅北轍。這裡是指, 本世紀以來, 拉丁美洲同樣、甚至更為引人注目的另一個社會現象, 是以委內瑞拉為首(其次是玻利維亞與厄瓜多爾)的宣稱。2005 年以來, 他們先後出現重要的政治力量, 矢志要建設「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Burbach, Fox, & Fuente, 2013), 其中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打造國家, 推

進革命：社區與公共媒體的例子〉(Artz, 2012)。然而，依據美國「自由之家」的測量，以上三國的新聞自由得分在 2001 年是 40~44 分，僅屬於「局部自由」(台灣的 21 分則是「自由」)²，到了 2015 年，它們甚至退到了「不自由」的狀態(得分是 49~80 之間，台灣仍是「自由」的 26 分)³。

因此，假使「自由之家」的測量為真，拉美經驗就是華人經驗的悖論。在不自由、並且每況愈下的環境，委內瑞拉等國的社運份子依舊在召喚公權力，協助其社區與公共傳媒等另類傳播活動的推行；即便他們未必能夠如願，甚至遭其政府以社會主義之名，予以阻礙。

何以華人與拉美的經驗存在這個反差？是不是「自由之家」的測量未必正確，甚至可能因為帶有偏見而扭曲？這個論題值得探索，但這裡存而不論，本文的任務是添加重要的案例，補充下列陳述：

委內瑞拉在 1970-1980 年代已經有很多人努力，想要建立社區與另類媒體，但它們彼此並沒有聯繫，也沒有得到政府通過法案的方式給予支持...1984-1999 年間，委國政府核發了 300 個收音機電台執照及 50 個地方電視台執照。但這些新照有八成是私人持有，與後來人們稱為另類或社區的傳媒，創辦宗旨並不相同。到了查維茲 (Hugo Chavez) 於 1998 年當選總統後...過去十年的社區媒體可說業已不可同日而語，相較於 1980 年代這類媒體以秘密方式存在的光景，當前的這類委國傳媒面貌，已經得到明顯地改觀...既有立法架構的支持，又有基本權利的保障。電波民主化的進程至此已經出現質變...(Martens, Reina, & Vivares 2016, p.275)。

與前引陳述相互呼應，《粉紅浪潮：拉丁美洲的傳媒近用與政治權力》(Artz, 2017) 對委內瑞拉在本世紀的傳媒政策，也有相當高的評價；它說委內瑞拉扮演了前導的角色，領先在 1999 年的新憲法第 58 條肯認人們應當有

² <https://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P%202002%20Regional%20Score%20Tables.pdf>

³ https://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TOP_2016Report_Final_04232016.pdf

「自由與多元傳播」的權利。繼之，2000 年她再以新的傳媒法，率先在拉丁美洲創下傳媒三分的概念（「國有」、「私有」與「社區」媒體）。到了 2004 年，《收音機與電視社會責任法》設有「民主化與參與」專章，強化本國與社區影音的生產。聯合國表意自由報告專員魯氏（Frank La Rue）認為，這個制度設計在「拉美及世界，都是模範」；其後，再有阿根廷、烏拉圭、厄瓜多爾與玻利維亞，也都先後提出類似的新法。在拉美出現的這幅新世紀、新傳媒景觀，「在政府支持下，社區傳媒相當興盛…這類傳媒猶要勝於公共媒體…（可以呼應）草根活躍份子的要求，使其得以通過民主的方式，直接控制自己所經營的傳媒」，並且，這些作法正是聯合國人權宣言的落實，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80 年報告書《許多聲音 一個世界：邁向新而更為公正並且更有效率的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WICO）所提出的主張。（Ciccariello-Maher & Sapiezynska, 2017, pp. 50-51, 60）

不過，這些進展與專論較少得到資深傳播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李金銓編纂的《國際傳播》回顧並檢討拉美依附理論（Lee 2015a, pp.8-10; 2015b, p. 211），未曾就此著墨；又如，莫斯科（Mosco, 2009）甚至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第二版，刪除了第一版仍予強調的 NWICO 及有關拉美傳媒的討論（Mosco, 2009）。但拉美的經驗畢竟突出而難以見棄，表現在新世代的研究者的相關論述漸有積累（Fernandes, 2010, 2011; Martinez, Fox, & Farrell, 2010; Abalo, 2014; Cole, 2014; Guerrero & Márquez-Ramírez, 2014; Martens, Vivares, & McChesney 2014; Block, 2015; Hintz, 2016）。相較於英文的闡述，中文討論也有一些，但並非實地的調查，而是文獻的彙整與詮釋。（馮建三，2009，頁 14-15；馮建三，2014a；馮建三，2014b，頁 24-36；張志華 2013；張建中 2013）。

雖然列屬這些拉美另類傳播的論述之林，本文自有三個特點。首先，本文介紹的兩家媒體有其重要性，但傳播學術界的相關探討不足，「委內瑞拉分析」（venezuelanalysis.com, VA）除自述的文獻之外，似乎別無專論，有關「南方電視台」（TeleSurtv.net）的介紹大多聚焦在西語頻道及其網站，它的英語部門在 2015 年 7 月方始開辦，評介尚少。其次，前述兩個英語網站，特別是 VA 的原生及其轉載的報導與評論相當重要，若要在歐美主流傳媒散播的形象之外，另尋委內瑞拉的新聞及其詮釋，VA 是不能或缺的首要來源。

最後，TeleSur 的誕生，是委國倡議，他國政府響應；VA 是出身美國、英國、澳洲與德國等地的人，結合委國社運人士所創，其內容固然不排除服務委國人，但既然是以英文行世，其主要的功能，便是要讓關注委國情勢的海外人士，得以從中取得另類的材料與觀點。

貳、委內瑞拉：何以值得研究

委內瑞拉引起世人矚目的原因，與查維茲有關；或者，比較準確地定位，應該說這是委國草根群眾從 1950 年代以來的奮鬥成績（Velasco, 2015），是「我們創造了查維茲」的過程（Ciccariello-Maher, 2013）。查維茲在 1992 年發動政變，不遭唾棄，反成英雄，1994 年出獄，1998 年底當選總統，起初以「第三條路」知名，後漸激進，至 2005 年初宣佈其前進方向的旗幟，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一直到查維茲於 2013 年 3 月辭世至當年底，已有不少紀錄與解析（中文部分可以參考馮建三，2014b）。

2014 年初伊始，委國兩大傳統執政黨為主、計有 20 餘個政黨所成立的「民主團結聯盟」（Mesa de la Unidad Democrática, MUD）升高對峙。查維茲的繼承人，亦即「社會主義統合黨」（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黨魁與委國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承受挑戰。這是新的、更為猛烈的攻擊，從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入夏不到四年，委國相關事件已見若干英文維基百科的條目，單僅依照年次排列，就有四個。⁴除此之外，另有一個獨立的條目，鋪陳了該 2014 至 2018 年初的各類相關事件。⁵其中，若干條目也有相應的中文版本。⁶擁有員工 100 多人的全球情報公司 Stratfor（全名是戰略預測公司 Strategic Forecasting, Inc.），從 2015 年起也設置專頁網站，編纂更為即時的委國事件作為投資者的參考。⁷

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4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5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6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Venezuelan_protests

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2018_Venezuelan_protests

⁶ 比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4-2018年委內瑞拉示威>

⁷ <https://www.stratfor.com/topics/politics/venezuelas-challenges>（2016 年 8 月 31 日檢視）

但是，這些中英文材料雖然數量很多，其立場與觀點卻是流於單一，致使它們等於是在複製的過程，強化並且放大了委國反對派的說法與觀點。檢視「維基」條目所引述的 532 個來源，至少有 224 個取自反查派的西語傳媒，英語傳媒如 CNN…等等得到了 104 次引述；至於 TeleSur，僅出現兩次，VA 則未見援引。⁸

另類傳播得以出現的重要動力之一，肇因於主流傳媒報導不盡人意。本文的寫作同樣出於這個過程。在 2002 年委國政變而本地報紙大幅報導之前，作者對委內瑞拉完全陌生，其後，委國最大無線電視頻道執照在 2007 年屆滿但未得延長的新聞，再次讓人產生好奇與狐疑，遂在本地譯自英美傳媒的報導之外，另行積極尋找不同的來源，試圖比較準確地掌握與理解委內瑞拉的變化。

既有新的閱讀，前所未見的委內瑞拉地景，漸次浮現。除了另類傳播系統的成長，在歐美亞非等國都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中，本世紀的委內瑞拉一直到 2014 年底國際油價急速下跌之前，其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反而減緩，醫療保健、各級教育、居住條件與其他社會福利的改善，也有不俗的成績。委國傳統的男尊女卑秩序固然尚無翻轉，但男女平權的意識明顯提昇。普羅大眾因為生活境遇的改善，主體意識浮現並且日漸強化，以此作為基礎，基層組織與政府共構的「地方綜合體」建設雖然無法一帆風順，卻有群眾仍在

時，2016 年 8 月 29 日事件亦已記錄)。

⁸ 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16_Venezuelan_protests(2016/8/28 下載)這個條目為例，532 個引述，僅有兩則出自 TeleSur，VA 未見援引，委國最激進與草根的查派網路媒體 <http://www.aporrea.org> 也未見引用，雖然該網站經常批評官僚查派。反對查派的西文報紙或網站，該條目至少引述 224 次，包括 El Universal 有 101 次、2014 年 7 月 5 日被西班牙私募基金購買的 La Patilla 是 73 次、El Nacional 也有 33 次，而 TN24 是 17 次。可能支持查派的報紙 Ultimas Noticias 僅出現 12 次。英文的引述是 CNN(26)、路透社(22)、紐約時報(22)、衛報(14)、美聯社(10)與 BBC(10)合計 104 次，曾經與 TeleSur 合作但 2011 年因報導阿拉伯之春(sic)有不同意見的 Al Jazeera 則僅獲引用 4 次，蘇俄對外媒體 RT 獲得 2 次引用。該條目的維基中文版正文約 1.4 萬字，192 個引述有 103 處西文而 88 處英文，但沒有引述 VA、TeleSur 或 aporrea。造成引述「形式」偏倚的原因，或許有三。一是 VA 等是另類媒體，不受注意；其次是寫作維基的人，立場偏向反對派；三是寫作這個高度政治性條目的人，得有「美國民主基金會」等美國政府設置之基金會的支持。形式偏倚之外，另有實質偏倚，請見正文的討論。

挫折中奮鬥前進（馮建三，即將出版）。內政之外，委內瑞拉再以其豐富的石油蘊藏作為後盾，推動以加勒比海地區為主的跨國區域合作項目 ALBA（見後文），儼然成為強權外交與金權經貿之外，另一種值得肯定的國際關係。

這些努力取得了若干成績，雖然委國依賴石油的經濟模式沒有變化，致使環境遭受破壞的趨勢尚未扭轉（Salas, 2017）。然而，即便這些進展仍有嚴重缺陷，《傾聽委內瑞拉》（Listen to Venezuela）的作者之看法相當準確，他們認為委內瑞拉的「社會運動…在 1990 年代加速，結合了『老派』的政治…它是巨型的實驗，企圖促成取代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另類方案之出現。」（Wayne & O'neil, 2011, p.130）讓人扼腕的是，在歐美主流傳媒主導而台灣傳媒亦步亦趨之下，這個意義及其開拓的格局在扭曲之下，無法得到與世人公正見面的機會，從而對於世界走向的鼓舞與警惕，無從產生當有的作用。

這篇文章基於前述認知而作，將先行勾勒 2014 年初至 2017 年底的重要事件，以及台灣傳媒譯自外電所呈現的委國形象。其次，本文將要介紹與定位 TeleSur 與 VA 的性質。最後則是引述與整飭 TeleSur 而特別是 VA 的材料，提供有別於歐美及台灣主要傳媒所傳達的委內瑞拉事實與觀點。

參、後查維茲年代的委內瑞拉及其形象

查維茲在 2012 年 10 月第三度當選總統。當時，已經連續二次代表反對聯盟 MUD 參選的美麗達（Merida）省長卡普里萊斯（Henrique Capriles）很快接受結果並恭喜查維茲（Economist, 2012, October 13, pp.45-46）。這是罕見的紀錄，過去，MUD 在各次大選之前，無不指控選舉將有舞弊，選後則持續責怪選務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選民的決定。

查維茲在選後五個月辭世，總統改選在 2013 年 4 月登場，卡普里萊斯第三次代表 MUD 參選，仍然落敗。同年底地方選舉登場，MUD 再告失利，選票差距從 1% 增加至大約 10%。MUD 連番敗選，並且流失更多選票，但它不肯接受民意的仲裁，反而伺機升高對抗。2014 年初，委國一起兇殺案激發民憤，大學生當中出身相對優渥的群體示威，MUD 順勢介入並持續主導。從 2 至 5 月，他們在反對派控制的若干城市或城區，發動「颯凌霸」（Guarimba）

街頭暴力活動，常見手法包括在交通要道設置路障、投擲汽油彈、攻擊政府建築物、自製火砲攻擊執法人員…等等。該次衝突持續 3 個多月，造成 43 人身亡，支持及反對政府的人各佔了半數。但該國及海外新聞不談在野勢力必須要為死傷負起更大責任，反而顛倒是非，全面斥責政府殺人（Robertson, 2014, April 5; Ripley, 2017）。論者說，這次事件堪稱世界奇蹟：富人上街以暴力反對得到窮人支持的民選政府。對於這個荒謬的格局，智利學生聯盟發佈聲明譴責委國學生會（Main, 2014, February 24）。以捍衛「自由軟體運動與表意自由」知名的委內瑞拉人羅爾（Roa, 2014, May 22）則說，美國政府複誦委國反對派的說法，但實際上反對派的表意自由並沒有遭到限制，他並且質疑，任何人假使通過社群媒體為暴力行動煽風點火，「英美等任何國家會容許嗎？」

何以敗選的 MUD 未曾消沈，反而改採更為激烈的「武鬥」？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委內瑞拉從 1998 至 2013 年舉辦了 19 次選舉，其後要至 2015 年底才有大選（國會代表），MUD 不願意讓執政聯盟得到兩年平穩治國的時空。其次，溫和派普里萊斯雖然參選總統失利三次，但沒有失去支持，而 MUD 的激進派早就環伺在側，也蓄勢待發想要奪取聯盟的領導權，中產階級學生的街頭行動，正好提供了機會（Salas, 2015, p.213）。不過，亦有人提醒，領導權的競逐固然存在，但 MUD 的溫和與激烈路線的差異不宜誇大（Ellner, 2014）。

MUD 激進派在 2014 年的代言人是洛佩茲（Leopoldo López）與瑪麗亞·馬沙杜（María Corina Machado）。他們很快提出「下台」（the Exit, la Salida）作為運動的口號與訴求，雖然馬沙杜就任不到一年、未曾違法。

兩人不是政壇新手，事實上，他們與 2002 年 4 月反查派所發動、成功兩天而後崩盤的政變，淵源很深。曾經在政變期間出任一日總統的卡莫納（Pedro Carmona）事後出版《在歷史前作證》。他說，當時反政府的遊行隊伍突然改變方向，「授權的人就是首都加拉加斯查卡歐（Chacao）區長洛佩斯」（Laovato, 2015, July 27）。由於路線驟然改變，反對派人群在此導引下，很快就與力挺政府的群眾衝突，造成十九人死亡。馬沙杜則早在 2001 年成

立 *Súmate*，這是得到美國民主基金支持的反查派市民組織，她自己也簽署了⁹2002 年的政變勒令¹⁰，2004 年的罷免查維茲公投活動，她也是領導人之一。

到了 2014 年 5 月，委國執政黨與工商業界及 MUD 協商與談判之後，街頭動盪在該月底漸次平息。不過，這個時候反而是美國不肯罷手，其兩院外交委員通過草案要求白宮制裁委內瑞拉，而當年底總統歐巴馬（Barrack Obama）也簽署了執行命令（VA, 2014, May 28; BBC, 2014, May 29; Reuters, 2014, December 19）。過了半年多，國際石油價格開始大幅滑落（見表二），委國經濟情勢惡化，2015 年底 MUD 取得國會將近三分之二席次、2016 年 MUD 再次發動罷免公投、2017 年最高法院暫代國會職權引發系列動盪至 7 月底（Koerner, 2017；馮建三，2017a, 2017b）。如（表一）所述，從查維茲去世至 2018 年初，國際輿論頻繁報導委內瑞拉的物資供應短缺，甚至指其已經到了「人道危機」的地步（見後文）。

表一：根據中文傳媒標題，委內瑞拉經濟即將崩盤，2013.4-2018.1

2013.5.17	委內瑞拉全民瘋搶衛生紙 政府承諾進口 5 千萬卷 /中國日報
2013.6.12	委內瑞拉商品短缺嚴重 衛生紙白糖成稀罕物 /中國食品飲料網
2013.8.13	委內瑞拉物資短缺引發購物騷亂 造成一男子喪命 /環球網
2013.11.15	委國上百商人 哄抬物價遭逮 /大紀元
2014.2.13	委內瑞拉紙張缺乏進口受限多家報社被迫停刊 /中國證券報
2014.5.2	全球痛苦指數 委內瑞拉第一、台灣第 88 /中央社
2014.8.23	委內瑞拉 超市買麵包驗指紋 / 人間福報
2015.1.14	油價暴跌 委內瑞拉瀕臨崩潰 / 經濟日報
2015.2.27	石油換衛生紙 解委國物缺之苦？ /人間福報
2015.6.12	受不了齊頭式薪資 委內瑞拉爆大學教授出走潮 /風傳媒
2015.8.9	物價漲 6 成委內瑞拉搶糧大戰 /華視

⁹ 但她事後表示政變次日進入總統府，只是要探訪臨時總統卡莫納的夫人，她們是舊識故交。她又以為進入總統府本來就得在名簿上簽名，哪裡知道簽名等於是支持要廢除所有民主機構權利的勒令。不過，這個說法頗遭質疑，因為「政變陣營簽署勒令的儀式，早就通過幾乎是每個主要電視台與收音機電台，（重複）向全國放送，要說通通沒有看到或聽到，幾乎絕無可能。」（Jones 2007:352）

¹⁰ 2002 年 4 月 12 日，亦即政變次日起草完成，一般以據此勒令而擔任一日總統的卡莫納（Pedro Carmona）之名簡稱為 Carmona Decree，正式名稱是《民主轉型與國家團結法》（Acta de Constitución del Gobierno de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y Unidad Nacional）。

2015.10.20	委內瑞拉幣.狂貶..連搶匪都不要 /聯合報
2016.1.31	委內瑞拉經濟危殆 /工商時報
2016.3.16	委內瑞拉全國放假一周 減少高耗電對付電力危機 /星島日報
2016.5.5	委內瑞拉變賣 12%黃金儲備求現 /工商時報
2016.6.21	委內瑞拉軍人在麵包店站崗防搶 大學生垃圾堆中找飯吃 /ET新聞雲
2016.8.16	人道危機？ 委國 15 萬人越境買食 /世界日報
2016.9.18	委內瑞拉麵臨糧缺 5 歲女孩體重僅 5 公斤 /自由時報
2016.10.15	委內瑞拉監獄缺糧 3 囚犯疑被獄友殺來吃 /蘋果日報網
2016.11.9	委國經濟崩盤 總統下令民眾挺軍方配糧 /中央社
2016.12.20	委內瑞拉爆糧食危機 窮人只得送掉或棄養小孩 /風向新聞網
2017.1.3	800 萬人每日只吃一餐 委國飢民湧入巴西 /TVBS
2017.2.14	委內瑞拉強硬派副總統 遭美列為大毒梟 /中央廣播電台
2017.3.2	全球購買力排行：委內瑞拉人一天收入買不起早餐 /每日頭條
2017.3.28	動物園沒錢買食物了 大象只吃南瓜瘦成「大驢子」/ET Today新聞
2017.4.1	委內瑞拉「政變」 最高法院奪權取代國會*1 /自由時報
2017.4.7	委內瑞拉連 3 天示威衝突 首都形同癱瘓 /公視
2017.4.20	委內瑞拉發動「示威之母」：全國百萬人抗爭的攤牌時刻 /聯合新聞網轉角國際
2017.4.28	不滿施壓 委內瑞拉要退出美洲國家組織 /新華網
2017.5.2	面對反對聲浪，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宣佈重新制定憲法 /端傳媒
2017.5.7	反政府抗爭再起 委內瑞拉婦女上空抗議 /自由時報新聞網
2017.5.21	汽油彈滿天飛！委內瑞拉抗爭持續 50 天 20 萬人街頭示威 / ETtoday 新聞
2017.6.13	委內瑞拉抗議人士燒黑政府辦公樓外牆 /法廣 RFI
2017.6.28	委內瑞拉抗爭擴大 直升機攻擊最高法院 /公視
2017.7.9	出乎意外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獲准出獄 /蘋果日報
2017.7.21	委內瑞拉反對派發起 24 小時罷工 要求總統放棄修憲 /環球網
2017.7.31	委內瑞拉政府：制憲議會選舉投票率 41.5% /聯合報
2017.8.12	川普不排除軍事干預委內瑞拉危機 /中時
2017.8.18	委內瑞拉食品短缺 動物園動物被偷走果腹*2 /新華社
2017.8.26	美國宣佈對委內瑞拉施加新制裁 設 30 天緩衝期 /中新社
2017.9.26	委內瑞拉經濟重創民不聊生 民眾賣髮換現金*2 /民視
2017.10.12	委內瑞拉經濟萎靡 露宿者當街剝皮割貓食*2 /東(方報業)網
2017.10.16	委內瑞拉地方選舉馬杜洛陣營大勝 反對派拒絕接受 /香港電台
2017.11.18	逃離軟禁 遭罷黜委國首都市長將往歐洲 /中央廣播電台
2017.12.4	委內瑞拉執政黨副主席：資本主義是惡魔 /多維新聞網
2017.12.11	反對黨杯葛選舉 專家：奉送馬杜洛 /台灣醒報
2017.12.24	委內瑞拉釋善意 耶誕節前夕放反對人士 /中央社
2018.1.6	委內瑞拉政府下令部分商品降價 超市被民眾搶購一空*2 /新華網

*1 從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後的 4 個半月，民生物資短缺的新聞（以*2 予以標誌）大

量減少。

所有新聞在 2018 年 6 月 10 日點擊仍可讀到全文，本文電子檔均已加入超連結，點選即可連上原引述來源；若點擊而無法取得，可能是原傳媒網站已經取下該則新聞，假使遇有這個情況，請寄電郵給本文作者或本刊編輯 editor.2015ccp@gmail.com，當另以電郵寄請參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

表二：世界原油價格，1998-2017

年*	油價	年	油價	年	油價
1997	19.65	2005	60.57	2013	105.03
1998	13.34	2006	74.40	2014	98.17
1999	20.53	2007	78.21	2014.12.28	52.03
2000	27.43	2008	78.21	2015	47.12
2001	26.35	2009	69.45	2016	41.45
2002	27.02	2010	78.95	2017	46.02
2003	30.54	2011	95.70	2017.12.29	60.42
2004	43.80	2012	88.06		

* 若未註明，各年均以 7 月 16 日或最近該日的可得油價為準。

資料來源：<http://www.investing.com/commodities/crude-oil-historical-data>

〈表一〉顯示，外電指稱的委國物資短缺從 2013 年入春以來，即已開始。但〈表二〉顯示，油價的下跌趨勢，一直要到 2014 年底方見開始，對於依賴石油出口取得外匯的委內瑞拉，油價下跌的連動反應，就是進口物資的質量走低。反過來說，如果 2013 至 2014 年間 MUD 陣營因掌握經濟資源而發動的經濟戰規模沒有更大、假使馬杜洛政府的治國效能沒有大舉惡化，那麼這兩年油價仍然處於高峰期，不應該會有那麼多的物價短缺新聞，除非相關報導誇張不實。其次，2017 年 7 月的國際油價是 46 美元，猶低於 2014 年底的 52 美元，但從 2017 年 3 月底至 8 月中旬，外電卻已很少報導民生物資的匱乏。

何以出現這個變化？可能的理由之一是，2017 年 4 月起至 7 月底，又有規模比 2014 年「颯凌霸」更大的對抗與暴力系列事件，致使外電暫時捨棄了民生經濟新聞，轉而集中報導政治衝突。第二個理由是，先前的民不聊生

新聞言過其實，至少它們是片面而不是完整的報導，並且，該類型報導很有可能演變為外力（特別是美國）順勢干預的口實之一，無論這是做此報導之傳媒預期或未曾預期的後果。

無論是哪個理由，有待釐清的議題是，2013 年起至今（2018 年初）的委內瑞拉物資短缺，究竟到了那個程度、是哪些原因造成，委國政府的對策回應有沒有產生作用？（表一）已經鋪陳了主流傳媒的說法，下文因此傳達另類傳媒 TeleSur 以及 VA 所提供的資訊，從中判斷與評估何者可能更為接近實況。

肆、委內瑞拉政府領銜創造：TeleSur

「毫無疑問，社區傳媒很重要...但還不夠，我們還要大處著想...全球發言。」

——TeleSur 創台台長、烏拉圭記者阿瑞哈尼安(Aram Aharonian)

(Artz, 2006)

查維茲在 2004 年 12 月與古巴簽約。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導致「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平等程度，讓人駭異」，兩國因此率先成立「我們美洲人民的玻利瓦爾聯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ALBA)，更為重視公平貿易及區域的經濟整合，至今已有 11 個會員國，人口將近七千萬。¹¹ALBA 在 2005 年召開第一次高峰會議，推出 19 個合作領域，包括「大眾傳媒」項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創辦西班牙語的「南方新電視台」(La Nueva Televisora del Sur, TeleSur)，它已經在 2005 年 7 月 24 日開播(Harris & Azzi, 2006, p.4, 14)。

¹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A>，最後讀取 2018 年 6 月 13 日。

表三：ALBA 的 19 項合作領域

石油與能源	交通運輸與傳播	軍事	外債	經濟與財政
輕工業與基本工業	天然資源	土地、食物主權與土地改革	教育	大學
科學與技術發展	大眾媒介	健康醫療	性別	移民-身份認同
居住條件	人民主體與參與政治	原住民運動	工人運動	

資料來源：Harris 與 Azzi (2006, p.4)

關於 TeleSur 的資金構成，說法不一。西方傳媒當中，較早報導的《紐約時報》指其創台基金是 2500 萬美元，其中 70% 來自委內瑞拉，阿根廷與烏拉圭合起來佔了 30%，巴西與古巴僅提供技術協助 (Forero, 2005, May 16)。BBC 記者品特引用了這個說法 (Painter, 2008, p.48)。2006 年 2 月出版的澳洲刊物則訪問創台台長、烏拉圭人阿瑞哈尼安 (Aram Aharonian)，他所提供的資料是，出資國有四個，該電視台的節目有六成是新聞並且是原創，年度營運經費是一千萬美元。略晚於該篇的澳洲報導，作者美國教授的長篇文章所引述的四國出資比例是委內瑞拉 51%、阿根廷 20%、古巴 19%，以及烏拉圭的 10%，巴西仍為技術援助 (Artz, 2006)。若是依據 TeleSur 的維基條目，那麼，出資的構成是委國 54%、阿根廷 15%、古巴 14%、烏拉圭 7%、玻利維亞 5% 而尼加拉瓜 5%；阿根廷在 2016 年春夏之交退出後，出資國是六個國家，有厄瓜多爾而無阿根廷，但六國出資比例沒有述明。¹²

由於資金來自這些國家的政府，外界不免認為 TeleSur 的內容很有可能迎合當政者的需要。有見於此，該台必須宣稱自己擁有獨立自主的空間。是以，出身記者、已經擔任資訊與傳播部長將近一年的伊撒拉 (Andrés Izarra) 在 TeleSur 開播數日之後，辭去部長職位，專任 TeleSur 主席。TeleSur 試圖表明，這個新的電視機構可以匯通「國家」與「社運」兩個領域，雙方固然不免衝突，卻也擁有攜手共進的時刻，二者未必總是對立 (VA, 2005, July 27)。該台提高自身公信力的第二個作法是，邀請西方及拉美社會聲望良好的人士組成顧問團，成員包括阿根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斯基韋爾 (Adolfo Pérez Esquivel)、尼加拉瓜解放神學家兼詩人卡迪納爾 (Ernesto Cardenal)、作

¹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lesur_\(TV_channel\)](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lesur_(TV_channel))，最後讀取 2018 年 6 月 13 日。

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譯成 20 種語言的烏拉圭記者與作家加萊亞諾 (Eduardo Galeano)、英國《新左評論》編委阿里 (Tariq Ali)、美國紀錄片製作人及古巴支持者藍道 (Saul Landau)、法國世界報 (Le Monde) 海外版主編暨史學者拉莫內特 (Ignacio Ramonet)、阿根廷電影製片人鮑爾 (Tristán Bauer)、美國自由軟體先鋒史托曼 (Richard Stallman)¹³，以及美國演員暨社會活動家格洛弗 (Danny Glover)。¹⁴

2011 年夏季的報導指出，TeleSur 在北美與拉美 12 個都市，派有 26 位記者，是拉美最大型的通訊網絡 (Reardon, 2011, August 4)。至 2013 年初，張建中 (2013, 頁 78, 82) 引述的資料指 TeleSur 的記者人數已增加至 160 位。2014 年初的委國反對派暴力示威之後，總統馬杜洛等人對於要有英語頻道對外發聲的重要性，感受深刻，於是加快推動。到了 2015 年 7 月英語頻道開播當日，發自邁阿密的美國報導說，其英語總部設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 (Quito)，不是加拉加斯，當年在經常預算之外，另增經費 1760 萬美元，聘用 36 位英語人才產製多媒體內容並與社交網站合作；該報導又說 TeleSur 的記者達 800 人，惟這個數字太高，似乎不太可能，除非是包括不定期的自由撰稿人所供應的內容。編採記者人數的多寡有其意義，他們遵循的報導眼界與立足點也很重要，對此，TeleSur 的國際顧問、每週也在該頻道主持【阿里論世界】節目的阿里表示，假使有人說 TeleSur 是「拉丁美洲左派的喉舌，這是虛偽的說法」，因為：

「真實的情況是，全球各個企業財團的傳媒是市場體系的喉舌…… (但是) 沒有人指控美國的傳播網絡是官方宣傳體系的喉舌... TeleSur 的英語頻道有不同的哲學，並且有不同的世界觀... 我們不造假、不製作，我們不會刻意剪裁特定內容才讓紀錄片播放，但西方電視有時卻會幹出這些勾當。」 (Hussain, 2014, August 6)

¹³ 但他在 2011 年 2 月因不接受南方台報導利比亞戰爭的立場，辭去顧問職務，見前註。

¹⁴ 見前註。

伍、「外力介入」以示團結同心：VA

「絕大多數的國際英語傳媒持續迎合美國政府及跨國集團所設定的議程，扭曲、漠視並且捏造委內瑞拉的現實情況。Venezuelanalysis.com 與它們對比明顯，我們在委內瑞拉站定腳跟，就委內瑞拉遭遇的困頓與進展，提出他處所無的第一手新聞與分析，呈現深度與可靠的說明…這個網站的目標是要報導委內瑞拉的進展，持續提供新聞，同時要將新聞放在脈絡中，結合深度分析與背景資訊…要為活躍份子、學術工作者、記者。知識份子、不同國度的政策制訂者，以及一般大眾，提供服務。」¹⁵

「分析委內瑞拉」(Venezuelanalysis.com, VA) 在 2003 年 9 月創辦，它是網路原生媒體，「內容」如其自我期許，無論是自行編採與撰寫，或是轉述其他來源的報導與評論（包括長篇的學術論文），VA 完全專注在委內瑞拉。因此，相對於間歇、偶爾，但也在若干時刻大量再現委內瑞拉的英語主流傳媒（無論是相對守成的美國《福斯電視網》或英國《經濟學人》、《每日電訊》、《每日郵報》與《泰晤士報》等，或是自由派的《衛報》、《紐約時報》或 BBC），VA 呈現的委內瑞拉，其當前與歷史面貌，更為豐富、也相對深入，同時提供了與有別於主流傳媒的事實、解釋與立場。

一、VA 的創辦

VA 的主要創辦人維爾珀特 (Gregory Wilpert) 出生在美國，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墨西哥裔美國人。在德國完成高中學業後，他回返美國就讀大學。根據他自己的陳述，由於反對美國的拉美政策、也因為母親的背景，以及他個人對於革命的想像，維爾珀特較早就開始對拉丁美洲產生了興趣。完成社會學博士學位不久，他在紐約結識在美國讀書的委內瑞拉籍妻子，兩人結婚

¹⁵ 參見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donate/appeals/2010>;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bout>

後，雙雙在 2000 年聯袂回到（或說前往）委國。當時，維爾珀特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基金會的資助而在委國中央大學任教。最早的時候，由於查維茲出身軍旅，這就使得維爾珀特在內的很多歐美人士都對查維茲存有戒心，無法力挺（Wilpert, 2013, December 4）；即便拉丁美洲在殘暴軍人執政之外，另有一種值得稱道的進步軍人陣營（Gott, 2015, March 9），但查維茲是否屬於這個傳統，畢竟在其執政之初，很多人尚難斷定。

維爾珀特的轉變大約是在 2001 年底。入住委內瑞拉超過了一年，他親臨其境有了第一手考察與感受，逐漸發現查維茲並非故作姿態。當時，查維茲提出 49 種法律案，包括提高外商繳交委國政府的石油權益金及其分配方式，也包括土地、水利與漁業等等領域的改革。有了嶄新體會的維爾珀特認為，新的對抗正在委國進行。果然，到了 2002 年初，查維茲支持度一下子從前一年的 80% 急遽下降到了 30%，反對派憂懼他是威權統治者，要不就是社會主義者，或兩者都是（Coronil, 2011）。接著就是 4 月的政變，維爾珀特親身在委，眼見海外英語（及委國的私有）傳媒對於玻利瓦爾革命強打猛攻，完全與他親自經歷的直接見聞與認知全然不同。其後，維爾珀特「完完全全重新另有了聚焦」、有了新的看事的角度；先前曾經在薩爾瓦多從事多年群眾組織與團結工作的維爾珀特「下定決心要成為全職記者，專為另類傳媒報導委內瑞拉。」（Wilpert, 2013, December 4）政變兩週之內，維爾珀特接受了 40 次國際傳媒訪問，有了覺悟，他認為應該挺身「矯正錯誤的資訊」，不應該僅只是在大學授課。有了視角的變化，組織認知與理解的方式也就更為銳利，維爾珀特完成了第一本有關委內瑞拉轉型的政治社會學著作（Wilpert 2005）。

委國政變一年多之後的 2003 年 9 月，通過共同朋友的引介，維爾珀特與桑切斯（Martin Sanchez）等人聯手創辦了 VA，期待通過這個英文網媒「提供左翼社會運動的視野，俾便世人瞭解玻利瓦爾革命。」（Albert, 2013, March 5）桑切斯本人則在更早一些，亦即在政變之後的一個月，就已經先與同志催生了至今仍然是委國最重要的西班牙文的草根激進網站 aporrea.org。¹⁶

¹⁶ 在 2004 年接受外交官職位後，桑切斯已經離開 aporrea.org，取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orrea.org>，上網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二、VA 的媒體觀

維爾珀特自承，他與友人創辦的 VA 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它所秉持的新聞觀可以分作三點陳述 (Wilpert, 2013, December 4)。首先，客觀與平衡固然是新聞編採的重要原則，但西方多數傳媒在報導本世紀的委國事件時，很難說已經達到這些標準，重要原因是這些傳媒自以為沒有立場而只是中立。作為另類傳媒的 VA 坦承自己的立場，它的報導並不排斥、也會交待與其歧異或衝突的說法，但 VA 更為接近與傳達中下階層、被排除者，以及草根運動者的言談、經驗及願景。

其次，即便有其立場，VA 並不認為自己是特定黨派的傳聲筒，VA 堅持必須擁有自主的發言空間。「實存社會主義」或「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政權執政初期所堅持的專政，其正當性隨著過渡時期的消逝而褪色；他們的經驗顯示，傳媒即便認同社會主義，但如果沒有解釋何謂社會主義的空間，勢將使得社會主義淪為口號而其內涵空洞化，社會主義的宣稱甚至可能會變成特定黨派利益的遮羞布。

第三，公權力與傳媒結構的最佳關係，不是國家機器消極無為。委國政變當年，哈洛維出版《改變社會不奪權》(Holloway, 2002)，VA 創辦後曾就此提出批評 (Alam, 2005, April 15)。其後，維爾珀特似乎以第二本專書《攫取權力改變委內瑞拉》(Wilpert, 2007)，更為鮮明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過，必須注意的是，與其說哈洛維與維爾珀特的立場與認知徹底對立，不如說兩本書的考察背景有很大的差別。哈洛維筆下的墨西哥，其社會條件與歷史情境與維爾珀特專注的委內瑞拉，截然不同。再者，身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者」(open Marxists) 的重要闡述者，哈洛維在《改變社會不奪權》問世八年後，另有《鑽裂資本主義》的出版，此時他的立場似乎已經稍有和緩。現在，他認可了委內瑞拉與玻利維亞奪取國家機器作為改造工具的路線；他肯認這個路線的支持者不必然會是國家主義者，而是能夠同時從事雙重運動的人。這個路線力圖奪取國家機器並推動改造，卻也同時強調自下而上給予國家壓力的必要與重要。不過，我們還得注意的是，哈洛維依舊不忘提醒，重視卻又不忘強調自下而上不足以成事，多少讓人認為，這個路線的重點仍

是「自上而下」，是要讓社運從事者與統治者形成聯盟。哈洛維因此認為，雙重運動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卻終究不免是一種「由上啟動」的變革，「終會將運動推向對立的方向，逆流必然出現；即便立意良善，由上啟動注定要摧毀邁向自決的動能。」(Holloway, 2010, p. 208) 惟哈洛維這個立場招來批評，論者指他物化了權力 (Ciccariello-Maher, 2013)。

維爾珀特延伸自己的國家觀於傳媒規範。他認為，西方學界與傳媒對於委內瑞拉 2004 年底頒行、並於 2010 年修訂的《廣播電視社會責任法》(主要是延伸至數位媒體) 的抨擊，並不公平，畢竟該法與歐洲常見，出於社會民主理念的傳媒法制，並無違背 (Lendman, 2011, March 26)。當然，法律是一回事，執法者適用法律條文的表現是否合理，又是另一回事，維爾珀特是認為委國「政府有太大的裁量空間」，他主張，「裁定傳媒是否違反法規的權限，應該要由真正獨立的機構擁有比較合適。」

在政變之後，委國出現了更多「社區傳媒」，有如雨後春筍，政府給予認可；維爾珀特認為這是正確之舉。他更進而指出，不是僅給予執照，政府還應該對這些社區傳媒提供合理水平的營運經費或器材。維爾珀特雖然認為「公共媒體」的創設是正確之舉，但他不肯輕予名器。比如，新上任、頗有好名聲且出身資深記者的人在 2012 年 10 月大選後出任傳播部長，表示要推動新的公共傳媒系統，¹⁷但他說要觀其言察其行 (Carlson, 2013, March 3)。

最後，他又認為，公權力應該努力將所有傳媒民主化，包括有效規範各種私有傳媒。委國有些查派認為，反對派的極端傳媒如 Globovision 應予關閉，維爾珀特並不同意。他說，民主社會主義的「和平與選舉」路線，畢竟與武裝暴力革命不同，不能強制這類傳媒消失。他認為就事論事才是道理，比如，假使傳媒力挺法西斯、充斥種族主義或其他歧視言論的程度，構成了依法予以關閉的條件，就可關台；但若尚在法律寬容的範圍，即便是反對派的傳媒，政府也不能藉機生事，不能減少其運作空間。(Albert, 2013, March 5)

¹⁷ 指 Ernesto Villegas，他宣布要成立新系統的公共傳媒，也會讓社區傳媒扮演更大角色。但 2014 年 8 月他已卸任，後轉任首都特區政府首長至 2015 年 5 月，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nesto_Villegas

陸、沒有「人道危機」，有微弱之光：VA（與 TeleSur）的回應

查維茲在 2013 年 3 月辭世，次月總統改選登場而 MUD 敗選後，5 月開始出現委國物資短缺的新聞（參見〈表一〉）。2016 年 5 月以後的外電更見嚴峻，先是《紐約時報》說〈嬰兒瀕臨死亡，沒有醫療用品：崩潰中的委內瑞拉醫院〉（Casey, 2016, May 15）。繼之，《華盛頓郵報》先前已有社論呼籲「外力介入」，（Bolton 2016, April 14）現在再以黑白的圖說，指稱〈委內瑞拉在崩潰邊緣的景象讓人哀傷〉。（Miroff, 2016, May 25）接著，美國「傳統基金會」也加入行列，要求外界設法〈舒緩委內瑞拉的人道危機〉（Quintana, 2016, May 26）。對於委國否認人道危機，因此拒絕海外援助的立場，倫敦「國際特赦組織」的抨擊是〈委內瑞拉：頑固的政策加速了勢將帶來災難的人道危機〉（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 June 10）。

可能是觀察到了這個輿論氣氛，專研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社會與歷史的黑特藍教授，就在 2016 年 5 至 6 月以三週時間，走訪委國各地（Hetland, 2016, June 22）。他到都會也前往偏鄉，他與窮人長談也與富人交往，他接觸查派也懇談反對派。通過這些實地考察與親身體驗，黑特藍提出了後列看法。

首先，食品等物資短缺對於有錢人、中產與中低階層的影響並不相同；對於生產條件有別的不同地區之住民，也有差異。黑特藍教授說，「大多數與我交談的人都對取得藥品有些擔心，但也都說他們的家人仍然可以獲得…通常是通過遍布全國而有時是海外的家族網絡」。既然是大多數，也就意味著是有些人是有困難，因此就有掠奪新聞的出現。是有愈來愈多的家庭處於「長期飢餓」，但不能說出現了「大量飢饉」。基本物資是有短缺、通貨膨脹增加了民生困難；不過，「在加拉加斯，街道人群鑽動，地鐵繼續營運，免費公衛診所正常在運作」，「特別是在富裕地區的飯店餐廳，根本就是人滿為患」，這些也是事實。

黑特藍說，不僅是美國的前述的紐時...等等報刊，還有美國的公共電台（NPR）、《富比士》（Forbes）、《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傳媒（，都是）持續不斷地錯誤報導，也明顯地誇大了危機的嚴重程度」。誇大與偏頗除了造成

誤解，更麻煩的是它們可能另有政治效應，提供了正當性，讓海外而特別是在美國主張介入的人，「找到了理由。」何況，有些媒體還不只是提供扭曲的形象，它們都有自以為是的主張，如《華盛頓郵報》公然再三指稱委國是「失敗的國家」並呼籲「外力介入委內瑞拉」！

然而，黑特藍提醒這些逾越分寸的傳媒。他說，固然有不少委國人「不滿領導階層，也就對政府不再忠誠。」但是，不支持當權者的人「並沒有轉而力挺反對聯盟」；人們甚至會說反對派若是掌權，「就會搞來法西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委內瑞拉的國民知道，「三百萬老年人得到了最低薪資的老年年金。查維茲上台時，還不到三十萬，且僅有最低薪資的五分之一。所有學童在學校至少都有一次餐點可用，這也不是謊言…醫療保健縱使有百般問題，但所有人都納入了，街頭各個角落你都能找到人討論政治，對國際局勢侃侃而談…這是政治參與，不須隱藏。」

布魯斯是《愉港另類方案：直接民主進行中》的編譯者，他也是《真正的委內瑞拉：在二十一世紀創造社會主義》的作者（Bruce, 2004, 2008）。布魯斯後來加入「南方電視台」，他以委內瑞拉特派員的身份針對醫療的實況，連續撰寫了兩篇長文報導，提供了另一種敘述與觀點，該文數日之後另由 VA 轉載（Bruce, 2016, June 28; 2016, July 4）。

布魯斯前往兩家醫院訪問，第一家是佩塔雷（Petare）醫院（the Perez de Leon II Hospital），該院位於首都加拉加斯東邊，是暴力犯罪最嚴重的社區之一。布魯斯意識到「南方電視台」的身份可能會讓讀者以為，這些報導經過特別的安排，是一種樣板。為了減少這個理解方式，布魯斯說他的訪問換了多次時間，出面接待的人也就因為另有公務必須處理，以致臨時由他人接受他的訪談。他說，這家醫院與中國廠商簽訂契約，醫療器材與用品的供應與維修並無困難。醫院相當清爽，完全沒有傳媒渲染的血跡四處可見，也沒有病人無處棲身而只能四處橫躺的場面。有些年輕醫生說，這家醫院比起其他公立醫院，處境好很多（比如，十一張重症醫療病床，僅有三張有病患）。但他們也說，比起軍方或社會安全機構的醫院，這家首都的社區醫院之條件，又沒有那麼好。若是遇到醫療物資短缺，他們往往通過與其他醫院互通有無而舒緩。四間手術室，到訪時有兩間在開刀。該院護理長說，目前他們

一天平均有 16 次一般手術，10 至 12 次緊急手術，超過一天 24 次的預定目標。她說，真正的問題是免洗床單不夠，但醫院人員就從手術包附帶的 3 張床單節約若干，還算能夠維持。醫生估計，院方擁有 70-75% 的醫療用品與藥物，若能節省使用，大致還能滿足需求。

接著，布魯斯來到委國規模最大的婦科醫院（the Concepcion Palacios Maternity Hospital）。相較於先前那家醫院，這一家看來確實老舊，也有些敗壞。因此，六月初曾有年輕醫護人員走上街頭，抗議醫療用品不夠。有位管理人員，不太想要談政治，她在舉手投足與言談之間，透露了這位管理員並不支持查派。根據她所提供的証詞，過去五年來，建於 1950 年代的這家醫院的維修工作並不理想，因此該院的運作沒有那麼順暢。比如，她負責照管 60 張病床，但其中僅有 32 張能夠使用，不過她也同時強調，醫院對病人的照顧並沒有中斷；該院在 2016 年前四個月所接生的嬰兒，比 2015 年同期還多了兩成。假使僅比較 2016 年各個月份，則一月接生了一千人，但五月下降至七百人。然而，她也表示這可能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新生嬰兒只是轉移至其他醫院，而該院也沒有新生嬰兒因為欠缺藥品而夭折的例子。醫療品的供應不是大問題，接受訪問的醫護人員說，「我在本院工作已經有三年多，可以誠實地說，我們這裡從來沒有任何一人因為欠缺醫療用品而死亡。」雖然近年來的嬰兒死亡率略微增加，但原因不是在醫院內發生，是在懷孕前期。這個情況的出現，又可能是一般藥房的高血壓……等等慢性病藥品的供應並不足夠，致使孕婦無法即時取得也就無法穩定服用，於是就有較大可能發生流產。避孕藥短缺可能使得不想生子卻未預期懷孕的人數增加，從而使得嬰兒流產的人次上升。委內瑞拉的全國統計顯示，從 2007 年開始，嬰兒與孕婦死亡率都在增加，其中母親生產致死的問題比較明顯，受訪人記得這家醫院在 2011 與 2012 年僅有兩或三位母親生產致死，但 2013 年是六人，2014 與 2015 連續兩年幾乎都是六人的兩倍，雖然最後這兩年的比例仍然不及 1990 年代的一半。

糧食主權專家史亞佛尼及卡馬卡羅（Schiavoni & Camacaro, 2016, July 11; 另見 Felicien, Schiavoni, & Romero, 2018）鑽研委國食品與農業議題，她們通過「食品至上」（Foodfirst）組織的網站發表了專文，提供了比較細緻的分析。

該組織成立於 1975 年，專注草根社區及社運、累計已經出版 60 餘本書籍、完成上百個研究案。史亞佛尼是荷蘭海牙「社會研究國際機構」(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博士研究員，關注與研究委國糧食議題十多年；卡馬卡羅出身委內瑞拉，目前在紐約工作。兩位作者說，那麼多有關委內瑞拉的負面與誇張的報導，讓他們不禁懷疑，難道 2015 年「聯合國食物與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UNFAO) 仍然盛讚、幾乎已經根除飢餓的委內瑞拉，會是這付德行？並且，早就有不少當地的「另類傳媒」累計了相當多的報導，鋪陳該國從事於食物主權的實驗，也在改革農業及食品分配系統；這是積極鼓勵市民參與食品系統運作的國度。在不到一兩年之間，委內瑞拉真會從芳草變成蕭艾，陷入人道危機的地步嗎？

她們說，2013 年至他們撰寫該篇文字之時，委國物資如個人衛生用品(肥皂、衛生紙…等等)的欠缺，確實是從未斷絕的新聞。但是，假使仔細考察，就可發現實況是牛奶欠缺，但奶製品如優格…等等卻很豐富；咖啡這種基本品欠缺，但茶、熱巧克力與其他飲料非常豐沛。何以如此？常見的解釋有二。一是物價管制，政府將這些基本物資的價格定得太低，致使生產與分銷系統欠缺誘因提供。二是石油價格下跌太多，因此政府欠缺資金進口這些物資。但是，委國經濟學教授古席歐 (Pasqualina Curcio) 針對這個現象已有詳盡與深入的研究。古席歐指出，這些解釋並不全然可信。一是這些市面上大量減少的基本用品，其價格早從 2010 年就是嚴格管制，並且近來政府已經多次提高價格，按理分銷者的誘因已經強化，然而相關物品的供應並沒有相隨增加。第二，這些短缺現象在 2013 年春夏開始增強，但石油價格下降是 2014 年底以後的事情！古席歐又發現，食品短缺的強度與重要政治時刻 (如選舉到來之前)，是有關係。那麼短缺現象是人為刻意製造出來的嗎？相當可能。委國人並非不知情，他們知道委國最大的食品公司、控制 62% 委國人基本食品、也就是玉米粉供應的「保拉集團」(Polar) 的老闆，正是反對聯盟的重要且知名成員！

另外，委國的蔬菜水果與根莖作物大多可以自給自足，原因是這類產品大多數由小型與中型農家或公司所生產，而它們的分配網絡也比較不集中，

分散的銷售系統也就難以從單一中心予以操弄。因此這類作物在市面上到處可見，並沒有短缺的問題。既然部分食品沒有短缺，人們自然就會用以換取短缺的物資；比如，以木薯、馬鈴薯和大蕉交換玉米粉，麵食和其他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兩種食品的交流假使仍然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偏好，數量較少的物資之價格，也就跟隨高漲。

食品短缺所造成的衝擊是否嚴重，亦有其他指標可以具體衡量。以最近可以取得的統計為例，2015 年底的委國人均熱量消費是一天 3092 卡路里，比委國 2011 年的日均攝取量 3221 卡路里低些，但比起 UNFAO 所定一日 2720 卡路里的基本需求量，仍然較高。最後，兩位作者採取了反諷的口吻回應食品短缺的新聞：有人聲稱委國人因為沒有糧食，以致已經開始吃狗，他們說，委國人是在吃「熱狗」。本文審查意見之一也提及，墨西哥報紙 *La Jornada* 對於衛生用品缺乏的報導，「提出獨到的見解，以黑色幽默方式替委內瑞拉批評美國」。因為食品短缺而引發暴動是孤立的少數事件，並且僅發生在反對派控制的地方，若要藉此指控委國出現「人道危機」，委實太過牽強。

通過這些分析，史亞佛尼與卡馬卡羅提醒，人們很有必要「質疑這些傳媒的標題」。她們提醒，根據聯合國釐定的很多指標，委內瑞拉在本世紀取得了值得肯定的進步成績，包括貧窮與飢餓大量減少，那麼，何以這樣的國度遭致砲火四射？兩位作者說，「答案必有多種，也會相當複雜，並且，也將因為不同的觀點與解釋，致有差異」。她們希望讀者「尋求更多資訊，不要僅接受這些新聞報導的表象」。此外，不實言論可能具備潛在的政治作用，她們對此亦有相當的警惕：「為什麼傳媒刻意與極端扭曲至此？…繪聲繪影，把委國情勢說得很嚴重…（加上）反對派所控制的國會叫囂要罷免總統…美國也在表示要延長經濟制裁」。那麼，是否委國在野聯盟或暗或明地結合美國，試圖以「人道危機」的存在，作為口實，以便時機成熟或醞釀機會，就能完成 2014 年 2 月那場 MUD 的激進派所未能完成的「下台」訴求？畢竟，從 2014 年開始，美國就以委內瑞拉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將委國列入經濟「制裁」的對象。到了 2016 年 4 與 7 月，參議院與眾議院再次支持新議案，凍結與委國總統及其高階官員的資產（Mallett-Outtrim, 2016, July8）。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更在 2017 年 9 月升高對委國的「經濟制裁」。

一方面聲稱委國出現人道危機，卻又同時試圖壓縮其自行解決困局的空間，美國如果不是言行矛盾（Harris, 2017, December 29），就是想要弄假成真，讓委國物資困難演成人道危機。

BBC 雖然也是主流傳媒，卻有一篇報導，足以糾正極端醜化委內瑞拉的新聞。該文由 BBC 駐委內瑞拉特派員拔多（Daniel Pardo）撰述。發出該則報導時，他已經在委內瑞拉居住三年。據拔多的見聞，他認為有關委國是個飢荒之國，是個身家不安全而表意自由備受壓抑之說，根本就是一種「迷思」。拔多說，儘管是有不少人吃得不好，但「沒有普遍存在的飢荒這回事」，聯合國對飢荒的定義是營養不良超過 30%，致死率 10 萬人每天有 2 人，但委國近一年的營養不良比率，最悲觀的估計是 20-25%，100 萬人為此殞命者不到 1 人。然而，BBC 等主流傳媒刊登拔多這類說法的報導，數量可能不多，如果不是鳳毛麟角的話；同時，我們也得注意，拔多的報導刊登在 BBC 的西班牙文網站，¹⁸若非該文得到英文翻譯（Hasse, 2016, July 22）並且得到 VA 的轉載，知悉這個面向的人還會更少一些。

相較於 BBC 的拔多的見證，積極反查維茲派的《經濟學人》之報導，假使倒過來讀，似乎也是另一種証詞，能夠用來反駁人道危機的污名。該刊在 2016 年 9、10 月報導，指該國民眾平均一個月得花 35 小時排隊才能買到日常飲食所需。原本，這是負面新聞，但若逆向解釋，是否可以說明委國物資固然短缺，但平均每日排隊一個小時仍可取得，因此，怎麼會是人道危機？《經濟學人》又說，儘管存在這些困難，委國的物資配送效率，是有尚稱明顯的改進（Economist 2016, September 17: 56; 2016, October 1:44-45）。2017 年底，UNFAO 以及「拉美與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聯袂派遣專員前往委國考察，事後他們聯合發表聲明，指認食品短缺與分送遲延的現象，但同時明確表示這不是人道危機；他們說弄清楚短缺的原因，並要對付盜賣／囤積／腐敗與貨幣操弄…等等問題，才是重點，主流媒體以戲劇化方式，加重醜化短缺的現象，實屬「於事無補」。（Boothroyd Rojas, 2017, December 6）

反駁主流傳媒，表明沒有人道危機之外，刊登或轉載於 VA 的報導也有

¹⁸ <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36837574>

相當積極的態度，他們希望當前的委國會是「禍兮福所倚」的前奏。

因此，委內瑞拉政府在全國各地廣設「就地配置與生產委員會」(the Local Provisioning and Production Committees, CLAPs) 的措施，備受史亞佛尼以及卡馬卡羅的肯定。她們指出，這是草根組織與政府協作的新方式，在相當範圍內舒緩了基本物質的供輸壓力。CLAPs 成立之時(2016 年初)是以全民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為主，第一年達到 200 萬戶家庭，至 2018 年初全國有 3 萬個 CLAPs 分配點，每袋食品 12 至 15 公斤，以補貼價格出售，2018 年底預計可以配送至四分之三人口，也就是六百萬家庭。除了配送，半數 CLAPs 也直接涉入食品生產 (Felicien, Schiavoni, & Romero, 2018)。他們也看到有很多社會運動者都很努力，試圖化危機為轉機，追求「糧食主權」的落實。物資短缺意外地提供了新的刺激，委內瑞拉開始有了較多的有機農業、禁止基因改造食品、農園耕作產品的交流與展示愈來愈多，「人民面對面」也讓城鄉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觸與互動，愈來愈多的人「史無前例地投入於農業」，從中人們取得了更多的新鮮食材。

黑特藍教授也希望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他說委內瑞拉已經透露「希望的微光」，農產短缺促使更多人利用前庭後院植栽自家使用的蔬果，大家動手動腳、「種東種西」。社區生產與分配組織也更有效地動了起來，人們努力矯正官僚的腐敗。「具有批判力的查派」運動在委國更見活力，他們提出「非常多樣、獨特的想法」(Hetland, 2016, June 22)。委國必須走出依靠天然物資(石油等)的尋租經濟模式，這是委內瑞拉必須嚴正面對的根本大計 (Prieto & Lander, 2016, September 29)。醫療人員對於委國革命的進程也提出尖銳的批判，他們說，查派掌權十七年，號稱要邁向社會主義，卻仍然存在以「大量政府預算支付公職人員的私人醫療保險，這等於是補助私人醫院，」相當荒謬 (Bruce, 2016, July 4)。

皮爾森在 2008 年加入 VA，近日著有小說《蝴蝶監獄》，「引領讀者進入全球資本主義，接觸邊陲民眾的真實生活與夢想」(Pearson, 2015)。她說，「委內瑞拉的食物短缺、通貨膨脹與排隊購物已經三年，衝擊幾百萬地區綜合體運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但是，對於右派，他們敬謝不敏…甚至也對馬杜洛政府敬謝不敏，他們在這些艱辛處境下日趨強大，取得了更好的組織效能。」

她也說都會農園在這個背景下，有了明顯增長，五年前幾乎沒有人好好利用居家附近的綠地，如今單在她訪談者居住區的周遭，就有五百人！這些都是具體的活動，「沒有那麼抽象」。先前，這些組織大多「聚焦在文化事件或修橋補路…現在，很多地區都在努力，他們試著要生產自己需要的半數蔬果，另一半才向鄉村生產者採購。」(Pearson, 2016, July 4; 2016, October 27)

柒、結語：「謊言行走天下，真相還在繫鞋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軍事政權在拉丁美洲執政數十載，包括在 1973 年發生血腥政變，舉世第一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在智利遭致推翻。1989 年，委內瑞拉首都爆發拉美近代史最大的民變，十年後查維茲運勢奮進，出任委國總統，並在 2005 年宣揚該國努力以赴的方向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開啟也強化了拉美粉紅色浪潮的聲浪，反擊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意識領導及霸權。(Chodor, 2015)

查維茲在 2013 年去世，原已頻繁負面再現委內瑞拉情勢的海內外主流傳媒，進而不斷散播委國已有「人道危機」的新聞，並將罪責歸咎於社會主義路線。

不過，根據 VA 與 TeleSur 等另類傳媒所提供的分析，2014 年底石油價格大跌以來，委國的經濟是有困頓，但不是人道危機、成因不是委國推動社會主義路線，反而是其推進無力寡方，是四個互有關連的內外因素所造成。

一是，查維茲是民選產生，不是武裝革命政權，他所繼承的國家機器僅是上層的調整，無法大刀闊斧改變，窠臼如舊有的腐化貪污或失能，改善的幅度也就有限。二是支持查維茲的力量遲至 2008 年才整編為「社會主義統合黨」，來源不同的成員未必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陽奉陰違，惟其各個派別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及信守水平的高低，諒有差異，並且這個新的政黨會是偏向科層主導或是重視分權以讓基層有較大的培力經驗，很可能因為組織新立而有更大的摩擦。三是查維茲無法也不肯以暴力手段沒入生產工具，委國經濟遂有仍有八、九成仍是私有產業構成，其中不乏拒斥查維茲路線的工商行號伺機與政治反對者共鳴而發為傳媒戰爭、經濟戰爭，查維茲即便推動拉美「最

稱野心勃勃的土地與農業改革」，也在地主抗拒下成效有限，致使「農民倍感挫折」，(Wilpert, 2006) 地主甚至僱人殺戮農民，累計已達兩百多人。(Hetland, 2016, September 11) 最後是委國的傳統菁英外有美國撐腰。華府對於拉美左傾政權並不友善，1954 年瓜地馬拉政府因土地改革遭到顛覆，其後的智利、海地 (2004) 與宏都拉斯 (2009)，都是美國改變他國政權的往例，查維茲曾在 2002 年挺過美國默許的政變，繼任已逾五載的馬杜洛能否坐滿任期，變數之一就在美國因素：美利堅改變政權的戰略數十年如常，先祭經濟制裁、大力支持反對派，想方設法讓政權不穩定、人民怨懟、社會混亂以便正當化軍事政變或美國的軍事介入。(Leech, 2018)

就此來說，紐約出生而從 1977 年起任教委內瑞拉，傳授經濟史與政治學的耶拿教授，評價顯得中肯：「委內瑞拉站在前鋒位置，試圖在尖銳兩極化及衝突的脈絡中，以民主手段建構社會主義，歷經相當長的時間，幾乎已有十八年，這段歷史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再無匹配。」(Ellner & Koerner, 2016, October 17) 分析查維茲何以能在委國崛起的最佳著作《委內瑞拉政治改革的失靈》(Buxton, 2001)，其作者英國教授巴塞頓在十五年後，對於查維茲本世紀開啟的委國經驗，選擇凸顯委國底層人民的主體自覺與能力已在強化，這是「歷史第一次。大眾階級如今更為意識到他們的權利及他們的潛在力量，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現象。人們不再認為這些權利是奇里斯馬的領袖自上而下所賦予……。」(Buxton, 2016, p.25)

本文所介紹與闡述的 VA 及 TeleSur 之報導與觀點，以及耶拿與巴塞頓教授的證詞及其認知框架，無緣進入主流傳媒；〈表一〉列舉的「新聞」標題及其英語版本的內容，卻是傳遍了世界。兩相對照，便是「謊言行走天下過半，真相繫著鞋帶未發」這句諺語的生動註腳。

參考書目

- 林藹雲、葉蔭聰 (2011)。〈香港篇：情感動員的新一頁〉，葉蔭聰 (編)，《草根起義：從虛擬到真實》，頁 57-93。香港：上書局。
- 林藹雲、葉蔭聰 (編) (2009)。《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

- 香港：獨立媒體。
- 邱林川（2013）。《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志華（2013）。〈拉美南方電視：別樣的國際傳播〉，《新聞大學》，119: 48-53
- 張建中（2013）。〈拉美的聲音：從戰略傳播視角看南方電視台的崛起〉，《中國電視》，1: 78-82。
- 曹晉（2015）。《媒介與社會性別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梁家權（2015）〈香港:政治高壓,百變叢生〉,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頁 155-18。台北：紅桌文化。
- 陳世宏（2016）。《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遠景。
- 馮建三（2009）。〈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另類媒介：以南韓與委內瑞拉為例〉，《國際新聞界》，25: 11-15。
- 馮建三（2014a）。〈政府涉入型對外衛星電視與 NWICO〉，《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78: 160-167。
- 馮建三（2014b）。〈傳播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委內瑞拉承先啟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7: 1-62。
- 馮建三（2017a）。〈制憲會議是契機：還未絕望，委內瑞拉或許真會「變天」〉。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627873
- 馮建三（2017b）。〈「人權觀察組織」對委內瑞拉的認知誤導〉。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643726
- 馮建三（即將出版）。〈謎、冤屈與進步：委內瑞拉，兼談《經濟學人》〉，《思想》。
- 葉蔭聰（2009）〈香港篇:新政治力量〉,林藹雲、葉蔭聰(編),《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頁 47-68。香港：獨立媒體。
- 葉蔭聰（2015）〈序二：媒體就是社會與政治〉,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頁 20-23。台北：紅桌文化。
- 葉蔭聰（編）（2011）。《草根起義：從虛擬到真實》。香港：上書局。
- 管中祥（2009）〈台灣篇:從地下冒起的抗衡力〉,林藹雲、葉蔭聰(編),《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頁 95-116。香港：獨立媒體。
- 管中祥（2015）〈台灣：百花齊放,暗藏危機〉,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頁 99-131。台北：紅桌文化。
- 管中祥（編）（2015）。《光影游擊最前線》。台北：紅桌文化。
- 趙鼎新（2017）。《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Abalo, E. (2014). Constructing (II) legitimate democracy: Populism and power concentration in newspaper discourse on Venezuela.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2(2), 802-821.
- Alam, M. J. (2005, April 15). Taking Power Seriously: John Holloway and the Venezuelan Strategy.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69>

- Albert, M. (2013, March 5). Tackling Institutions One By One: An Interview With Gregory Wilpert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zcomm.org/znetarticle/tackling-institutions-one-by-one-by-gregory-wilpert/>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 June 10) Venezuela: Stubborn politics accelerate catastrophic humanitarian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6/06/venezuela-stubborn-politics-accelerate-catastrophic-humanitarian-crisis/>
- Artz, L. (2006). TeleSur (television of the south): Discarding contraflow for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2(2), 225-231.
- Artz, L. (2012). 21st century socialism: Making a state for revolutio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2), 537-554.(馮建三譯[2016]。〈21世紀社會主義：打造國家 推進革命〉，傳播譯站工作坊(譯校)，《馬克思歸來》，頁 754-786。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Artz, L.(Ed.).(2017).*The pink tide: Media acce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in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BBC (2014, May 29).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proves Venezuela sanctions.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27615148>
- Block, Elena. (201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Mimeticism, Hugo Chávez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ident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olton, P. (2016, April 14). The Washington Post reaches new low in calls for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coha.org/the-washington-post-reaches-new-low-in-calls-for-political-intervention-in-venezuela/>
- Boothroyd Rojas, R. (2017, December 6) UN expert: No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13533>
- Bruce, I.(2004/translated and edited).*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 London, UK: Pluto
- Bruce, I.(2008). *The real Venezuela: Making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UK: Pluto.
- Bruce,I.(2016, June 28). Venezuela's hospitals: "Problems are opportuniti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Are-More-Babies-Dying-in-Venezuela-20160704-0022.html>
- Bruce,I. (2016, July 4) Are More Babies Dying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Are-More-Babies-Dying-in-Venezuela-20160704-0022.html>
- Burbach, R. (2001).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From zapatistas to high-tech robber barons*. London, UK: Pluto Press.
- Burbach, R., Fox, M., & Fuente, F. (2013). *Latin America's turbulent transitions: The futur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London, UK: Zed Books.
- Buxton, J.(2001).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Venezuela*. Ashgate Publishing.
- Buxton, J.(2016). Venezuela after Chávez. *New Left Review*, 99(May-June), 5-25.
- Carlson, C. (2013, March 3) Venezuela launches new integrated media system.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8007>

- Casey, I. (2016, May15). Dying Infants and No Medicine: Inside Venezuela's Failing Hospital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www.nytimes.com/2016/05/16/world/americas/dying-infants-and-no-medicine-inside-venezuelas-failing-hospitals.html
- Chodor, T. (2015).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pink tide in Latin America breaking up with T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iccariello-Maher, G., & Sapiezynska, E. (2017). Venezuela: freedom of expression, public access,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Artz, L.(Ed.).(2017).*The pink tide: Media acce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in America*(pp.49-62).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Ciccariello-Maher, G.(2013). *We create Chavez*.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M. (2014).The alternative school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al development, Barrio Pueblo Nuevo, Mérida, Venezuela. *Constructing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97-11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Coronil, F.(2011).Venezuela's wounded Bodies: Nation and imagination during the 2002 coup.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44(1), 33-39.
- Economist (2012, October 13) 'Stuck with him; Venezuel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p.45-46.
- Economist (2016, September 17) 'Multinationals in Venezuela, stay or go', p.56.
- Economist (2016, October 1) 'Venezuela: the angry 80%', pp.44-45.
- Ellner, S. (2014, June 18). Protest and destabilization in Venezuel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right is smaller than you may think.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752>
- Ellner, S., & Koerner, L. (2016, October 17) Part II: Is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a Populist Failur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2723>
- Felicien, A., Schiavoni, C., & Romero, L. (2018).The politics of food in Venezuela. *Monthly Review*, June, 1-15.
- Fernandes,S. (2010). *Barrio-based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Who can stop the drums?: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 Chávez's Venezuela* (pp.160-21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ernandes,S. (2011). Radio Bemba in an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The dynamic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in Chavez's Venezuela. In D. Smilde & D. Hellinger (Eds.), *Venezuela's Bolivarian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under Chávez* (pp. 131-15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orero, J. (2005, May 16). And now, the news in Latin America's view. *The New York Times*.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5/05/16/world/americas/and-now-the-news-in-latin-americas-view.html?_r=1
- Gott, R. (2015, March 9).Hugo Chavez and leftist soldiers in 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opinion/Hugo-Chavez-and-Leftist-Soldiers-in-20th-Century-Latin-America-20150305-0001.html>
- Gurrero, M., & Márquez-Ramírez, M. (2014). *Media systems and communication policies*

-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uillén, D. (2017). Societies in movement vs. institutional continuities? Insights from the Zapatista experie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4 (4), 114-138.
- Harris, D., & Azzi, D. (2006). *ALBA - Venezuela's answer to "free trade":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Occasional Paper No. 3). Bangkok, Thailand: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focusweb.org/pdf/alba-book.pdf>
- Harris, R. (2017, December 29). Lamenting Venezuela's "Humanitarian Crisis" While Blocking Its Resolu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7/12/29/lamenting-venezuelas-humanitarian-crisis-while-blocking-its-resolution/>
- Hasse, J. (2016, July 22). Debunking myths about 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benzinga.com/news/16/07/8248756/debunking-myths-about-the-crisis-in-venezuela-an-insiders-perspective>
- Hayden, T. (2015). *Listen Yankee: Why Cuba matters*. New York, NY: Seven Stories Press. (馮建三譯[2016]。《聽好了，古巴很重要》。台北：聯經)
- Hetland, G.(2016, June 22). How severe Is Venezuela's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severe-is-venezuelas-crisis/>
- Hetland, G. (2016, September 11). A history of violenc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9/venezuela-opposition-maduro-chavez-coup-protests/>
- Hintz, A. (2016). Policy hacking: Citizen-based policymaking and media reform.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W.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pp. 223-238).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Holloway, J. (2002).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UK: Pluto Press.
- Holloway, J.(2010).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UK: Pluto.
- Hussain, S. (2014, August 6) Tariq Ali on the launch of TeleSur English, the largest Latin American news channel.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1680-tariq-ali-on-the-launch-of-TeleSur-english-the-largest-latin-american-news-channel>
- Jones, B. (2007). *Hugo!: The Hugo Chavez story from mud hut to perpetual revolution*. Hanover, NH: Steerforth Press.
- Koerner, L. (2017) Authoritarianism in Venezuela? A Reply to Gabriel Hetland, May 19.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3136>
- Laovato, R. (2015, July 27). The making of Leopoldo López. *Foreign Policy*.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7/27/the-making-of-leopoldo-lopez-democratic-venezuela-opposition/>
- Lee, C.C.(2015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1-28).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C.(2015b).Local experiences, cosmopolitan theories: On cultural relevance i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210-224).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arry (2018, November 23) Business as usual: Washington's regime change strategy in Venezuela.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8/11/23/business-as-usual-washingtons-regime-change-strategy-in-venezuela/>
- Lendman, S.(2011, March 26) Venezuela's new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 from <http://mwcnews.net/focus/politics/9534-venezuelas-new-social-responsibility-law.html>
- Main, A. (2014, February 24). True colors of Venezuelan student movement apparent in Feb. 22nd releas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cepr.net/blogs/the-americas-blog/true-colors-of-venezuelan-student-movement-apparent-in-feb-22nd-releases>.
- Mallett-Outtrim, R. (2016, July8). US congress passes new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venezuelanalysis.com/news/12074>
- Martens, C., Reina, O., & Vivares, E. (2016). Legislating for a more participatory media system: Reform strategies in South America.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W.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68-280).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Martens, C., Vivares, E., & McChesney, R. W. (Eds.). (2014).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power in South America*.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artinez, C., Michael F., & Farrell, J. (2010). *Venezuela speaks!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Oakland, CA: PM Press.
- Miroff, Nick (2016, May 25) Harrowing scenes of Venezuela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sight/wp/2016/05/25/venezuela-is-running-on-empty/>
- Mosco, V.(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2nd). LA: Sage.
- Painter, J. (2008). *Counter-hegemonic news: A case study of Al-Jazeera English and TeleSur*.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Pearson, T.(2015). *The butterfly prison*. Open Books.
- Pearson, T.(2016, October 27)Venezuela's communes form the front line of a Difficul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venezuela%E2%80%99s-communes-form-front-line-difficult-revolutionary-struggle>
- Pearson, T.(2016, July 4) In Venezuela's difficult times the grassroots are stronger.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newint.org/features/web-exclusive/2016/07/04/in-venezuelas-difficult-times-the-grassroots-are-stronger/>
- Prieto, H., & Lander, E. (2016, September 29). Edgardo Lander: Venezuela must face its civilizational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2702>
- Quintana, A.R. (2016, May 26). Allevi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 *Issue Brief*, No. 4569. Retrieved 2018, June 17,

- from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6/05/alleviating-the-humanitarian-crisis-in-venezuela>
- Reardon, J. (2011, August 4). Latin America's TeleSur now available to U.S. viewer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6405>
- Reuters (2014, December 19) Obama signs U.S. sanctions law on Venezuela official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venezuela-sanctions/obama-signs-u-s-sanctions-law-on-venezuela-officials-idUSKBN0JW2JF20141218>
- Ripley, C.(2017) Venezuela, violence, and the New York Times:failing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ve indigna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coha.org/venezuela-violence-and-the-new-york-times-failing-when-it-comes-to-selective-indignation/>
- Roa, L. B. (2014, May 22) *John Kerry, the interne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Venezuela*. (Z.C.Dutka 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譯為英文，取自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697>，〈共誌〉四日後譯為中文〈美國國務卿、網路，與委內瑞拉的表意自由〉，取自 <http://commagazine.twmedia.org/?p=2027>)
- Robertson, E. (2014, April 5). Where is Venezuela's political violence coming from? A complete list of fatalities from the disturbanc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580>
- Salas, M. T. (2015). *Venezuel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las, M. T. (2017). Venezuela: La Mancha del Petróleo.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49(4): 416-420)
- Schiavoni, C., & Camacar, W. (2016, July 11). *Special report: Hunger in Venezuela? A look beyond the spin*. From <https://foodfirst.org/special-report-hunger-in-venezuela-a-look-beyond-the-spin/>)
- VA (Venezuelanalysis.com). (2005, July 27). Venezuela's information minister resigns in favor of TeleSur post.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1261>
- VA (Venezuelanalysis.com). (2014, May 28)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gnores Latin American consensus, passes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4QM>
- Velasco, A.(2015). *Barrio rising: Urb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Venezue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yne, M., & O'neill, D. (2011). Form, politics, an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take,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and listen to Venezuela. In J. Kapur, & K. B. Wanger (Eds.),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cinema: capital, culture, and Marxist critique* (pp. 113-13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ilpert, G. (2005). *The rise and fall of Hugo Chavez: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Venezuela*. London, UK: Zed Books.
- Wilpert, G. (2006) 'Land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in Venezuela', pp.249-264, in *Promised land :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edited by Peter Rosset, Raj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Food First Books, Oakland, California.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Wilpert, G.(2007).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The history and policies of the Chavez government*. London, UK: Verso.

Wilpert, G.(2013, December 4) Venezuelanalysis: 10 years reporting on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215>

Yin, S.(2018). Alternative forms of media, ICTs, and underprivileged groups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8754653>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Venezuela’s English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main stream journalism

Chiensan Feng*

ABSTRACT

By proclaiming “the Twenty-First-Century Socialism” as the framework guiding the nation, Venezuela has launched herself into a new ag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more, Venezuela has yet developed into a socialist construct, far from it, nonetheless there are commendable achievement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Rather than delivering a fair presentation of Venezuela’s ‘socialist’ government, her traditional and therefore still dominant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have at best neglected Venezuela’s positive improvement over the years, they normally portray her drawbacks at an expanded scale to reach a distorted and scandalized picture of this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sponding to these unjust treatments of the country, the Venezuela’s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and launches the Spanish trans-border TeleSur TV channel with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ollowed later by an English version, while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have on their own set up ‘Venezuelanalysis.com’ as another alternative English outlet reporting, compiling and circulating recent Venezuela’s news and academic writings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with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s such they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sources that people must consult, should they wish to be informed about or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Venezuela.

Keywords: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news distortion, TeleSur, Venezuela,
Venezuelanalysis.com

* Chiensan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jsfeng@ncc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社會運動與新認同： 社群媒介與創意社群之分析

許傳陽*

本文引用格式

許傳陽(2018)。〈社會運動與新認同：社群媒介與創意社群之分析〉，《傳播、文化與政治》，8:141-164。

投稿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通過日期：2017 年 10 月 25 日。

*作者許傳陽為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e-mail: 093663@mail.tku.edu.tw。

《摘要》

社群媒介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動員的工具，它被使用於不同目的的社會運動，電腦網路的網站可能被用來刊登社運團體的宣示，而臉書的粉絲專業可以被使用來與支持者對話，但是這種網路社會行動與實體的社會行動之關係，是當今傳播與社會學者關心的重點。進一步而言，以創意為主要形態的社會運動能否創造出新式的社會參與，也是關心社群網路發展之學者所欲探索的問題。

本文主要在於探討社會運動與創意社群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側重於社群組構形式之探討。文章第一部分著重於理論架構的探討，筆者擬出一社會溝通的概念架構，此一架構著重於日常生活社會行動的討論，最後研究者試圖以此一架構，研究台灣的網路社會運動與創意社群的關係。

本文認為創意社群在於建構行動者的場域，在此一場域中行動者的組織較完整，因此創意社群的視覺符號對社會溝通的能力，主要是成立一個對話空間，以建立意識的邊界。

關鍵詞：社群媒介、創意社群、溝通、資訊

壹、前言

本研究關注的是創意社群的構成，此是文化運動+的一個環節，在文化產業背景之下，本文以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運動為例，分析視覺符號與創意社群之間的關係，是本文欲探討之重點。因著社群媒介（social media）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動員的工具，它被使用於不同目的的社會運動，電腦網路的網站可能被用來刊登社運團體的宣示，而電子郵件的信箱可以被使用來招募新的支持者。這種網路社會動員與社會行動的關係，是當今傳播與社會學者關心的重點（Soukup, 2006）。進一步而言，以資訊傳播為主要形態的網路社會運動能否創造出新式的溝通模式，也是關心社群（community）發展所極欲探索的課題。

不同於政治傳播的議題建構研究取向，本文關注視覺符號的動員形式：在日常生活語言與傳播背景之下對創意社群（creative community）的源起進行討論。本研究將側重於網路符號動員的組織形式探討，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在於理論架構，內容將重著在社會運動與組織的關係；第二部分則分析網路傳播科技應用於社會運動的實証發現。從這些研究，筆者擬出一資訊運動的概念架構，此一架構著重於創意社群的組織形式與行動目的的討論，最後研究者試圖以此架構，研究台灣的網路社會運動之一：反媒體壟斷運動之臉書網站，以便理解創意社群的形態。本文認為新社會運動的視覺符號建構了場域空間，成為一個文化的創意社群（Bourdieu, 1991）。

研究發現也指出，虛擬動員的目的主要在於建立認同（identity）的空間，此認同的建立是社群的基礎，動員的目的不在於顛覆運動所欲改善之對象，相反地，以創意進行的網運其目的在於形成日常生活的空間，而此社群的成立需視社運過程中，社運符號如何被普及並被社運成員賦予意義。例如本研究中發現，保護民眾傳播權的議題在台灣的媒介運動中，便具有意義建構的功能。

貳、文獻探討

一、文化與社群

涂爾幹的研究中文化是建立此一社群架構之根本介質而當代社會中的媒介現象則是很重要的觀察基點。因此，在當代社會的背景下，社群是持續地被築基於文化想像（imaginaries）之上，但是因著不同文化文類的交流，文化上的想像是不可能被限制於一個地域疆界之中的，準此，跨界文化想像與微型社會的興起，其中的接合與混生，便成為探討未來文化想像的新基點此為社群所指稱之意義。

從積極面來看，想像是足以構成新的社會形態的，它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媒介（如展示內容）以及人類語言的多樣性，這三種因素之間屬於半偶然，但卻是可以相互作用而組成的新生產模式。

文化運動是指以社群感（sense of belonging）為生產基礎的行動，David Hesmondhalgh（2002）以較為侷限的方式，以歸納出文化產業，表示認為文化的定義為「社會秩序溝通、再製、體驗及探索的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而文化產業常被認為是社會意義產製（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meaning）直接相關的機制（包括以獲利為導向的公司、國家組織、非營利組織），因此幾乎所有文化產業的定義都是將電視、廣播、新媒介…等納入其範圍，而這些事業主要的目標便是與閱聽人溝通，以創造各種文本。他進一步說明，廣義而言，所有文化製品都是文本，可任人加以解讀。他也提及了文本主要是為了引起心智反應，充滿豐富的表徵意涵，藉此達成溝通的目標，而功能性的目標在此則不是重點（Hesmondhalgh, 2002；引自廖珮君譯，2009）。以網路為平台所進行的創意運動便成為文化的運動（cultural move）。

二、社會運動與溝通

本文所指的社會運動是指跨越資訊平台的文化生產活動，在討論社會運動與社會建構關係之前，筆者擬先就新社會運動的範疇加以定義。

「新」、「舊」社會運動的差別主要在於組織運動目標及組成上不同，從相關實証研究發現，傳統的社會運動組織較著重於組織目標的達成，諸如工

會運動或 1960 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 (civil right movements)，傳統的社會運動較著重於組織者 (organizer) 在實踐社會運動時的積極角色。誠如研究者 Freeman (1998) 的研究指出，「美國六十年代的黑人人權運動是極為全面性的，表面上是馬丁路德金恩主導了阿拉班馬州蒙哥馬利市的抵制公車事件，因此得到媒體廣泛的報導，但真正的組織者卻是 E.D. Nixon」(p.451)。基本上，就資源動員論者的觀點而言，傳統社會運動的目標在於透過組織的動員以積極地實現社運組織所設定的目標。誠如 Mayer 與 Roth (1995) 所指出，透過組織的動員，傳統的社會運動關切的是組織的內部發展、動員資源的能力以及對決策單位的壓力以取得協商的空間，至於其所欲傳達的意識形態或集體認同，較非傳統社運組織者所關心的地方。

由於社會運動的變遷，組織此一資源動員論的基礎概念，已經無法有效解釋社會運動的多樣性及動員形式。一方面是因社會運動的進展日趨全球化，Peteet (2000) 的研究指出，全球分散式 (diasporic) 的離散文化已然成為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的運動組織特質，他指出「因著其多層面的地理及文化的離散，全球分散的反抗運動已經提昇了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的跨國認同，巴勒斯坦人也因而在此一基礎下尋求更大的結盟」(p.185)。因而一種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組織形式已隱然成形，傳統的社會運動論者強調社運組織在政治動員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但新社會運動 (new social movement) 理論的提出，已經對日益複雜的社會運動現象提出新的見解。

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見解主要視社會運動的目標在於文化認同面向的定義或澄清而非政治面的實現與對抗。跨社會運動源於 60 年代的歐洲學生運動，新社運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組織資源理論，跨社會運動者可以運用的資源事實上是媒體，亦即社會運動不再大量地依賴組織作為動員的基礎。

相對於傳統社會運動，新社運在定義上，英國社會學家 Giddens 總括視為一種「生活領域的政治」(life politics) (Bagguley,1999)。Giddens 主張跨社會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對既有社會現象及行為的刺激，此一互動過程所欲產生的政治意向是公眾或社會行動者與既存社會體系進行對話的日常生活社群性之所在。

三、創意社群

大多的研究還是將資訊視為一種物質的基礎，而後再去探討網路資訊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較少從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的觀點去理解網路資訊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因此接下來本文將探討網路空間與創意社群之關係。

網際網路應用於社會運動的領域被視為是一種新形態的創意抗爭形式，從提供一些網站的連結到連繫社會共同文化旨趣的團體，網際網路在傳散資訊的功能上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虛擬社會運動也促使一些社會運動學者重新思考社會運動的動員形式。首先，由於主流商業媒體的全面掌控，社會運動團體極欲建立本身的發聲管道，在一個海外印度留學生社群的研究中，Mitra（2001）指出，網際網路的使用並非意謂著支配團體與被支配者之間的統治關係將被重新安排，而是網路使被控制團體不為支配階級「系統性」地消音，網路也因而成為社運組織的發聲管道（p.46）。

一項民族誌分析（*ethnographic analysis*）的研究也指出，網路的使用有效地擴張了生活世界（*life-world*），網路所構成的世界可被規劃為一公共領域，此一領域將可對立於早被政治與商業力量侵入的領域，一如 Bakardjieva 及 Smith（2001）提出，欠缺民主啟蒙上的對策，失去言論自由環境的網域空間，將迫使公民淪落於全面的消費洪流之中而無法自停，此一消費領域是充斥著政治或經濟勢力上的欺瞞（p.81）。

除了網路在社會運動組織的應用之外，網路也被使用於文化領域相關的運動之中，網路使得有共同旨趣的民眾得以相互連繫而擺脫地域或族群上的偏見，在菲律賓，一個知名的網路社群 *Cyber Barangay* 應用了次文化的概念統合了已經分散各處的群眾。菲律賓學者 Sy（2001）指出，利用籃球比賽，資訊科技已經重新建立了菲國的國族感，此一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過去早被地方山頭主義或族群忠誠感所侵蝕（p.301）；除此虛擬社群的成立之外，公民運動組織也應用網路來為公眾建立議題，此一方式有可能以一種文化傳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來取代代議政制度（Coleman, 1999）。

Washbourne (2001) 認為，透過水平式的傳播形態，網際網路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運動，就喚起公眾對公共議題的知曉而言，虛擬動員所使用的傳播方式是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Washbourne 主張用跨地方性 (trans-localism) 來理解新的社會運動形態，跨地方性是指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 的傳播形式，傳播網路的連結是透過邊陲的團體相互連結，而非一種由中心向地方加以傳播的溝通模式，此一資訊的傳播形式因而造就了新的社會運動的方向。他進一步指出，資訊科技喚醒了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此一環境公民意識的興起不單只是帶來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也進一步對應了地球之友 (Friend of Earth, FoE) 的全球價值 (globalist value)，筆者將如是的過程，即起源自地方但動員的資源不僅限於地方，稱為跨地方性 (p.141)。

綜合以上研究可知，網路社群如何進行知識生產是一項值得探究的問題。此外，以往以社會運動的形式所構成的社會反思性，在網路動員的形式中，以視覺結合文字的方式來進行，也是社會運動極欲探索的一項課題。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在於探究虛擬動員的傳播形式，而此一傳播形式如何連結生活風格而形成文化場域；本研究也將討論在虛擬動員的形式中，社會運動成員如何在網域空間中，建立網路使用者之間的集體行動感。

四、社群媒介

社群媒介主要是指溝通性質的網路媒介，如 Facebook、Twitter、Microblogger 等 (Diani, 2001; Tambini, 2001)，相對於傳統社會運動的社會情境，社群媒介主要是以利用網路做為傳達活動訊息的工具，其中所損耗的成本較少，並可達到資訊告知上的功能；其次，因著網路的互動特性，社群媒介可以被用於社運主導者與一般民眾的連絡管道，相關的資訊也可被用於影響媒介的議題。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社群媒介更可以促進虛擬延伸 (virtual extension) 的進行，以補充地方集結上的不便，以下筆者擬以國內外相關的文獻來說明社群媒介與其傳播形態。

(一) 社群網站 Web 2.0

Boyd 與 Ellison (2007) 定義社群網站或所謂社會網絡網站為：第一，可以在系統中建立公共性或半公共性的個人資料；第二，可以累積聯繫人；第三，可以橫跨使用者自身的聯絡網絡，並且看到自身網絡系統中其他人的入際網絡。Ellison 等人 (2011) 也認為，社群網站是一種無邊界的溝通科技工具，結合個人網頁，支持使用者形成和維繫社會連結網絡。

更重要的是，使用者之所以可以自主上傳資訊，其背後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就是 Web 2.0 時代的到來。Web 2.0 時代的網路角色，從「被動的資訊提供」轉變成將網路視為「一個讓使用者投身其中，在網路平台上發佈經驗和訊息」的窗口 (Rheingold, 2000)。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網路不再只是人們搜尋資訊的引擎，更是發展自我理念的平台，透過使用者生產文本將資訊向外發佈；此外，社交／社群網站的興盛，也代表了個人可以在不同的網站進行自我意見的展演，而這樣社會網絡的工具更是一種極佳的動員工具，可以連結、維持、接觸和找到新的志同道合的人 (Rheingold, 2000)。

另外，Soukup (2006) 認為，虛擬社群、社群網站或是電子信箱等等具有互動和共同寫作特質的網站，可以讓參與者根據時間和需求決定自己參與某一運動的涉入程度，可以只註冊或接收資訊而不參與實體的會議，也可以透過參加實體集會來增加參與程度並負擔更多責任。所以，這樣的網站它的工作分配是十分彈性的，人們可以謹慎選擇他們想要參加的、想要發表意見的，而且不用明文規定，成員便會自主行動。

對社會運動的主事者而言，如何建立其行動基礎往往是社會運動的目的之一。一般而言，虛擬動員常以 e-mail 或 chat room 等工具來接近社會運動的成員。例如，在一個英國環保團體的網站研究中，一名研究者指出 e-mail 系統有助於成員分享彼此的經驗 (Washbourne, 2001)，相對於大眾傳播的模式，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的傳播形式，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功能，一如 Coleman (1999) 的研究指出，電腦中介傳播的多對多 (many-to-many) 傳播模式，不同於大眾傳播的一對多 (one-to-many)，允許具經驗性的知識回復到在社會傳播中應有的位置，一種指導性或徵詢性的地位，這樣的傳播形式有利於溝通的成員

就既有的認知基礎上提出討論，一樣地，也可對相關的知識，提出相關問題（p.208）。質言之，社群網站的貼文系統是一個有效的工具去組織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而不需透過面對面的接觸，而此一特質使社群媒介在本質上與實境的社會運動脫鉤。Picherill（2001）主張，相關的研究已經証實，不需透過面對面的接觸，社群媒介的貼文或照片是足以組織成員的日常生活經驗（p.164）。

進一步地討論，社群網站創造出一種混合的（hybrid）社會環境，在此一環境中實質與中介的傳播形式是共存的。Sypher 與 Collins（2001）主張，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行為，科技較能重新安排社會活動或傳統性社群。因著科技的能力，科技可以創造出一種另類社群，而此一社群是無法存於非中介性的傳播情境中（p.198）。綜而言之，為了理解虛擬動員如何運作及社會運動團體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來重新組織成員是研究的重點。因此，為了要探究此虛擬聯結（virtual association）的特質，社會運動成員往還的網路內容應是探索此一傳播形態聚焦之所在。

（二）觀眾與社群

不同於建立新社會運動，其資訊的傳遞在於建立的認同。網路動員的資訊架構在於建立成員一個穩定的支持協商體系（constituency），亦即一種意見交換的平台，此一傳播形式不同於前者，以下將說明之。

類似於實體社會運動的組織，虛擬動員的資訊平台應具備高能力傳播資訊與新聞的能力。根據 Diani（2001）的研究指出，資訊在社會運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是一股社會支持的場域而非創造一種特有的政治對抗策略。他指出，相一致於社運人士的專業結構，新社會運動的支持團體是分散而未被組織的，但這些相關團體與社會運動團體就某些議題已具備類似的觀點，因而，虛擬團體就不需要去營造強烈的認同去號召群眾，同時也以較低的成本去接近社會上的潛在支持者，因為這群民眾並無需特定的誘因去動員，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是傾向以某一事件觀眾的形態出現（Diani, 2001, p.123）。

除此資訊平台在穩定支持者的功能，虛擬動員組織也借此一平台進行議題的討論，以便建構社會事件的場域。例如，運用討論組群或常見問題

(Frequent Question and Answer, FQA) 的形態，可以對相關的社會議題提出見解，並對有相同問題的民眾提出解答。一項義大利網路團體的分析中，Tambini (2001) 的研究指出，討論組群的版主有權決定討論的主題並準備 FQA 的題目，並可編輯或去除留言，以此等方式來影響議題 (Tambini, 2001, p.252)。而圖像元件的設計或討論組群上的介面是否具可親近性，會影響虛擬動員對議題設立的程度。Tambini 表示，事實顯示在內容可近性與議題設定效果之間，明顯地存在著交易性關係 (trade-off)，亦即，中介的介面愈容易親近，議題對觀眾的影響就愈明顯 (Tambini, 2001, p.253)。

五、媒體改革運動與社會場域

台灣的媒體更改革運動長達 20 多年，過去一直是以公共電視的建立及維護作為主軸，而組成分子大多以學院的傳播學者與研究生為主 (馮建三，2012)，但是 2012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則是一更改過去的運動主體，其主要的意義在於重新調整電視在文化資本場域中的位置，而此一調整也使更多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加入了類電視的製作，如研究者對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微電影之研究發現，運動組織如果想透過微電影廣告來與閱聽人溝通時應避免使用代言人來作為微電影廣告的演出，因為可能會讓微電影廣告的焦點轉移到代言人身，蓋過了原先組織想要傳達給大眾的訊息，應將重點放在組織想要傳達的資訊，資訊的豐富性或是即時性最能吸引閱聽眾的目光 (劉智璋，2013)，另外，反媒體運動所引發的拒中時專欄運動，也使文化菁英以拒絕對中時寫專欄來否定中國時報作為一個文化資本再生產的場域 (陳瑩萱，2014)。

以台灣社會場域變遷的觀點而言，從現代性理論來看，早期宜蘭的反六輕運動是以環境保護為對象，透過小眾媒介的傳播使人們關切環境的議題，直到 2010 年起，長達三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則是一個文化場域的反思及對話，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時間的視域，直接否定主流電視在文化生產上的地位，間接地也促成文史展示，使地方為一「新媒介」的內容，此一場域的變

動其中的傳播因素應為視覺性語言的興起及視覺性語言在日常生活對活之日趨重要 (Frosh, 2011)。

語言 (verbal) 是人類溝通的介面，而此一介面可吸引感同身受的民眾或相關社會改革團體的加入對話。整體而言，為了挑戰商業化主流媒體的誤導，虛擬動員旨在建立一個創意的傳播管道。首先，虛擬動員皆在抗爭主流媒體的誤導，並提出另類思考的觀點。例如，在 *The power of identity* 一書中，學者 Castells (1996) 指出，墨西哥社會運動組織 Zapatistas 成功地運用網路與傳真機將墨國政府的腐敗與社會隔離的政策公諸於世。延續社會運動的發展，可以說是網路科技最大的功能，如同 Fortier (2000) 強調，現今即便有主流媒體的壓制，虛擬動員持續地提出對抗性觀點，可說是對社會改革團體的後勤支援至為重要，經由科技的善加利用，更為重要的是虛擬動員產生了政治上的平衡，利用不同的傳播科技或網路功能，虛擬動員提出了相關對策，以創意的方法，對抗了社會中無所不在的監督體系 (Fortier, 2000, p.464)。

其次，對於社會運動的外圍民眾，擴大結盟有助於對抗資本社會中的消費洪流。Diani (2001) 指出，電腦中介傳播引入社會運動領域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將社會間對社運主題感同身受的民眾，引導至一個高度互動的想像社群，以增加社會運動的共感基礎 (Diani, 2001, p.123)。資本主義中講求作秀的消費洪流，也將因虛擬動員所帶來的溝通方式，而有所轉化。一如 Tambini (2001) 的觀點指稱，消費洪流也日漸侵入政治的領域，有相當大的比例的公民資訊是由商業廣電媒體來傳送，這使得原本應明思慎辨的民主機制成為一種作秀式的叫賣政治，另外學者 Touraine 將後工業社會稱之為控程社會 (programmed society)，但因以社會運動形式生產文化時代的到來，這些問題可以重新被概念化，亦即社會運動、文化消費者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可以再協商 (Touraine, 1971)。

參、研究方法與策略

本文以反媒體運動為例，分析視覺符號與創意社群之間的關係。從以上的討論中，問題的核心擬以以下三個題目來進行：（一）視覺符號是以何種形式來聯結社會運動議題？（二）創意社群是以何種形態進行社會行動？（三）最後是創意社群，反映出何種社群的特質？

本研究的焦點為反媒體壟斷運動，研究的網路文宣是以資料的易得性為主要的收集對象，研究的圖文資料是來自研究期間的網路觀察及其臉書網站，本研究亦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相關人員的發言，進行次級資料分析。

反媒體壟斷運動是近年來社會運動組織利用電腦網路進行虛擬動員的組織形式及其創意形式的運動，而其運動主體性的建立，及其如何連接至此一創意社群之形態，值得觀察（聯合晚報，2013/1/25），研究的樣本是以反對媒體壟斷運動社群媒介的網路視覺文本，作為研究的理論性樣本。

此一媒體改革運動可定為全面反省媒體定位的運動，她源自於台灣媒體學者與旺中媒體集團的對抗，其結果一方面造成民眾對電視媒體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深化了自媒體（we media）在新聞傳播產業之發展，首先筆者簡要說明台灣媒介改革社會運動的背景（陳順孝，2014）。

在台灣，由於長期廣電媒體被執政黨所控制，廣電媒體的改革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一項顯著的社會運動議題。在 80 年代末期，是地下電台的運動，此時的社會運動主要是以地下電台與有線電視第四台業者為主，其目標主要在於彰顯執政黨掌控廣電媒體資源上的不公（Chen, 1998）。在 90 年代中期，比較明顯的媒體改革運動是推動公共電視設台，此時的主要行動者是校園學者與文化團體，其運動的目的在於抵擋商業電視台代表的封殺，以確保公共電視的預算設定。在 2010 年之後，廣電改革運動主要是由公民搶救公視聯盟（公搶盟）來進行，其運動目標則在於監督政府的廣電媒介政策，所屬的傳播學生反媒體壟斷聯盟是其組織之一，運動是以國內傳播院校的學生為主，並輔以電腦網路傳播來延續廣電媒體改革的運動，這是近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之一。本研究即是以學生團體反媒體壟斷的 Facebook 網頁內容¹及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探討對象，本研究共分析 63 則視覺符號。

¹ 網址見 <https://goo.gl/WXYGuP>

媒介改革運動可視為近年來重要的圖文媒介與社會運動組織結合的重要社會文化現象，視覺符號的應用更是新的溝通形式。本研究試圖以社會運動團體的語言文本作為分析對象，以此研究策略來了解網路社運空間，中文本形態與網路創意社群的形成過程。語言可以被視為人類社會行動的形式之一，研究以論述分析來探討符號與社群之動員形式，並從中探討創意社群成立的途徑為何？研究的文本是以理論抽樣法來取得，研究的觀察對象是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臉書網頁的內容，以理解網路社群的行動旨趣（林芳玫，1996）。

本研究的進行是從 2012 年 9 月 1 日學生團體發起反旺中遊行起到 2013 年 2 月的反媒體壟斷全球守護台灣運動為止，在半年的研究期間，觀察分析了相關網頁及文獻資料，研究分析策略是以網路視覺文本進行質化的研究，此分析策略將有助於吾人理解網路社運在形塑其社會行動之歷程，並進一步理解創意社群建構的過程。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台灣的網路虛擬動員以一種特殊的形態來進行社會運動的行動，就虛擬動員的行動目的而言，社運成員間同伴感的建立是先於虛擬社群的建構，而地方知識的建構則須視社會議題在成員間涉入的程度。以下藉由主要的研究發現，以說明其社會行動的形式。

一、語言行動的架構

視覺符號在網路動員的行動中，扮演著形成創意社群與生活行動結合的功能。從相關網站資料的分析中，網路內容常是以提出聲明的詞彙，作為動員的開始，發揮文字作為行動揭示功能。因此，網路創意社群的組織形式之一，同時具備建立社群與媒介傳播的形式。

例如在反媒體壟斷運動中，行動的聲明稿成為運動之組織形式之一，以澄清組織之目標：

在這個光輝但令人心寒的元旦前夕，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將在自由廣場舉辦反巨獸跨年晚會，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凝聚力量、徹夜嘶喊！

請大家幫忙分享、邀請臉書朋友參加！

先別管煙火了，你聽過媒體壟斷嗎？

圖一：元旦行動



在這視覺動員中，社群媒介也扮演著類似事件重構者的角色，諸如，鼓勵民眾參與募款餐會、生活音樂會或大學的研討會、創意社群集結等。由以上的文字中可知，虛擬動員所欲建構的事件，其內容並不限於運動的目標——即廣電媒體的改革——而是在其他的生活意識上進行連結。

二、認同與社群建構

在媒改團體的電子留言板內容調查中，部分內容還是以建立起團體感（group identity）為主，也就是留言板的內容主要是以情緒性的表達或問候，譬如新學年的祝賀或對政治事件的嘲諷。在虛擬動員的形式中這種一體感的

建立並不同於實體社運中人民的集結，在於以文字來展示一種理性的思辨場所，此一認同空間在資訊社會裡，學者 Featherstone 將之視為圖像符號的潛在資源（Featherstone, 2007）。

圖二：以恐龍表達電視新聞媒體的惡質化



上圖主要在於試圖建立反媒體壟斷的社會基礎，在本研究期間一件有關於拒寫中時的社會事件，使貼文成為文化生產的場域。事實上，一些相關網站符號之橫向連結，往往可以促進社群性在情感動員中的成立，而這樣的能動性又得助於橫向連結來進行主體之建構，此一部分將在下一節中說明。簡而言之，社群媒介動員的成立，仍有賴於主事者與潛在支持者的對話。

三、社會運動與創意社群

相較於傳統社會運動語言在政治傳播的意識形態效果（許傳陽，1997），新的視覺語言建立了議題的再現方式，此即社群媒介的傳播的面向，較著重

於日常生活的溝通形態，其功能主要在於體現社群（Bourdieu, 1991）。亦即，資訊的目的主要在於建立認同，此一認同的建立是社群的基礎，資訊動員的目的不在於顛覆運動所欲改善之對象，相反地，網運的目的在於建構日常生活文化場域中的實踐形式，新社會運動概念的倡議者 Melucci 認為當今的社會運動已經向文化面向轉移（Melucci, 1996），因此創意社群的建構仍需依靠社運過程中，視覺符號如何普及並被社會成員賦予意義，形成場域空間，此即為生活運動研究的特質。例如本研究中發現，保護民眾傳播權的符號在台灣的電視文化產業改革的運動中，便具有將對話轉化為成為日常生活的意義，成為參與者社會支持的基礎（Laraña, Johnston, & Gusfield, 1994）。

在水平聯結的傳播形式中，虛擬動員如何運用相關的資源，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研究問題之一。相關資料顯示，在虛擬動員中，網路動員並非以其議題的顯著度為主，而是以意義建構的形式來進行社群的能見度。本研究發現，就網路動員的面向而言較著重於空間美學與行動之結合，其功能主要是建構心象結構。

圖三：高雄行動宣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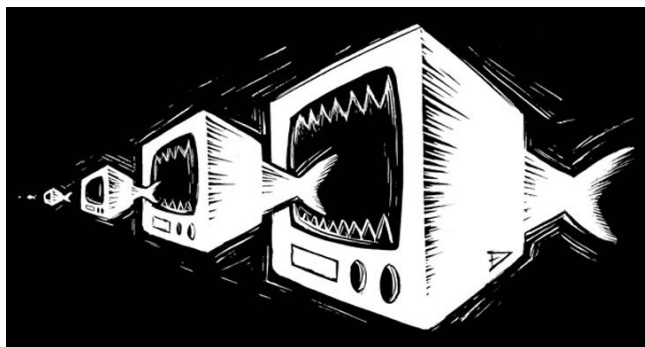


網路社群並非只是一個想像社群，它也需靠在地的組織來運作，觀察者謝昇佑（2015）指出反媒體運動組織是一高度集中化組織性很強的社會組織，在本研究觀察期間，媒改團體主要聯結的網站是媒體網站（如 FB 粉絲專頁或自製微電影等），社群媒介是一個文化自主運動的網路，網路上的創意社群行動主要是以社群自主的角度，來反思電視普遍存在文化霸權的現象，而就如上的觀察回應了美國網路研究者 Pickerill（2001）的看法。他指出，電腦中介的傳播模式已經改變了動員的認同基礎，也就是說跨運動或跨文化影響了社會運動的認同與結盟的感情，這樣的現象也指出了生活運動在於反大眾消費的觀點。在這樣的連結下，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可以在網路的連結中，借由圖像的創作而建立運動的知識分類（如圖四及圖五說明）而影響溝通之進行。

圖四：你好大 我不怕運動符號



圖五：反媒介壟斷運動符號



在以上的研究發現中可知，虛擬運動員所運用的資源是網路上相同旨趣的創作團體，而此一認知連結的圖像式路徑，組織了社群媒介與參與者之「空間」關係。在資訊化的情境中，此一行動路徑隱喻了運動參與者在生活方式的串聯（如拒買某種中元普渡食品或獨占的電視新聞）。接下來筆者將在結論的部分總結社群媒介、社會行動與創意社群的關係。如指出因為反媒體壟斷的支持者，大多數為學生在此一文化社群中的生態（*habitus*）可能是比較反諷式的視覺圖像，研究者也發現性此干擾性訊息皆在提供負面性廣告以進行支持者之溝通特別是以視覺符號所創生出文化場域，其間的生存心態作為一種社群的外部符號邊境，或可稱為社會運動的文化面向，此一時間視域

是不同於社會運動學說中的小眾媒介論的立場(黃守達,2013年10月22日)。

伍、結論：視覺語言與創意社群

本文以媒體改革運動為例，分析符號與創意社群之間的關係。研究相關的資料指出，圖像符號的使用使地方運動在文化運動的系譜上找到新的發聲位置，讓參與者在當前的社會連動中，建構社群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以建構人與地方的意義。

因此社會運動與創意社群的研究，在於重新概念化資訊與資源的關係，在社會參與的研究上 Ellison 等人(2011)認為，虛擬社群要能夠有效地展開社會參與，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吸引到潛在的支持者。傳統上，資源動員理論對於社會性動員的看法是建立在個體參與和動員本身的利益上，認為個體之所以會參與動員是因為追求自身利益，也就是說，這樣的說法是建立在理性的交換論之上。社會運動理論的奠基者 Benford 與 Snow(2000)認為，社會中的不滿情緒一直都存在，且足以支持任何草根抗議的形成，但運動並不常發生，由此可知，社會行動的產生並非是情緒的不滿或是環境的壓迫，而在於修辭的策略 (Benford & Snow, 2000)。

地方運動之動員牽涉到了人與時間的連結問題，因為在傳播的過程中，記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記憶可以影響他人的態度和意念，並加入社會參與中，所以，潛在的、的和多元的時間性，以及還有居民的自主性、認同感和使命感是關鍵，而集體行動本身就是一個建構性的、識別團體的過程，如 Soukup (2006) 所指出日常生活與同伴關係的連結。

網路的社群也和公民社會和社群媒體的時代來臨有關。楊國斌(2009)的研究分析，社會行動之所以能引起注意，引發軒然大波，達成體制對行動訴求的回應，有下列數點原因：在社會條件上，人群對傳統媒體重複主流觀點的不滿，搭上傳播科技轉進，藉由網路發聲；其次是議題的豐富度，使網友能依所長分工合作；此外，由下而上的發聲管道，能使分散的聲音不需經過權威組織的編輯，形成多視域場域。

綜合前述，網路上的去中心特質，如 Melucci 認為的，網路如何藉由重塑社會時間脈絡而對社會行動造成影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Melucci, 1996）。動員本身結合了人際網絡、情感、價值觀和文化層面的實踐以及認同感的凝聚，讓傳播意義不再只有傳統上認為的資訊傳播，而是更多抽象的文化符號，這也呼應了 Peckham（1998）所提出文化資源的概念。

在此筆者擬以 Giddens 的第二現代性來進行說明創意社群在社會行動中的關係。Giddens（1991）指出，社會行動者與傳統文化認同不斷地互動，而此一過程也形塑出對於新的生產關係。所以就本個案而言此一社會反思性（對環境的認同），對當代創意社群的意義，在於它使運動支持者對人們自身處遇產生的時間感，並對參與者形塑對中正紀念堂的「新」認同（Bagguley, 1999, p.75）。

陸、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文化創意的時代中，民眾使用臉書（Facebook）或社群網站建構作為日常生活實踐的行為愈來愈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試圖從社會運動理論出發，以網路的文本作為社會行動的分析對象，研究社群以視覺語言建立起網路社群的形式。在維根斯坦的理論中，社會的行動者常以受制團體的語言，如傳播權此等類目作為語言行動的出發點，對此一概念產生認同的創意是創意社群的研究之所在，在當今的網路傳播進展中漸漸普遍，但創意社群的溝通形式，但是否能有效持續能動性，而成為生活產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則有待進一步地研究。

基本而言，社群內部意義之構成是研究創意社群的重點，筆者認為，在社會行動者的參與而言，語言行動者進行的網路社群，因涉及了資訊平台、成員的連結及可資運用資源等因素，其過程較為繁複，而此一過程影響語言的使用，也可能為創意社群的形式所影響。未來的研究方向，建議研究文化組織如何應用面對面溝通形式，來進行創意社群的組織功能。

在研究的建議上，本文認為，如何對文化動員的定義及文化產業的相關社群研究，如地方文史組織在網路上的應用，未來可以進行視覺符號與觀覽者之間的資訊使用研究。本研究在媒介內容上偏向於媒介改革組織上的討論，在理論文本的選擇上及討論對象之不足是本研究之限制，未來應研究多種類型的文化運動，以探測理論概念的有效性。

參考書目

-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台北：巨流。
- 許傳陽（1997）。〈大眾媒介與社會運動〉，翁秀琪（編），《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頁 37-67。台北：三民。
- 陳順孝（2014）。〈網路公民的集體演化〉，洪貞玲（編），《我是公民也是媒體》，頁 58—81。台北：大塊文化。
- 陳瑩萱（2014）。《拒絕中時運動的文化場域分析》。政治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班論文。
- 楊國斌（2009）。〈網路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9: 39-66。
- 馮建三（2012）。《傳媒公共性與市場》。台北：巨流。
- 黃守達（2013年10月22日）。〈反媒體壟斷運動1〉。上網日期：2013年11月1日，取自 <https://goo.gl/pcwqVT>。
- 廖珮君譯（2009）。《文化產業分析》。台北：韋伯。（原書 Hesmondhalgh, D. (2002).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New York, NY: Sage）
- 劉智璋（2013）。《探討反媒體壟斷運動微電影廣告之效果》。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系碩士班論文。
- 謝昇佑（2015）。〈反媒體壟斷運動〉。上網日期：2015年10月15日，取自 <http://ios20.asdc.tw/a10-media/>。
- Bagguley, P. (1999) Beyond emancipation? the reflexivit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M. o'Brien, S. Penna & C. Hay, (Eds) *Theorizing modernity* (pp.65-82). New York, NY: Longman.
- Bakardjeiva, M., & Smith, R. (2001).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3(1),67-83.
- Bourdieu, P. (1991).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1996). *The power of identity*. London, UK: Blackwell.
- Coleman, S. (1999).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an: From virtual representation to direct

- deliberation. In B.N. Nague & B. 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 195-21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en, S.Y. (1998). Stat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 11-29.
- Diani, M. (2001).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In Webster, F.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17-12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11). Connection strategies: Social capital of Facebook-enabl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 13(6), 873-892.
- Featherstone, M. (2007).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UK: Sage.
- Freeman, J. (1998). On the origin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 Macionis (Ed.), *Seeing ourselves: Classic, contemporary, and cross-cultural readings in sociology*(pp. 411-454). Pearson, NJ: Prentice Hall.
- Fortier, F. (2000). Virtual communities, real struggles: Seeking alternatives for democratic networking. In M. Gurstein (Ed.), *Community informatics: Enabling communities with information*. (pp.446-469). London, UK: Idea Group Publishers.
- Frosh, P. (2011). Framing pictures, picturing frames: Visual metaphor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2),91-114.
- Giddens, A. (1991).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 Bryant & D. Jary (Eds),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oach*. (pp.201-221). London, UK: Routledge.
- Laraña, E., Johnston, H., & Gusfield, J. R.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M., & Roth, R.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fordist society. In M. Darnovsky, B. Epstein & R. Flack (Eds.),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pp. 299-319).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elucci, A.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ra, A. (2001). Marginal voices in Cyberspace. *New Media & Society*, 3(1),29-48.
- Pickerill, J (2001). Weaving a green web: Environmental protest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In F. Webster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pp.142-16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eteet, J. (2000). Refugees, resistance, and identity. In J. Guidry, M. Kennedy & M. Zald (Ed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p.183-209).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eckham, M. (1998). New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countermovement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scientology and internet critic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 317-347.
- Rheingold, H.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oukup, C. (200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s a virtual third place: Building Oldenburg's great good plac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New Media & Society*, 8, 421-440.
- Sy, P. (2001). Filipinizing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power. *New Media & Society*,3(3), 296-312.
- Sypher, H. E., & Collins, B. (2001). Virtual-online communities: How might new

- technologies be related to community? In G. J. Shepherd and E. W. Rothenbuhler (Eds.),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pp. 191-200). New Jersey: LEA Publishers.
- Tambini, D. (2001). The civic networking movement: the Internet as a new democratic public space? In C. Crouch, K. Eder & D. Tambini (Eds.), *Citizenship, Markets, and the State*. (pp.238-27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uraine, A. (1971).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Washbourne, N. (20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w forms of organizing ? In F. Webster (Ed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29-143). New York, NY: Routledge.

On the New Identity of Social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Creative Community

Chuan Yang Hs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study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object in constructing creative communities in Taiwan. In general,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s the pluralization of life-world that creates the distinctive opportunities and pathologies of modern life.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case study, I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arena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In theory, a common issue concern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ists is: if virtual community could be viewed as a form of social collectiven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n, what i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has played in attaining a network in terms of setting up a creative community. Toward this end, the paper will be composed of two parts. In the first half, with referenc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I demonstrate the promi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upholding virtual movements. Based upon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hen, I survey anti-media monopoly movement in Taiwan. Furthermor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ncern, how the identity contributes to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s presented in conclusion section. The empir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electronic content stored in media reform activist's Facebook. Thes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qualitative method. I argue that the visual device is a part of framing schematic pictures into communities. The turn of visual presentation is to form a field of temporal horizon.

Keywords: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reative community

*Chuan Yang Hs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E-mail:093663@mail.tku.edu.tw

「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 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參與觀察

蔡慶同*

本文引用格式

蔡慶同（2018）。〈「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參與觀察〉。《傳播、文化與政治》，8:165-190。

投稿日期：2017 年 10 月 4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 作者蔡慶同為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副教授，
tonytsai@tnua.edu.tw

《摘要》

本文主要是針對自 2015 年 9 月正式啟動、迄今仍持續進行中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進行一個參與觀察的現場報告，身為發起人與指導老師之一的筆者，試圖將定期正式的觀摩、論壇、專家會議、工作坊與映後座談，以及不定期非正式的互動、交流與對話，視為一個教育的過程，並希冀從行動研究之觀點，對於「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作一個初步的歸納。

關鍵詞：合製、行動研究、亞洲、紀錄片、教育過程

壹、前言

本文主要是針對自 2015 年 9 月正式啟動、迄今仍持續進行中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進行參與觀察的現場報告，其中包括了定期正式的觀摩、論壇、專家會議、工作坊與映後座談，也包括了不定期非正式的互動、交流與對話，希冀從一個教育過程的行動研究之觀點，對於「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作一個初步的歸納與整理。

接續台灣紀實音像與社會變遷之關係的課題，筆者在 2011 至 2014 年期間，申請並執行了名為「東亞視線：台灣、韓國與日本紀實音像之比較研究」的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旨在於拓展對於亞洲鄰近國家在紀實音像的認識及其參照，尤其是它作為現代的觀看技術，是如何從西方（或日本）引進並被看待的？以及又是如何在各自的歷史與社會中被實踐的？¹

在中國、日本與韓國等地的移地研究過程，意外收獲的是，逐步串連起一個影像教育的群聚網絡及其社會關係，例如國家電影資料館或電影中心、紀錄片影展、電影學校、社區影像、非營利組織等等機構，²而這個群聚網絡及其社會關係，也成為下一步推動「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的契機。

最初是在 2014 年 9 月，於第六屆 DMZ 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 DMZ Docs）期間，身兼影展執委的韓國藝術大學教授、資深紀錄片導演 Kim，³有感於新世代的紀錄片工作者，似乎都欠缺對於亞洲的認識與關注，遂提議舉辦一個會外會性質的論壇，集合參與影展的亞洲人士，而筆者亦有幸受邀作為台灣的與談人。

¹ 研究成果可進一步參考蔡慶同（2017）。

² 中國的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影視人類學實驗室、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雲南藝術學院、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日本的國家電影中心、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電影保存協會、IMAGICA，韓國的國家電影資料館、EIDF 國際紀錄片影展、DMZ 國際紀錄片影展、MEDIACACT、獨立電影協會、首爾獨立紀錄片影展、Labor News Production 等等。

³ Dong-won Kim（金東元），1988 年所拍攝的 *Sanggye-dong Olympic*，以因舉辦奧運會而被圈地迫遷的居民為紀錄對象，其導演與居民站在一起的紀錄位置，被視為韓國獨立紀錄片的發軔，關於 Kim 的介紹，可進一步參考《放映週報》第 614 期的〈從「貧困」出發才能拍成電影：專訪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東元〉（見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1708）。

除了分享各自在紀錄片的發展與現況之外，此一論壇特別聚焦於 Kim 所提出的合製之可行性，筆者即從一個影像教育的觀點，提出了這樣的建議：既然合製的初衷，乃是為了增進彼此交流並重啟亞洲思考，應當可以善用各個電影學校作為常設性機構的優勢作為基礎，並在年度性影展作為資源平台的支持之下，從中小型的、實驗性的紀錄片合製計畫開始作起。

這個構想，經過了一年的醞釀，終於在 2015 年 9 月的第七屆 DMZ Docs 正式啟動，之後，第一期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歷經 2016 年 2 月在首爾及 5 月在台南的兩次工作坊，成果展示於 2016 年 9 月的第八屆 DMZ Docs，並同步啟動第二期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接續舉辦了 2017 年 6 月在台南及 9 月在首爾的兩次工作坊。

事實上，1990 年代開始，紀錄片作為一種電影的類型，在亞洲各個地域，似乎都呈現了遍地開花的榮景，以游惠貞（2014）所編撰的專書為例，就收錄了包括台灣在內、十幾個亞洲國家的紀錄片現況概述與導演訪談，以文字來描述亞洲各國紀錄片的發展歷程，呈現了紀錄片作為一種屬於西方的科技媒介，在各國相似的命運、面對的問題或共同的困境。

又以影展為例，從 1989 年的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到 1998 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2007 年的 CNEX、2009 年的 DMZ Docs 等等，它們皆提供了亞洲各個地域的紀錄片，從徵件、產製、作品、映演到發行、出版的各種管道、機會與資源。

例如釜山國際電影節於 2006 年成立的亞洲紀錄片連線（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 AND），提供了亞洲電影基金（Asian Cinema Fund），在每年年中開放亞洲紀錄片拍片計畫的補助申請；以及 CNEX 每年會策劃出一個主題，徵集提案、評選並提供製作補助，希望有系統、有組織地對華人當代社會的變遷歷程進行測繪與紀錄。

然而，藉此我們所認識到的亞洲，往往仍是各個地域的不同視窗及其排列組合，甚至只是提供一種虛擬實境的旅遊體驗，以及異國情調作為文化消費，而所謂的製作計畫之補助，也仍然是維持某種以國家來加以切割，或者個別導演及其作品的作者電影，在鬧熱的交往之後，我們往往還是又回到各自的所在，至於亞洲何以名之的問題，仍然停留在原地。

正如邱貴芬（2016）所意識到的，1980 年代中葉之後，亞洲許多國家先後興起了一股新的紀錄片的風潮，包括台灣、韓國、中國、菲律賓、印尼等等，都出現了有別於以往的一種紀錄片形式，她稱之為「新紀錄片運動」。

而在東亞紀錄片脈絡下的台灣一節之中，她又提及 1980 年代中葉以來的台灣新紀錄片現象其實並非台灣特有，在日本有 1960 年代末期的小川紳介、1970 年代的土本典昭，在南韓有 1980 年代末期的獨立紀錄片與民眾電影，都是以「環境」相關的抗爭為觸媒，⁴以及 1990 年代誕生的中國新紀錄運動，如何關懷底層弱勢並作為社會變革的另類文獻。

換句話說，在紀錄片的領域，亞洲作為某種區域性的意義及其重要性，乃是值得關注的，而在紀錄片的領域之外，早已啟動了不一樣的反思，例如基於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以及如何擺脫國族主義的束縛，台灣、南韓與日本的文化研究，已開始進行亞洲的論述（孫歌，1999）。

這包括了「作為方法的亞洲」（竹內好，2007）、「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亞洲作為抵抗線」（子安宣邦，2008）、「作為知性實驗的東亞」（白永瑞，2009）、「亞洲作為方法」（陳光興，2006）、「新亞洲想像」（汪暉，2010）等等。⁵

綜而言之，「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緣起於一群在大學裡教授紀錄片的老師們，我們來自於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等地，有的是作研究的學者、有的是影像的工作者，在許多正式的影展或非正式的聚會裡，逐漸地形構成一個跨越疆域或邊界的群聚網絡及其社會關係，同時，基於「亞洲」能否作為紀錄的方法之關注，進一步發起了這樣的一個實驗性之行動，並將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文化生產，視為某種教育的過程。

貳、我是亞洲人

⁴ 儘管如此，筆者並不完全同意邱貴芬（2016）所述：將小川紳介的成田機場抗爭、土本典昭的水俣病調查、Kim 的被迫遷居民紀錄、綠色小組的海山煤礦報導，歸納成都是以「環境」相關的抗爭作為觸媒。

⁵ 《亞際文化研究》期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從西天到中土計畫、在左邊的亞洲影展等等，可以說是由此衍生或與其相關的社會文化活動。

正如上述，2015 年 9 月的第七屆 DMZ Docs 期間，參與的電影學校，在事先各自組成了師生團隊，先是進行學生作品的觀摩放映，主要是藉此增進彼此之間的認識與熟悉，同時穿插著指導老師的與談，尤其是對於未來如何具體落實此一「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進行討論，包括了為何推動此一計畫？什麼是適當的主題方向？如何擬訂製作的進度？

一、觀摩

有了基本的共識之後，2016 年 2 月，在首爾舉辦了第一次的工作坊，來自韓國藝術大學（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以下簡稱 KARTS）、日本映畫大學（Japan Institute of the Moving Image，以下簡稱 JIMI）、上海同濟大學（Tongji University of Shanghai，以下簡稱 TONGI）與臺南藝術大學（Tainan University of Arts，以下簡稱 TNNUA）的四個師生團隊，以 Kim 所提出的 *I'm an Asian* 為合製主題，發想並分享各自的製作提案，即時性地接受所有師生的提問、挑戰與建議，並於會後共同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2016 年 5 月，又在台南舉辦了第二次的工作坊，主要進行製作提案的期中進度報告，同時也進行指導老師及其電影學校的觀摩放映。

Kim 帶來了 *Sangye-dong Olympics* (1988, 27 min.) 以及 *Repatriation* (2004, 148 min.)，前者紀錄的是由於 1988 年首爾舉辦奧運之故，政府以不美觀的理由強力拆除了 Sangye-dong 地區並迫遷當地的居民；後者則是紀錄了長期被關在韓國監獄裡、不肯接受改宗的朝鮮受刑人，以及他們最終被返還回朝鮮的歷程，兩者都透露出他對於紀錄片的理念，包括了製作「好」的影片而非「有趣」的影片，應將鏡頭對準黑暗角落、社會矛盾與弱勢群體，以及和被攝對象長期生活在一起的紀錄位置等等。

Yasuoka 帶來了 *311* (2011, 92 min.)，⁶日本 311 大地震發生二週後，森達也、綿井健陽、松林要樹與 Yasuoka 四位影像工作者進入災區，走訪了沿

⁶ Takaharu Yasuoka（安岡卓治），日本映畫大學教授，曾擔任原一男（*ゆきゆきて、神軍*）、森達也（*A、A2*）及多部紀錄片（*311*、*遺言—原宍さえなければ*）的製作、攝影與編集，關於 Yasuoka 的介紹，可進一步參考游惠貞（編）（2014）的專書裡藤岡朝子所撰〈日本獨立紀錄片二三事〉（頁 41-57）。

海的福島、岩手與宮城，紀錄下令人不忍卒睹的災後景象，其中一段再現的正是，悲傷至極的死者家屬因為紀錄者拍攝受難者屍體的鏡頭而感到憤怒，這個赤裸裸的視角，也引起了諸多的爭議與討論。

南藝大紀錄所則提供了【南進台灣】的放映，【南進台灣】是 1940 年代日本總督府支持製作的國策記錄映畫，透過環島一周的現實素材與解說旁白，逐步建構起南進政策以及台灣作為南進基地的帝國論述（蔡慶同，2012），在這樣的場合放映，引起了非常不同的觀看經驗與分享，例如對於同樣具備被殖民歷史經驗的韓國團隊而言，理解到歷史影像的維護保存對於去殖民乃是重要的；而日本團隊則是由此指認出負責解說旁白的牧野周一，在那個時代的重要性，及其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二、提案

Kim 所提出的合製主題：*I'm an Asian*，看來似是一個抽象、模糊與不清的方向，但其本意即是在鼓勵參與的各個師生團隊，能夠練習跳脫作為韓國人、日本人、中國人或台灣人的既定框架，試圖從作為亞洲人的新的視線，透過一個社會文化現象的觀察與紀錄，進行某種前導性研究（*pilot study*）的提問與思考。

因此，在此一問題意識的引路之下，四個師生團隊提出了下列的製作提案及其成果作品：

首先是 JIMI 的 *Return* (32 min.)，Yumoto Shigeru，獨自住在日本山村裡一棟 200 年以上的老房子，過著幾乎離群索居的生活，但是，今天導演為他帶來了一位訪客，Ye-eun Lee，則是來自首爾、藝術大學的女學生，就待在這間老房子裡，他們分享著各自的生命與家庭故事。

其次是 TNNUA 的 *Marching for You, Comrade* (17 min.)，2015 年，一群來自韓國 Hydis 的中年勞工，跨海來到台灣抗議母公司的關廠，而在台灣一群年輕的社會運動工作者，協助並參與了共同的抗爭，他們之間，雖說著彼此不懂的語言，卻可以合唱共同的歌曲——〔勞動者戰歌〕。

第三是 TONGI 的 *The Shadow Player*(20 min.)，李是一位皮影戲老師傅，他們也是縣裡最後一個皮影戲劇團，這是文化及其傳統在當代社會的共同命運，而為了想讓更多人了解並喜歡這個文化及其傳統，他們不惜爭取上電視的機會並到各大城市去巡演，最後，仍是無疾而終，他回到了家鄉，但還不服輸，準備再為鄉親朋友們努力組織一場皮影戲的表演。

最後是 KARTS 的 *Undercover Paradise* (20 min.)，Ina 和她的泰國同學 Jinny 一起參加了一個專為韓國觀光客所安排的泰國團體旅遊，在這趟旅途中，她們將會看見或看不見什麼樣的泰國呢？對於韓國人而言，也許這並沒什麼差別，但是，對於身為當地人的 Jinny 而言，這卻是非常詭異的經驗，而隨著旅途的展開，她們也越來越感覺到疲乏與不安。

三、論壇

針對四個師生團隊的製作提案及其成果作品，我們尚透過論壇的形式，試圖去澄清並詮釋它們與合製主題的連結關係，以及透過這樣的提案與影像，我們是否更能理解彼此之間共同與差異？乃至於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樣的亞洲？有無可以進一步去發展或延伸的論述及其觀點？

Jeon 即是將上述的製作提案及其成果作品，⁷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整合工作，他認為這四個短片都正好各自在回應，亞洲所正在面臨到的共同影響與力量，包括了西方的現代化、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商品的消費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等等，同時，它們大多也都處理到區域性的議題，或者採取了跨國性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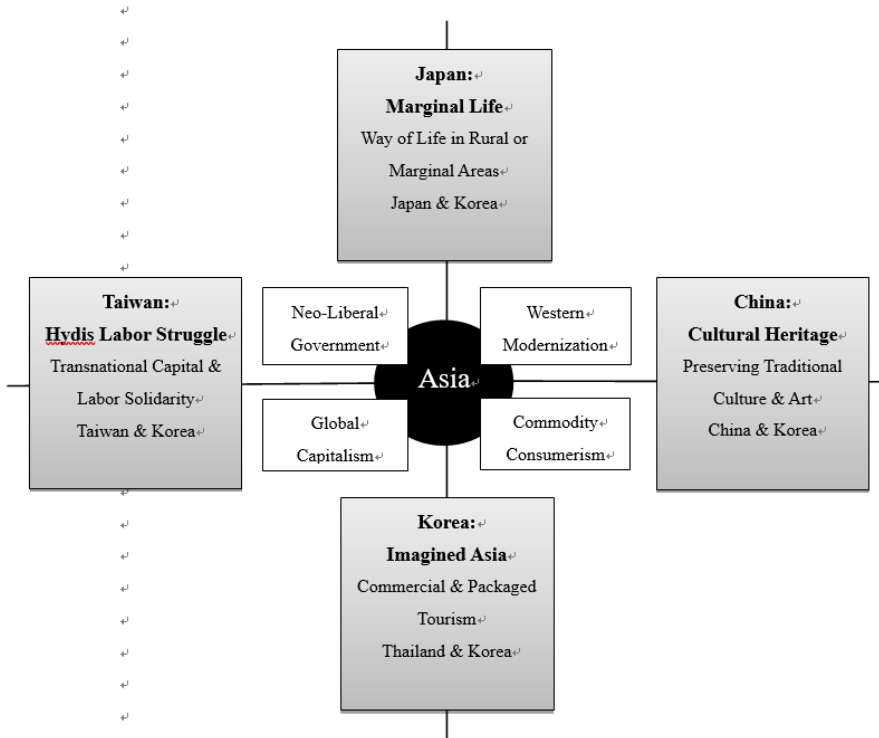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透過下面的圖來進一步表示，JIMI 再現的是分別來自帝國與殖民地的老人與女孩，他們在鄉間老房子討論生活、生命與生存方式的抉擇；TNNUA 藉由 Hydys 事件特別去思考跨界勞動抗爭的意義與可能性；TONGI 凸顯著快速工業化之下的傳統文化及其生活之共同命運；⁸

⁷ Gyu-chan Jeon (全圭燦)，韓國藝術大學教授，專長領域為媒體文化研究。

⁸ 在提案、指導與論壇的過程中，原本期待 TONGI 也能夠就「非遺」(非物質文化遺產，台灣稱為無形文化資產)，進行跨國的比較或對話，或者是在中國，它如何作為

KARTS 則是透過年輕女孩與本地朋友一起參加所謂的觀光團之旅，反射出我們平常是如何依循商品與消費的邏輯，在理解亞洲的他者及其地域。

圖一：I'm an Asian



資料來源：整理自”Asian Common Chord Penetration of Asian Docs Co-Production Network”, by Gyu-chan Jeon, 2016, *8th DMZ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Guild Book*, p.155.

2016 年 9 月，四個師生團隊就分別從這不同的面向切入，各自完成了 20~30 分鐘的紀錄短片，最後再整合為一部紀錄長片，於 DMZ Docs 首映，在會後的討論中，大多數人皆同意最終產出的內容形式當然是重要的，但更

國家的文化工程，紀錄片更在其中成為主要的方法，乃至收編並吸納了大量的資源，後來因素材及深度有限，最終版本呈現的仍只是一位皮影戲老師傅的故事。

大的成果卻是發生並累積於這一整年學生、教師與策展人之間共同成長，有鑑於此，並同步啟動了第二期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基於第一期的合製主題，似乎較為著重社會（空間）的現象，第二期的合製主題就暫訂為歷史（時間）的梳理。

參、越界／跨域的歷史

決定第二期合製計畫的主題之後，2017 年 3 月，我們又在首爾舉行指導老師群的專家會議，除了確認執行上的細節之外，還有了新的方向，例如：增加新的團隊，包括韓國龍仁大學（Yong In University，以下簡稱 YONGIN）以及雲南藝術學院（Yunnan Arts University，以下簡稱 YUNNAN）；基於這是一個教育過程的理念，希望工作坊不只是構想提案的發表或者是製作進度的報告，而更接近於研討、課程與教學的活動；同時把期程由一年拉長至兩年，希望透過更紮實的田野與研究，提昇影像本身的廣度與深度；並鼓勵跨師生團隊之間的合作共構。

更有意義的是，這次的討論過程，由 Yasuoka 與 Jeon 分別簡報了他們關於本次主題的思考，Yasuoka 分享了他多年來製作歷史相關紀錄片的經驗，包括了 *Okinawa no Harumoni* (1979, 86 min.)，⁹以及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 (1987, 122 min.)，¹⁰特別強調的是證據（evidence）的重要性，也就是紀實音像作為檔案及其文獻性質。

Jeon 則分享了一部短片，追溯日本最為知名的保險套品牌岡本（OKAMOTO），是如何利用二次大戰發跡、後遍及亞洲各個地域的歷程，以及利用兩張越戰時期的知名照片為例，進一步去聯想當時韓國與越南之間的可能連結，藉此特別強調的是發揮歷史的想像力（imagination）。

⁹ *Okinawa no Harumoni*，日文片名為沖繩のハルモニ，導演山谷哲夫，自 1977 年即開始尋找慰安婦，後來得知有一位現居住在沖繩的韓籍前慰安婦，並取得了重要的證言。

¹⁰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日文片名為ゆきゆきて、神軍，中文片名為【怒祭戰友魂】，導演原一男，跟著主角奧崎謙三，一一探訪戰友，並逐漸挖掘出吃人肉等等戰時的殘酷境況。

兩人的分享激發了不少的議論，尤其是我們即將要以紀實音像來再現所謂的歷史，那麼，它究竟是作為歷史的證據重要，抑或是需要發揮歷史的想像力？

一、觀摩

因此，2017年6月在臺灣南藝大，我們以「跨域／越界的歷史」（*Trans-/Cross- History*）為題，舉辦了第二期「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的第一次工作坊。

除了透過第一期合製計畫成果 *I'm an Asian* 的放映與討論，讓參與第二期的師生團隊及其成員理解這個計畫的動機、目的與過程之外，不同的師生團隊，又再帶來各自的作品，作為觀摩的對象，而身兼工作坊策劃人的筆者，亦特別邀請到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映後與作者面對面進行與談。¹¹

這些影像，包括了 KARTS 的 *Seven Years-Journalism without Journalist* (2017, 110 min.)、¹²*Thirty* (2016, 21min.)，¹³前者紀錄了自2008年以來被解雇的17位新聞工作者之抗爭歷程，以及對於金權掌控媒體的反思；後者則是30歲的作者關於自己家庭與未來工作的抒發小品。

YUNNAN 的 *My Name, My Family* (2012, 91min.)，¹⁴與 *An Oral History: About The Educated Youth of Mengsheng State-operated Farm* (2017, 58 min.)，¹⁵前者紀錄了作者從雲南到緬甸、尋找自己寸姓家族的尋根之旅；後者則是關於中國1960年代知青下鄉及其在國有農場的口述歷史。

¹¹ Hye-Mi Park (朴惠美)，DMZ Docs 策展人；Fan Wu (吳凡)，TIDF 策展人；Yow-Jiun Wang (王右君)，成功大學台文系副教授；Meng-Tze Chu (朱夢慈)，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Young-Ie Wuo (吳永毅)，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Horn-Yi Chen (陳泓易)，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副教授；Jisu Klaire Yoo (柳志受)，龍仁大學教授。

¹² 作者 Jin-Hyuk Kim (金進赫)，韓國藝術大學教授。

¹³ 作者 Hye-Rin Lee (李蕙璘)，韓國藝術大學研究生。

¹⁴ 作者 Xin Li (李昕)、Xuan Cun (寸炫)，雲南藝術學院講師。

¹⁵ 作者 Yi-Fei Zhou (周怡霏)，雲南藝術學院學生。

TNNUA 的 *The Prisoned Island* (【囚·島】) (2012, 112 min.)，¹⁶紀錄了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陳孟和，如何憑藉著記憶與老照片，重新還原當年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地景與歷史。

JIMI 的 *The Will: If Only There Were no Nuclear Power Plant* (2015, 225 min.)，¹⁷這部影像彙集了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 800 天的影像紀錄，並重新編成為 3 小時 45 分鐘的紀錄片。

YONGIN 的 *Hard-boiled Wonderland* (2014, 32 min.)，¹⁸與 *The Close Family* (2014, 34 min.)，¹⁹以及 *Let's go SPENEW!* (2016, 21 min.)，²⁰前者是以實驗性的手法，透過當代日本社會的生活紀實，穿插並交織歷史的影像，進行某種跨時空的對話與呼應；第二部片是以家庭的照片與影像為主，講述作者自己離散的家族故事；第三部片則是關於一個高中啦啦隊的故事。

Kim 也帶來新片 *Jung Il-woo, My Friend* (2017, 84 min.)，透過自己多年來的隨身紀錄，紀念一位剛剛過逝、卻影響他拍攝紀錄片深遠的外國神父之生命故事。

除此之外，延續在專家會議中關於紀實音像究竟是作為歷史的證據或歷史的想像力之爭議，筆者特別邀請了兩部影像作為焦點放映，也就是 *3 Islands* (【三島】) (2015, 64 min.) 與 *Letter #69* (【第 69 信】) (2016, 20 min.)。²¹

前者跟隨藝術家探訪了諸多在台灣、沖繩與濟州等地重要的歷史場景，透過文字、敘事與聲音進行了重新的組織，試圖尋找他們在戰後的不同命運之中，所可能具備的同質性之歷史肌理；後者則是以白色恐怖受難者施水環在獄中的家書為核心，尤其是她受死刑前、幾乎空白的第 69 信，試圖以影像的方法去再現這封看不見的書信及其歷史。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在處理一個歷史的主題，在 *3 Islands* 中，充滿了各種證據性的影像，而藉著想像力，作者連結起東亞三島之間的關係；但反過

¹⁶ 作者 Ji-Xian Zeng (曾吉賢)，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¹⁷ 作者包括了 Naomi Toyota、Masaya Yoda、Takaharu Yasuoka 等人。

¹⁸ 作者 Wook Steven Heo (許旭)，龍仁大學教授。

¹⁹ 作者 Da-Hee Yun (尹多曦)，龍仁大學研究生。

²⁰ 作者 Ji-Hyun Kim (金智賢)，龍仁大學學生。

²¹ 作者 Hsin-I Lin (林欣怡)，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來說，在 *Letter #69* 中，面對空白的家書，作者卻是透過想像力的再現，去具體化受難者的心理與歷史的真實。

正如 Croce 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也就是說，歷史作為紀錄片合製的主題，雖是作為檔案的意義，然而，檔案無法回歸真實的過去，檔案與記憶之間亦非一對一、不變的對應關係，但是，沒有檔案就無法記憶，這個檔案化的行動，提供的是碰觸真實的過去的記憶之可能性 (Derrida, 1996)，因此，它還需要一定的想像力，或者說是某種觀點，去連結亞洲及其各個地域，以及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從而能夠這些素材與經驗進一步政治化 (politicising)、問題化 (problematising) (郭力昕, 2014)。

二、提案

第二期的合製主題雖是「歷史」，但其實更鼓勵的是具有「越界」或「跨域」意義的主題內容或製作方法，因此，重新組合而成的五個師生團隊，遂發想了下列的製作提案：

首先是 TNNUA 所提出的 *Look Back to Our Island*，導演 Ella，是一位南藝大紀錄所的研究生，她在某一場反戰運動的論壇上，認識了嫁到濟州島、並以藝術參與和平運動的 Emily，開始認識發生在當地的四三事件，²²以及接觸到反美軍基地的運動，這些經驗，也讓她開始回顧起自己的故鄉——金門島，它也曾是軍事重地，如今則成為觀光地點，未來甚至還可能會變成賭場，以及自己的父親，是如何經歷軍事戒嚴，並從一位軍人退伍後成為民宿老闆兼導遊的家庭史，還有自己和父親之間關於戰爭與和平不同之觀點。

其次是 YUNNAN 的 *Home Faraway*，1950、60 年代陸續撤退來台的滇緬游擊隊，最為人所知的聚落即在清境農場，儘管，已有諸多文字、影像甚

²² 濟州四三事件 (제주 4·3 사건)，發生於美國軍政時期至大韓民國第一共和時期，起因於戰後初期的各種複雜之社會問題，它以 1947 年 3 月 1 日警察的開火事件為起點，歷經 1948 年 4 月 3 日由南韓勞動黨濟州島黨部武裝隊的武裝起義，到 1954 年 9 月 21 日漢拏山禁足全面開放為止，在武力衝突以及鎮壓過程之中更造成許多居民犧牲。

至紀錄片，²³再現了他們的故事，然而，對於雲南的師生團隊而言，這卻是一個之前完全陌生的群體，因此，他們想重新透過雲南的觀點，追問這群人的流離之歷史，包括了雲南對他們而言是什麼？他們為何頻繁地來往台灣及雲南之間？三個世代之間是否有著不同的記憶與認同？更重要的是，我們往往看到的是男性的口述歷史，那跟著滇緬游擊隊過來的女性們，她們的記憶又是如何？²⁴

第三是 JIMI 的 *LEFT*，位於橫濱的中華街，乃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城，但是，在同一個中國城裡，卻生活著各自支持中國與台灣的海外華人，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兩造一直存在著競爭、甚至衝突的關係，例如曾經發生過的橫濱中華學校事件，²⁵因此，在這個提案裡，作為日本學生的他們（其中一位具有華人血統），想要去紀錄老一輩人的記憶，也同時想要探索當代中國城的生活面貌。

第四是 KARTS 的 *Class V Supply*，我們所熟悉的慰安婦，大多是指二戰期間被日本帝國主義強押的殖民地婦女，包括了台灣、中國與東南亞各地，然而，近年來，在韓國卻有了新的研究指出，²⁶在韓戰期間，韓國軍隊也曾經沿襲了類似慰安婦的作為，這個新的歷史證據，無疑是高度敏感的，然而，透過這段歷史的追尋，我們也更能夠確實體會到，慰安婦不只是作為

²³ 柏楊的小說【異域】，朱延平的電影【孤軍】，羅大佑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李立邵的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紀錄片【邊城啟示錄】、【南國小兵】與【那山人這山事】，吳秀雀的民族誌《春辣椒的滋味：清境義民人群之認同內涵與變遷》，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的專書《從異域到新故鄉：清境社區五十年歷史專輯》。

²⁴ TONGI 因製作提案與合製主題差異較大又無法臨時更換，故暫時退出第二期的合製計畫，相較於 TONGI 的傳媒教育體系，YUNNAN 則是來自於雲之南影展、雲大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1999 年設立，與德國哥廷根科教電影研究所、基爾大學合作培訓）、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社區影像培力）等等的背景脈絡。

²⁵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也連帶使得海外的中國城之內部發生磨擦，位在橫濱中華街上的中華學校教室內，張貼公佈學生的作文中有「解放」這兩個字，當時台灣與日本還有邦交，台灣考察團看到後，就以為學校實施共產教育；1952 年，遂封鎖學校並驅離支持中國大陸的學生，以此事為分水嶺，後來分成大陸派的橫濱山手學校以及台灣派的橫濱中華學校。

²⁶ 進一步的資訊可參考 *Who was taken to the South Korean comfort women* ([Interview] Kim Gwi-ok Professor of Religious Affairs) (見 <http://www.pressian.com/news/article.html?no=122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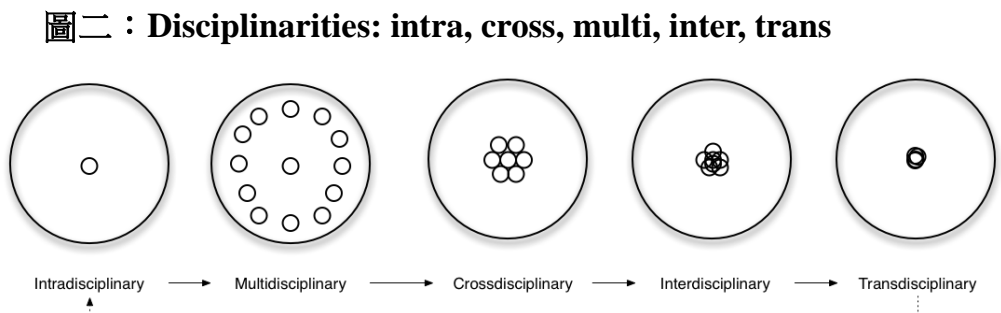
國仇家恨的象徵，更是殖民主義、父權社會與性暴力下的產物。

最後是 YONGIN 的 *Bossy Girls*，在某些方面依然保守或傳統的韓國社會裡，近幾年來，針對若干社會和政治事件，許許多多女性主義運動者，藉由新的網路媒介進行串連，²⁷發起了一系列的組織與活動，被稱之為網路女性主義運動（Net Feminists），導演 Da-hee 和 Ji-hyun，她們想要透過自己的親身參與，對此作一個了解，同時，也想進一步去認識亞洲其他地域裡類似的社會運動現象。

三、論壇

從「跨域／越界的歷史」(*Trans-/Cross- History*) 成為合製的主題，到各個師生團隊開始構思並提出上述的製作提案，我們在幾次論壇之中，更加關注的是：為什麼要以「歷史」為名？這個「域」(Boundary) 或「界」(Border) 究竟是什麼？而「跨」(Trans-) 或「越」(Cross-) 的方法又有哪些的可能性？

在尋找上述提問與答案的過程之中，筆者發現了下列這樣一個可供參照的心智圖，並仿效 Jeon 在工作坊中提出整合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Disciplinarity: intra, cross, multi, inter, trans”, by A. R. Jensenius, 2012(March 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j.no/tag/multidisciplinary/>

從這個心智圖可以發現到，它原本是用來表示在人文、藝術與社會的

²⁷ 例如像是 DSO 或 Womenlink。

領域，不同的專業或學門之間，如何跨域或越界進行合作研究的各種可能模式：

一是“**Intra-disciplinary**”，它意指我們往往習慣於固守在單一專業或學門的立場與觀點；二是“**Multi-disciplinary**”，它意指來自不同專業或學門的人在一起工作，但仍舊只是各自運用他們熟悉的知識，來分析同一個現象；三是“**Cross-disciplinary**”，它意指我們開始學習從不同專業或學門的觀點，來看待一個特定的專業或學門；四是“**Inter-disciplinary**”，它意指除了並列或並置之外，我們還能夠初步整合來自不同專業或學門的知識與方法；五是“**Trans-disciplinary**”，它意指真正創造出一個足以超越各個專業或學門觀點的總體性之知識框架。

我們不妨就將這個心智圖的專業或學門（**disciplinary**）之字眼，置換成第二期合製的主題，也就是所謂的歷史（**history**）：

因此，“**Intra-history**”就如同我們習以為常地以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疆域的歷史；“**Multi-history**”則意味著我們開始意識到亞洲其他的地域之存在，但仍然是一個一個、分開看待的歷史，而這幾個製作提案，都已開始嘗試透過個體或社群的身體、記憶及其印記，挑戰或質疑上述的檔案法則及其權力關係（**Derrida, 1996**）。

TNNUA 與 **YUNNAN** 的製作提案，已接近於“**Cross-history**”的方法，他們皆從不同地域的角度及其對話，來看待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或過程；**JIMI** 則是凸顯了兩種以上的歷史觀點如何並存甚至整合於共同的中國城之時空裡，頗有“**Inter-history**”的味道；最後是 **KARTS** 與 **YONGIN**，他們所探討的對象雖都較為個別性，但背後卻有“**Trans-history**”的可能性，也就是企圖發展出更為整合性之觀點，來反思我們既有的歷史認識，尤其是從女性觀點重構歷史（**Her-story**）的企圖心。

2017 年 9 月，假第九屆 **DMZ Docs** 期間，我們舉辦了第二期合製計畫的第二次工作坊，延續五個師生團隊的製作提案，本次工作坊主要是檢視各自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成果，仍舊歷經了包括提案、問題、討論與指導的幾個階段，並特別針對製作提案的需求，安排了兩場專家學者的論壇。

包括了 Jeong 以 *The Way towards an Asia's Peace Citizen* 為題，²⁸主講亞洲的和平議題為何與個人生命有關？為何亞洲只存在國家而沒有公民，我們往往只捍衛國家的利益，而非無國界的正義與和平之立場？建構所謂的亞洲和平公民之意義何在？以及 Bae 以 *Women Being in Asia after All These Years* 為題，²⁹梳理了亞洲女性的聲音與再現之歷史脈絡，包括了從亞洲女性主義電影，例如卞英珠的漫漫哀傷三部曲，³⁰到當代的網路女性主義之發聲。

肆、教育過程及其行動研究

除了上述可見的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成果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教育過程之中，刺激並引發我們不斷重複地去反思、質疑與爭論下列的這些問題：為什麼我們無法滿足於紀錄片製作的現況，而需要跨越疆域或邊界去關注所謂的亞洲？亞洲的區域性又究竟意味著什麼，所謂的亞洲性（Asianess）是否真的存在？「亞洲」，究竟能不能成為一種新的紀錄片方法論？

在這裡，我們不妨就以一個電影學校學生或紀錄片工作者，如何產出一部紀錄片的常規歷程作為參照與比較，在教科書裡（李道明，2013），從前期製作的發想（動機、主題、內容與目的）、製作期的拍攝（影像與聲音的取得）到後期製作的剪輯（結構與觀點的建構），它乃是一個從問題意識（Why）、文獻回顧（What）到研究方法（How）的探索過程。

首先，就前期製作的發想來說，不外乎就是題材及其對象的發掘或尋找，通常，我們會從自己身邊或熟悉的生命經驗、社區生活或社會現象中出發，這往往是再自然也不過了，當然，也是最為恰當的。

然而，紀錄片作為「關於現實的創造性處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the

²⁸ Jeong, Da-hun, Research professor of Sogang University China Institute。

²⁹ Bae, Ju-yeon, Lecturer of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³⁰ 卞英珠 (변영주、Byun, Young-Joo)，1990 年代韓國重要的女性紀錄片導演，自 1995 年開始，陸續完成了慰安婦三部曲，包括了【慰安婦悲歌】(*The Murmuring*) (1995, 93 min.)、【漫漫哀傷】(*Habitual Sadness*) (1997, 71 min.) 及【我的氣息】(*My Own Breathing*) (1999, 77 min.)。

actuality”) 或者「再現真實」(“representing reality”), 所謂「現實」或「真實」, 往往隱含著如此的前提, 也就是社會等同於民族國家, 我們更假設它是一個具有同質性的生活世界之基本單元, 由此, 我們竭力地去探究內在於這個疆域或邊界之內的資本、民族、權力、勞動、貧窮、抗爭、歷史等等各式各樣的問題。

藉著「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的教育過程, 對於師生而言, 首先能夠獲致的改變, 即是意識到亞洲及其各個地域的存在或存有, 而透過這樣的對話, 從而反思到自身為何? 以及自身與亞洲及其各個地域、內在與外部之間的關係, 換句話說, 正是基於意識到這樣一個區域性的存在或存有, 包括了歷史的時間與地理的空間等等面向, 我們才得以進一步質問並挑戰題材及其對象的疆域或邊界之預設或前提。³¹

舉例而言, 在上述觀摩、提案與論壇的過程之中, 最常出現的話題往往是: 關於這類題材及其對象, 在我們那兒也曾經發生, 哪些面向是一樣的? 哪些面向又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關於題材及其對象的問題意識, 可以不再慣常性地是以民族國家內部, 或者直接跳躍到廣泛的歐美西方, 作為參照與對話的他者。

同時, 即便是針對一個相當在地性的題材及其對象, 如果我們深究其歷史與脈絡, 也可能會發現到它與亞洲及其各個地域可能的連結關係, 正如 Jeon 曾經作過的示範, 他以世界知名的半導體產業基地新竹為例, 重新建構了一個跨越疆域或邊界的史觀, 例如新竹的長程預警雷達如何與日本、韓國的薩德佈署連結成為美國反導彈的網絡? 而新竹的空軍基地歷經日殖、冷戰的不同時期又如何與亞洲發生關係? 它曾經是日本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基地, 因此, 諸多日本人都留下了關於新竹的戰爭記憶, 以及也曾經有韓籍慰安婦在此地深受創傷。

當然, 我們也可以由此進一步去追逐或發掘具備全球化脈絡或跨國軸線的題材及其對象 (邱貴芬, 2016), 換句話說, 由於意識到疆域或邊界的前

³¹ 例如台灣主流紀錄片如何以「台灣符號」或「愛台灣」作為基礎, 從而不斷地再現「感性」與「濫情」的國族性格 (郭力昕, 2014)。

提，轉而能夠發揮亞洲性或區域性的想像力，重新看待自己的題材及其對象，而這類的想像力，可能是差異的比較、共同的議題，也可能是連結的關係、歷史的重構。

其次，在意識到題材及其對象可能存在關於疆域或邊界的預設或前提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將是：那我們要如何去認識並理解所謂的亞洲性或區域性是什麼？而它將會引導著我們製作期的拍攝，包括如何取得影像與聲音，以及要取得什麼樣的影像與聲音？

關於亞洲及其各個地域，第一種可能的認識，仍然是具備有國族主義及其情結的，也就是我們仍然習慣依循著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的後殖民狀態，來認識所謂的亞洲性或區域性，那麼，亞洲性或區域性就只是一個一個、被劃分的國家所組合而成的簡單集合體。

第二種可能的認識，則是複製了西方世界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王志弘等譯，2000），從最早關於遠東（Fareast）的想像、冷戰時期的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y），到東亞四小龍、東南亞與南亞的經濟體，彷彿亞洲的歷史及其起源，都是由西方世界因殖民需求才開始「出現」或「發現」的，而它的認識及其框架，也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定義的。

第三種可能的認識，則是從大東亞共榮圈的興亞論開始，它不只存在於日本帝國主義時期，即便是在後殖民時期，這個精神結構的潛意識，已從政治、軍事的統制，轉化成為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邏輯，包括了 1990 年代台灣的南向政策，就被批判為南進政策的翻版（陳光興，2006），以及它發展作為次、亞或邊緣帝國的想像（魏玟，1997），乃至於當代韓流文化產業背後的思維結構，以及中國崛起後一帶一路、孔子學院所代表的天朝秩序及其文明觀。

換句話說，認識並理解亞洲性或者區域性是什麼，可以有更為不同的路徑或策略，藉由這類觀點的不斷開發，包括性別的、族群的或階層的，它就是一個不斷重新繪製地圖的過程，而在重新繪製地圖的過程之中，³²我們得以透過彼此的比較與對話，持續發現到同構與分歧、普遍與特殊，不斷形構

³² 例如《季風亞洲研究》（*Journal of Monsoon Asian Studies*），也是另外一種重新繪製地圖的方式（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onsoonasiastudies/fa-kan-ci-1>）。

與解構去殖民和超越國族的認同界線，單數、大寫的亞洲（Asia），因而成為複數、小寫的亞洲（asias）。

最後，才是方法及其美學的層次，或者可以說是如何透過後期製作的剪輯，去建構影像的結構與觀點，紀錄片，無論是作為嚴肅社會分析的表達，或者是作為歷史現象批判的論證，都涉及到作者在傳達其分析和敘事時，如何選擇適當的方法及其美學之再現形式，反過來說，所謂「最好的」方法及其美學，正是最能夠表達自己觀點的再現形式。

也就是說，表達是一種態度、一種政治態度的再現，而方法並非美學風格的僕人，卻是美學風格的基礎，近年來，關於亞洲紀錄片缺乏形式實驗的批評不少（邱貴芬，2016），也許這正提醒著我們，並非是倒果為因一味地去追求美學風格的形式實驗，反而是意味著我們需要不同的政治態度及其方法。

在「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的教育過程之中，尤其是透過製作提案的觀察，在第一期裡，我們可以發現到，它們再現了亞洲及其各個地域，尤其是內部的不同社會群體所共同面對到的多重被壓迫結構；在第二期裡，我們則是可以想像到，在亞洲及其各個地域中，其實是某種多重的時間與多重的空間之共存，它們彼此往往是交錯、重層、穿越的性質。

面對後殖民的知識狀況（在文化研究、全球化論述與亞洲研究），陳光興（2006）是以亞洲作為方法，進行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的工作，而面對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從教育、製作到影展），以亞洲作為紀錄片的方法論，則是對於所欲處理的現實或再現的真實，具備反思其背後隱而未現的預設或前提之意識，它可能是以西方作為圭臬或對抗的，可能是本土主義、國族性格的，也可能是另一種帝國的想像及其複製。

因此，亞洲內部不同的社會，能夠作為彼此之間的參照或對話，尤其是面對並理解殖民、冷戰與帝國的經驗、矛盾及其遺緒，進一步開啟 Jameson（1984）所謂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的可能性，此一新的認知繪圖，結合紀錄片的影像，成為某種美學再現的政略，它不僅是使得個人能夠標示出在社會與世界裡的新的位置，也認識到自己是作為一群共同的主體（尤其是各個地域之內所存在的「第三世界」），並重新取得「看見」此一結構或體

系的能力。

伍、結語

正如上述，在正式的觀摩、論壇、提案與映演活動，以及非正式的互動、分享與交流的過程之中，這個來自不同地域的師生團隊，所形成的群聚網絡及其社會關係，不單單只是為了服務於一個特定合製計畫的完成，它更儼然成為一個跨越疆域或邊界的教育性平台，或者說是紀錄片學校。

最基本的當然就是，來自不同地域的師生團隊之學生們，藉此建立起有如同班同學一般、互相勉勵的情感與支持，除此之外，它也與其他的紀錄片製作基金不同，他們並非處於某種個別之間的競爭關係，而是同屬於一個合製計畫，從而具備有合作共構的必要性及其精神。

而來自不同地域的指導老師與策展人，彼此之間，同樣也建立起像是學術研究或實務製作的同僚關係，我們在作品的觀摩中，分享或同或異的影像教育方法，在論壇的討論中，釐清各種類型的紀錄片觀念，而在提案的審查中，則無不盡力從不同的面向給予學生們改善的建議。

換言之，無論是對於學生、教師或策展人，「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就有如是一個教育性平台或紀錄片學校，任何一位教師或策展人，都可以說是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生之指導老師，而任何一位學生，也都可以說是來自不同地域的指導老師之學生。³³

過去的所謂合製，實際上多比較像是合資，而紀錄片的基金，也多比較像是對於個別製作計畫的支持，經過兩期已完成或進行中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則是企圖發展出一種實驗性的影像教育方法，雖然在時間、空間與資源的限制之下，還停留在分別製作的階段，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已經為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打下了基礎，未來將可進一步朝真正的協同製作再向前邁進。

然而，要具體實踐出真正的協同製作，仍有賴於一系列的紀錄片課程或

³³ 我們往往自我定位在亦師亦友的“mentor”，而非上下指導的“advisor”。

訓練作為基礎，這包括了對於紀錄片作為一個學門的本體、知識與方法，是否具備有相同的共識？關於不同地域的紀錄片脈絡及其發展，是否能夠有基本的認知，並由此認識他者的社會？來自不同背景的紀錄片工作者，如何透過長期的工作營隊而不只是短暫的工作坊，提供其團隊合作、集體共構的機會？

除此之外，如果粗略歸納參與觀察的經驗，在第一期的合製計畫，著重的是社會的空間，較為強調亞洲所面臨到的共同境遇；在第二期的合製計畫，則傾向於強調歷史的時間，更加關注地域之間分斷甚至是對抗的經驗，那麼，所謂的「聲響」，包括了各種的聲音（sound）、話語（voice）或噪音（noise），或者可以成為未來合製計畫的主題方向。

對於來自不同地域的師生團隊而言，在工作坊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除了視覺的影像之外，聽覺的「聲響」往往是最能夠引起共鳴或聯想的，例如上述所提及的【南進台灣】之解說詞、〔勞動者戰歌〕與 *Marching for You, Comrade* 之間的連結，以及在 *The Prisoned Island* 【囚·島】的觀摩中，我們又發現到同一首歌曲，卻有著不同語言的版本及其使用意義。³⁴

也就是說，這樣的主題方向，更具備有進一步跨越疆域或邊界、彼此合作共構的潛力，舉例而言，從特定的「聲響」出發，來自不同地域的師生團隊，得以同時考察它在不同地域的起源、變體及其意義。

參考書目

- 子安宣邦（賴俐欣等人譯）（2008）。〈「亞洲」這條抵抗線的可能性：省思東亞的近代〉，《文化研究》，6: 58-77。
- 王志弘、王淑燕、郭莞玲、莊雅仲、游美惠、游常山譯（2000）。《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原書：Said, W.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白永瑞（2009）。《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社研雜誌社。
- 竹內好（2007）。〈作為方法的亞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6: 231-251。

³⁴ 千の風になつて（千風之歌），原詩名為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聚會時，尤其是有難友過世之際，時常一起吟唱。

- 汪暉（編著）（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道明（2013）。《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台北：三民。
- 邱貴芬（2016）。《「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孫 歌（1999）。〈亞洲意味著什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 1-64。
- 郭力昕（2014）。《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台北：麥田。
-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 游惠貞（編）（2014）。《紀錄亞洲》。台北：遠流。
- 蔡慶同（2012）。〈《南進台灣》：紀錄片作為帝國之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 99-132。
- 蔡慶同（2017）。〈紀錄作為創傷的療癒：從《赤陽》、《漫漫哀傷》到《怒祭戰友魂》〉，《傳播研究與實踐》，7(1): 181-205。
- 魏玠（1997）。〈斷裂的邊緣，不變的帝國：對「邊緣帝國」的回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4: 171-184。
- Derrida, J.(1996).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Eric Prenowitz,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Jameson, F.(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3.

**“Asia” as th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r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Asia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Project” and its Workshops**

Chin-Tong Tsai^{*}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present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eport on “Asia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Project” and its workshops from September, 2015 until now. As one of founders and mentors, the author regards not only formal screening, pitching/mentoring and forum, but also informal interaction,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some kind of educational process.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viewpoint, this paper tries to conclude these valuable experiences.

Keywords: Asia, action research, co-production, educational process,
documentary

* Tsai, Chin-To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Documentary & Film Archiv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e-mail: tonytsai@tnua.edu.tw

附錄：「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暨工作坊活動一覽表

時間	地點	主辦	活動內容	參與成員	觀摩人數
2014 年					
9 月	首爾	DMZ Docs	會外會論壇	5	10
2015 年					
9 月	首爾	DMZ Docs	1.電影學校學生作品 觀摩 2.亞洲合製論壇	15 (KARTS/JIMI/TO NGI/TNNUA/DMZ /TIDF/SIFF)	15
2016 年					
2 月	首爾	KAR TS	合製工作坊(製作提案 發表、亞洲合製論壇、 簽署合作備忘錄並由 DMZ Docs 提供製作 資金、工作會議)	15 (KARTS/JIMI/TO NGI/TNNUA/DMZ)	--
5 月	台南	TNN UA	合製工作坊(期中進度 報告、電影學校教師作 品觀摩、亞洲合製論 壇、工作會議)	15 (KARTS/JIMI/TO NGI/TNNUA/DMZ)	10
9 月	首爾	DMZ Docs	1.第一期合製成果公 映 2.第二期合製主題討 論	20 (KARTS/JIMI/TO NGI/TNNUA/YUN NAN/DMZ/TIDF)	30
2017 年					

3 月	首爾	DMZ Docs	指導老師群會議(第二期合製主題、執行方法與進度討論)	10 (KARTS/YONGI N/JIMI/TNNUA/Y UNNAN/DMZ)	--
6 月	台南	TNN UA	合製工作坊(製作提案發表、電影學校師生作品觀摩、亞洲合製論壇、工作會議)	20 (KARTS/YONGI N/JIMI/TNNUA/Y UNNAN/DMZ/TID F)	30
9 月	首爾	DMZ Docs	合製工作坊(期中進度報告、專家學者演講、簽署合作備忘錄並由 DMZ Docs 提供製作資金、工作會議)	20 (KARTS/YONGI N/JIMI/TNNUA/Y UNNAN/DMZ/TID F)	30

拆解有實而無形的審查刀鋒：
評介區家麟著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杜耀明*

書 名：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作 者：區家麟

出版日期：2017 年 8 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引用格式

杜耀明（2018）。〈拆解有實而無形的審查刀鋒：評介區家麟著《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傳播、文化與政治》，8:191-198。

投稿日期：2017 年 12 月 16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2 月 10 日。

* 作者杜耀明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退休教授，現為《自由亞洲電台》和《明報》的專欄作者，並兼任教職及研究新聞自由的法律問題。包括今年在內，曾五度由香港外國記者協會、香港記者協會、國際特赦組織三方每年主辦並頒發的「人權新聞評論大獎」，e-mail:s60675@associate.hkbu.edu.hk。

—

由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的前後開始，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行為一直被視作一大威脅，直接損害新聞自由。除了監察新聞自由的海內外組織對此深表關注，定期報告有關情況，不少學術文章亦從不同角度，探討新聞自我審查的一些問題。不過，這些追蹤報告和學術探討，或流於實事記錄，欠缺前因後果和制度因由的分析，又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沒有全面剖視審查的招式套路及其來龍去脈。由是觀之，區家麟博士新作《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下稱《二十道陰影》）的出版正合其時，填補了事例紀實和專項研究的不足。全書以新聞自我審查為研究焦點，觀念分析和實證蒐集互相配合，以築構一個多元綜合的詮釋架構，並據此從多角度和多層次探討自我審查的根源、助力、手段、後果等等。下面先評述一下此書的研究目的、內容和特色，再簡略提出一些問題，以拋磚引玉。

這本專著的副題——「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語道破研究的目的，就是以自我審查為線索，解破香港新聞界「有自由無自主」的謎團。作者認為，香港並無由政府禁制言論的「操控式審查」（regulative censorship），但不少新聞從業員卻慨嘆無法發揮法律賦予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因為他們四處都是「無形的枷鎖」，令大家壯志未酬，而這些枷鎖，正是指那些源自新聞機構內部的自我審查行為，從不同方面處處設限，無日無之。

《二十道陰影》根據作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全書以香港廣播新聞為研究對象，分為六個篇章，核心部份是第二及第三篇。前者以理論和事實，破除對新聞標榜客觀中立的誤解，也介紹一些決定新聞報導取向必不可少的因素。後者結合分析觀念和新聞從業員的實踐經驗，從新聞工作的規範系統、文化認知系統和管控系統三方面，重新審視新聞判斷的理念標準、日常工作的常規慣性、機構高層對新聞部的管治措施，從而認定造成新聞審查的二十種行徑，亦即書名提及的「二十道陰影」。接着下來，第四篇以兩個案例，說明這些審查行徑的運作和影響，而第五篇通過理論和實例，探討抗衡審查的可能性，最後是總結篇。

此書研究的起點是自我審查問題。不過，自我審查的行為向來不容易確

認，因為根據作者的分析，這類妨礙新聞自由的行徑，共同特質是刻意違背新聞的專業判斷，目的是求趨吉避凶。困難是，自我審查的意圖往往無法證實，一些疑案由於取證不足，最後不了了之，而一些審查行為不少是例行公事，並無明確目標可言。因此，單是確認審查事例已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更不要說進一步的分析了。

由於採證困難，自我審查疑案往往無從水落石出，研究必須另闢蹊徑，否則便會走入死巷。作者認同法國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想法，以更廣闊的視野，從機構的整體運作去捕捉審查的不同來源和手段。布迪厄認為，現代社會不必用法律手段去約束以至禁制傳播的內容，而是通過有關機構控制「表達的渠道與表達的形式」（access to expression and form of expression），從而限定表達的內容。這種以機構組織的措施和共識，去管控新聞報導的運作，無須直接控制內容，卻可發揮審查效用，作者名之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用作者的說話總結，這是「一套支配編採方針的制度規律，建構各種規範、守則，及其詮釋與執行，從而促成一套編採方針，以不作為、忽略、無視、淡化、扭曲、轉移焦點，以至透過話語之選擇，把新聞內容導向有利於建制。」

二

有別於「操控式審查」，「結構式審查」不用粗暴手段謀殺傳媒內容，而是通過新聞機構不同部門的分工合作，由最高層主理的資源調配、獎懲制度和人事任命，再到新聞部決定的採訪常規和節目形式，以至日常新聞判斷所倚賴的專業規範和價值觀念，都可用作審查手段。這些舉措無審查之名，卻有審查之實，也使惡行昭著的自我審查變得無影無形，安然隱身於機構日常運作之中。既然「結構性審查」才是問題的關鍵，《二十道陰影》用上四成篇幅，詳盡論述，綜合新聞理論和廣播新聞從業員的訪談資料，得出二十種常見的「結構性審查行徑」，並分析其效用（表一）。這二十種行徑，按照社會學家 W. Richard Scott 的理念劃分，再歸為三類，即規範系統、文化認知系統和管控系統，從三方面共同撐起一個侵犯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

規範系統的重要性在於確立行事的標準、規則，在新聞工作而言，就是新聞判斷、採訪方法的專業依據和基本態度。作者研究發現，新聞機構通過曲解和誤用新聞原則，以六種方法，減弱、中和、扭曲以至埋沒反對政府的聲音，或者那些令當權者感到不方便的真相。例如 2014 年持續 79 天的雨傘運動，三個地區的主要街道被市民佔領，但有電視台主管表明不會報導佔領區內的好人好事，因為該運動離經叛道，是違法行為，只能報導佔領區內的衝突和混亂。在日常的採訪中，新聞機構奉客觀中立為神靈，重大新聞事件在前亦按兵不動，也不鼓勵調查報導追究真相，為的是保持客觀，避免製造議題。又例如採訪個別事件，報導反對政府聲音時，必須加入建制派或官員的觀點，以示平衡。不過，新聞主管往往雙重標準，平衡原則並不適用於以訪問官員居多的新聞訪談節目，亦不適用於報導官方消息，因為官員位高權重，也假定了他們信實可靠，不論公開發言或私下傳話，都會清心直說。凡此種種行事法則，表面上是客觀持平，實質上使「新聞的面貌傾向了權貴的利益」。

如果說規範系統為新聞從業員設置行事準則，文化認知系統限定了從業者的生活規律、身份角色和工作期望。根據作者的分析，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和 24 小時新聞的出現，新聞編採較前更追求速度和數量，也導致報導工作的分工愈趨細緻，以至流於機械化、碎片化。記者每日只能按上方的指示工作，疲於奔命，再無餘力發掘新聞。另一方面，新聞部管理層標榜多元化，以民生故事服務大眾，同時又注重增加收入，把不少心思和資源投入拍攝資訊節目，或者製作與投資相連的各類財經節目，以方便找冠名贊助。在疲不能再的工作環境和營商主導的製作方針下，記者自主空間狹小，自覺身不由己，工作行禮如儀，新聞機構監察時政的力量自然大打折扣。

與上述兩大系統有別，管控系統並不直接涉及新聞報導，但機構高層可用資源調配、人事任免、獎懲制度，控制新聞室的操作，更在必要時直接干預。作者指出，新聞部資源不足，人手收縮，不但令調查報導或專題採訪寸步難行，也可以財政理由避免採訪敏感題材，並較多運用政府訊息，放大建制的聲音。再者，人事政策亦可多管齊下，管理層一面提拔觀點相近者出任重要職位，一面把不服從的員工投閒置散，並且小心調配記者的採訪任務，

把政治新聞交給可以信賴的同事，又多聘請新人，既省開支也較為聽命。簡單說，管控措施是以資源、人事、權力決定新聞工作的大局，杜絕新聞報導走向管理層不認可的方向。

在三大系統夾攻下，記者自主性降低，接觸政治敏感議題的機會也減少，即使記者接觸了，也無權或缺資源深入採訪，並不會出現可供審查的報導。若據傳統「自我審查」的定義看，審查並不存在，也就無可以追究之處了。不過，若以此綜合的詮釋框架觀照一下，即使自我審查的現象已經消聲匿跡，源自規範系統、文化認知系統、管制系統的審查力量，卻無所遁形，昭然若揭，不但潛藏於機構之中，更恆常發揮作用，每天主宰着新聞組織的運作和新聞報導的取向。通過具體分析機構主管者如何管控表達的渠道和形式，作者既有助大家理解自我審查的出現，也可解釋審查的無形而實存，足可扼殺新聞於萌芽階段甚至之前。

接着下來的第四章，作者以兩個個案分析，分別說明規範系統和管控系統對新聞內容的影響。第一個案例是佔領運動期間電視新聞報導的取捨、重點和方法。作者根據訪談所得，並查證報導內容，再分析新聞部主管的新聞理念、行事準則、工作前設等，並以具體事例，指出主管如何運用不同的結構性審查行徑，因而得出向政府傾斜的報導表現。另一方面，作者比對兩間電視台在中國採訪的資源運用和節目規劃，以窺見管控系統對新聞內容的重大影響。按以上的論述，傳媒東主和主管當然可通過三大系統、二十種審查行徑左右新聞取向，但該書在第五章指出，審查能否奏效，仍取決於三方面所產生的抗衡力量有多大，包括新聞機構管理文化的開放程度、記者的文化資本、每間傳媒機構的背景特性。作者亦列舉一些資深記者成功抗衡審查的手法，證明可通過個人或集體力量增加編採自主的空間。

三

儘管「結構性審查」的理論架構所依據的每點觀念元素並非新穎獨創，但其高明之處更在於融會貫通，把理論結合經驗，一面把影響新聞內容的不同要素聚焦於新聞審查的議題，再根據三大功能把各要素歸類，一面從 69

位受訪新聞從業員的親身經歷抽絲剝繭，按照三大分類涉及的各项要素，認定「結構性審查行徑」二十種，是新聞機構製造自我審查的思想資源和實際力量。

在此理論架構觀照下，個別自我審查事例能否確證其意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新聞機構的體制導致審查行徑的客觀存在、新聞內容向建制傾斜，以至新聞媒體斷送其追求真相、為民發聲、監察權貴的社會公器角色。因此，需要認真追究的，不該限於個別人造成的個別審查惡例，而更須正視不斷製造審查的制度土壤和機構行為。再從理論到應用，「結構性審查」的理論觀點比起現有的研究，可以避免糾結於無法確證的審查意圖問題，又可指出導致審查後果的觀念依據和組織力量，有助提高掌握問題根源的洞悉力之餘，亦可應用於人權監察的工作。以往監察要點是要捕捉自我審查的實例，現在大可擴濶視野，羅列各項構成審查的機構行徑，而人權組織譴責的對象再不限於自我審查的個別元凶，媒體任何行為若窒礙其發揮社會公器的角色，削弱人民知的權利，也值得一一揭露。

同時，這項研究亦帶出不少問題，值得更深入研究。首先，書中指出的二十道陰影也許並未窮盡侵害新聞自由的一切因素和招式。當研究課題的焦點由機構自我審查行為轉移到媒體新聞實踐和表現的不足，探討的範圍也得廣延至外部因素對新聞機構內部行為的影響，再影響報導的取向和內容。例如廣告商的壓力以至杯葛行動、政府發佈消息的策略、特區和中央政府的統戰等等，相信同樣是傳媒頭上一道又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

其次，書中第五章介紹抗衡審查行動出現的三大因素，並指個別記者以至個別機構人員按照各自的獨特條件，與管理層展開策略博弈，克服機構的審查力量。有關博弈空間的探討，的確值得更費心思，除列述各項因素外，亦可參考制度經濟學的分析（Miller, 1992），從機構主管與前線人員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主管與前線人員對於新聞實況的了解詳略不一，以至生產上互相依存（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e）的關係，如電視新聞報導有賴不同人手的分工合作，可以更系統地探討記者的博弈空間和應

對策略。同時，作者在書中亦留意到以集體力量（如工會）抗衡審查的效用。在香港，新聞從業員的行業工會和個別機構工會的行動能否奏效，又在什麼情況下奏效，若能作更有系統的研究，除了是值得發掘的事實真相，更具有深遠策略意義，加深了解集體行動反審查的可能性（涂建豐，1996）。

最後，作者的研究或起範式轉移的作用，把大家的目標轉向「結構性審查行徑」，但並不等於自我審查行為不可能確證，也因此意義不大。其實認知上，自我審查行徑與「結構性審查行徑」可並行不悖，互相補足，從不同角度認識新聞自由遭受的不同挑戰。實際上，調查自我審查在香港亦有成功先例，所費功夫確實不少，但一旦證據確鑿，可引起強烈反響。例如 2003 年，香港記者協會經過九個月調查，裁定新城電台自我審查成立，該機構無法反駁¹。從這本書的不同篇章之中亦清楚可見，新聞從業員為迴避敏感議題或害怕衝突而放棄專業的新聞判斷，壓制傳媒的監察效力，可謂屢見不鮮。因此，揭露自我審查雖然有其困難，但該想方設法加強搜證工作，而不是知難而退。

縱觀全書，觀念清晰，論證緊密，資料充足，瞄準課題，以整全架構，提供新觀點，破解老問題。作者從審查現象順藤摸瓜，探尋審查的組織來源，洞悉審查刀鋒有實而無形，使新聞從業員身陷「有自由無自主」的難堪窘境。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僅以六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也不只是把英文論文譯寫成書，他更以其一貫如行雲流水的文字風格，斟字酌句重寫全書，可見作者不避重責，力求深入淺出，推陳出新，以學術介入社會，鞭策傳媒，發揮公共知識份子的作用。

¹ 「虛假的安全：香港國安法嚴重威脅言論自由」二零零三年年報，香港記者協會第十九條聯合報告第四節：

<https://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860&lang=zh-TW>

參考書目

- 涂建豐 (1996)。〈編輯室公約運動〉，《新聞學研究》，58: 35-48。
- Miller, G.J. (1992). *Managerial dilemm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hyu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Blockchain and Journalism:*

New Type of Purchase and Recommendation Platform for News

· *Self-Regul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A Critiqu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 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Venezuela' s English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main stream journalism

Research Notes

· *On the New Identity of Social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Creative Community

Past and Present

· *"Asia" as th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r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Asia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Project" and its Workshops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Twenty shades of freedom :*

Media censorship routines in Hong Kong